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

日本研究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李世暉 博士

戰後日本「台灣研究」之發展與變遷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of "Taiwan studies" in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研究生：陳怡璇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六月

謝詞

感謝指導教授－李世暉老師，口試委員－劉慶瑞老師、石原忠浩老師，北海道大學－柿澤老師，金澤大學－山本老師，以及所有陪伴在我身旁的朋友們和永遠是我最強力後盾的家人們，您們的這些力量讓我有勇氣朝向下一個人生階段邁進，碩士生涯的所有人、事、物我都由衷的感謝，謝謝您們。

陳怡璇 謹致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戰後日本「台灣研究」之發展與變遷

陳怡璇

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研究學位學程

E-mail:102861002@nccu.edu.tw

同屬於東亞區域範圍內的日本和台灣，其歷史糾葛源遠流長，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使得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五十年之久，然而，伴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國際情勢大幅變動，其在區域研究下面對台灣的態度轉變亦與國內外的環境息息相關。本文欲透過整理戰後各時期日本對台灣之研究文獻，同時藉由「日本台灣學會」所編纂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將其所收納之文獻依據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社會科學領域的九類主學門進行分門別類，並佐以孔恩所提出之典範概念的轉移為理論探討之依據，進而分析各時期日本對台灣的研究，探討戰後日本「台灣研究」的發展變遷。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關鍵詞：日本「台灣研究」、典範轉移、區域研究、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

目次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1
第二節、研究目的.....4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5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8
第二章、 文獻分析與理論探討.....9
第一節、 孔恩「典範轉移」理論.....9
第二節、 區域研究之發展源由與興起.....12
第三節、 日本的區域研究.....18
第四節、 戰後日本的台灣研究.....23
第三章、 殖民地記憶遺留的台灣：戰後初期至1970年代.....32
第一節、 戰前日本對台灣的學術認知.....32
第二節、 戰後初期台灣研究的趨勢與特色.....36
第三節、重要研究成果與代表著作.....41
第四章、 經濟奇蹟的台灣：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後期.....45
第一節、1970年代之國際環境.....45
第二節、1970年代東亞地區的經濟態勢.....47
第三節、重要研究成果與代表著作.....54
第五章、 兩岸關係下的台灣：1990年代至2014.....62
第一節、 台灣的民主化.....62
第二節、 日本「台灣研究」的體系化.....66
第三節、 重要研究成果與代表著作.....73
第六章、 結論.....76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參考文獻.....78

附錄(一)社會科學領域九類主要學門之分類.....83

附錄(二)《日本台灣學會報》歷年刊載論文.....86

附表、附圖.....9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同屬於東亞區域範圍內的日本和台灣，其歷史糾葛源遠流長，1895年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得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五十年之久，造就其對於台灣研究一直是高度關切的，然而，日本歷經二戰的戰敗，國際情勢大幅變動，使得日本關於台灣研究的部分一度出現中斷的情形。日台關係發生最直接的變化發生於1972年，當時的日本首相為繼任佐藤榮作的田中角榮，在其之前的岸信介與佐藤榮作兩位日本首相皆為日本政壇親台灣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儘管於任期內國際與國內情勢皆產生變化，日本政府仍與台灣的中華民國維持邦交關係，然而，1972年7月，在田中角榮首相與大平正芳外相的領導之下，日本決定著手進行與中國外交關係的正常化，因而必須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然於日中交涉期間，大平外相並未全盤接受中國的主張，對於中國主張:「中國只有一個，不承認一中一台或是台灣獨立」、「台灣為中國所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日本政府僅表示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出的主張表達充分的「理解與尊重」。

1972年12月，雖然在國際政治層面上雙方形同停擺的局面，然而為了能適當處理日台之間的貿易與經濟等實務關係，日本以民間團體的方式設立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灣方面則設立亞東關係協會，在兩會簽署「互設駐外辦事處協議書」之後，亞東關係協會便接著在東京、大阪、 福岡、橫濱等四個地點，而交流協會亦在台北與高雄兩地設立辦事處。雙方透過此兩個組織展開「民間交流關係」，表面上交流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雖然都以民間團體的形式存在，但毫無疑問地各自都具有該政

府的背景，名義上雖為民間團體的實務交流機構，然實質上則是為了處理雙方斷交之事而存在設立[1]。（淺野和生著 何義麟譯，2007：42-44）。

自1970年代開始，日本便成為唯一參與G-7會議的亞洲國家，而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首相，其便於任期內提出：日本將朝向「政治大國」邁進的外交政策。於此期間，東亞國家的經濟狀況逐漸好轉，日本為東亞地區的領頭羊之「雁行理論」在東亞亦蔚為風行。有鑒於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日本也開始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再加上蘇聯的崩解，導致冷戰時期宣告終結，海部俊樹首相於此時機提出「必須由美、日、歐三極主導形成世界新秩序」的主張，欲擺脫戰後以來「重經濟、輕軍事」的路線，因此日本自身自戰後以來，無論是在國內亦或是國際環境上皆面臨著重大的改變。

而日本的「台灣認識」在面對不同的國內、外情勢之下皆展現出了不同的面貌，戰後初期，殖民地記憶的遺留尚為深刻，1970年代在國內外因素的相互影響下，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直到1980年代末期，由於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巨大轉變促使日本的台灣研究學者對於台灣認識再度出現另一波改變。最直接的變化為1987年戒嚴令解除，台灣的民主化急速成長，過去被視為禁忌之各項議題逐漸解禁，例如出現大量有關「二二八事件」之相關文獻，且一方面，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促使日本的台灣研究學者對兩岸關係更抱興趣。日本的台灣研究與日中之間政治、經濟變化有著連帶性的影響，其主要在戰後處理問題上以及台灣地理位置對亞洲安定發展之重要性和日台貿易摩擦的擴大有不容小覷的力量。而台灣在日本眼中其認識

[1]日本的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於1972年12月1日成立，其本部位於東京，第一任會長為堀越禎三（經團連副會長）、理事長為板垣修（前駐中華民國大使）且職員方面幾乎為前外務省和通產省人員所擔任。台灣的亞東關係協會則於同年隔日12月2日在台北成立，由台糖公司的張研田理事長出任理事長，中華民國工商協會的辜振甫理事長出任常務監事。

上的變化亦從殖民地轉為經濟發展國家，再進一步轉為亞太區域中不容忽略的角色。

然而，戰後以來日本對於台灣的研究與戰前殖民地時期相比其數量是相對較少的，本文希望藉由了解戰後以來日本研究學者在面對台灣，進而進行學術研究之際，其將台灣所放置的位置為何處以及日本對台灣的認識出現何種變化，同時透過分析戰後發表的與台灣相關之文獻，考察自戰後以來日本的台灣研究，比較分析不同時期所出現的台灣認識。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欲透過整理戰後各時期日本對台灣研究之文獻，進而探討各時期日本對台灣的認識，深入了解其認識發生變化之內外原因。將戰後以來的時間軸劃分為三個區塊，以分別探討以下三個時期：

1. 戰後初期至1970年代。

2. 197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

3. 1990年代至2014。

透過「日本台灣學會」所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將其分門別類，整理歸納並分析其內容，了解日本於不同時期上台灣研究在各學門中所著重之比例及背後意義，解析台灣由殖民地轉變為經濟發展國家以至於現今於亞太地區所扮演之角色的變遷總結。

在過去，日本在區域研究方面受歐美影響至深，然而於冷戰結束之後，日本的區域研究則傾向於發展出與歐美不同的研究模式，企圖透過對非歐美世界的摸索，進而掙脫以民族國家為目標的束縛，且進一步屬意建立一套專屬於台灣的區域研究系統，從而進行跨學科的區域研究，擺脫過去位居中國研究領域下的地方研究，發展成為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台灣區域研究。本文即欲藉由不同時期當中，日本對於台灣研究之重心轉變進行歸納分析，並進一步探討日本的對台灣研究產生典範轉移的可能性以及描繪日本的台灣研究於各時期中所登場之關鍵字之間的連結變化性和研究重心的轉變過程。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首先，為了了解日本於戰後以來，在不同時期當中對於「台灣研究」在各學門中所著重之比例及背後意義，以分析台灣由殖民地轉變為經濟發展國家乃至於現今於亞太地區所扮演之角色的變遷，因此在確立問題意識以及研究目的之後，本文主要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藉由「文獻分析法」為主和「深度訪談法」為輔，整理戰後以來的台灣研究文獻於各學術領域之分佈趨勢。

文獻分析法為「蒐集與某項問題有關的期刊、文 章、書籍、論文、專書、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及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等資料，進行靜態性與比較性的分析研究，以瞭解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解決過程及可能產生的結果」(吳定，2003)。因此，本文主要進行相關文獻、期刊以及論文的分析，將戰後以來日本對於台灣方面之研究內容依照時間軸以及學門類別區別，分別透過整理歸納，理解該時期日本對台灣研究之認識。

深度訪談法為利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口語交談，進而達到意見交換與建構，藉由訪談的過程與內容進一步發覺、分析受訪者之動機、信念、態度、作法與看法(畢恆達，李美華、孔祥明、林嘉娟、王婷玉譯，袁方編，2002)。因此本文將藉由與台灣研究之相關專家學者進行訪談，補足在文獻資料蒐集上不足之處，進一步分析日本的台灣研究於各不同時期所展現出的面貌。

同時佐以量化研究，透過TTM形態素解析軟體以及社會網路分析法軟體NodeXL的操作，計算《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中所包含之關鍵字登場頻率，繪製關鍵字與關鍵字之間的關係網絡圖，進一步歸納分析。透過TTM(Tiny Text Miner)形態素分析軟體的使用，進而計算出『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當中關鍵字登場之頻率，而為了避免九門學門所各自呈現的結果過於紛雜，本文同時參考日本社會學科分類的方式，將性質較相近的學門合併為同一領域做為基體以進行頻率統計，即：人類學與區域研究及地理學合併為人文地理領域；社會學因其子學門亦包含媒體傳播在內，故為社會傳播（社会メディア）領域；經濟學與管理學合

併為經濟經營領域；法律學與政治學合併為法政領域；另外由於教育方面和本文所欲探討的方向關連性較淺且文獻數量不多，因此同心理學門一樣不計算在其中。

數據統計完成後，進一步將統計結果繪製成分布圖，佐以長尾（The Long Tail）的概念得證出關鍵字分佈的重要性。長尾（The Long Tail）此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連線」雜誌主編 Chris Anderson 在 2004 年 10 月所發表的「長尾」 一文中所提出，用來描述諸如亞馬遜和 Netflix 等等網站的商業和經濟模式。而「長尾」實際上是統計學中 Power Laws 和帕累托分佈（Pareto）特徵的一種簡化式的表達，亦即只要存儲和流通的渠道足夠大，需求不旺或銷量不佳的產品共同佔據的市場份額就可以和那些數量不多的熱賣品所佔據的市場份額相匹敵甚至更大。而運用在本文關鍵字詞彙統計當中，可得知只出現一次的單詞組數最多，因此曲線圖在出現頻率僅為一次的關鍵字上呈現出最高峰的狀態，隨著曲線往右，出現頻率提高，單詞組數減少，因此圖形越趨平緩，趨近一水平狀態，而趨近平緩的折線部分便為高頻率的單詞組數部分，亦為分析文獻中所登場關鍵字之重要部分。透過 TTM 形態素分析之後，再藉由社會網絡分析工具－NodeXL，繪製出關鍵字與關鍵字之間連結性的強弱網絡圖。

透過以上三種的研究方法，將所得出之資料統計依照年代序列歸納為三大時期，即為：戰後初期至1970年代，以人類學為研究主軸；1970年代至1990年代，以經濟學為研究主軸；1990年代至今，以政治學為研究主軸，其依照年代別依次分析，並著重於研究重心的轉移，嘗試與美國的科學哲學家－孔恩所提出的「典範」概念做結合，以歸納出台灣角色定位之變化（見圖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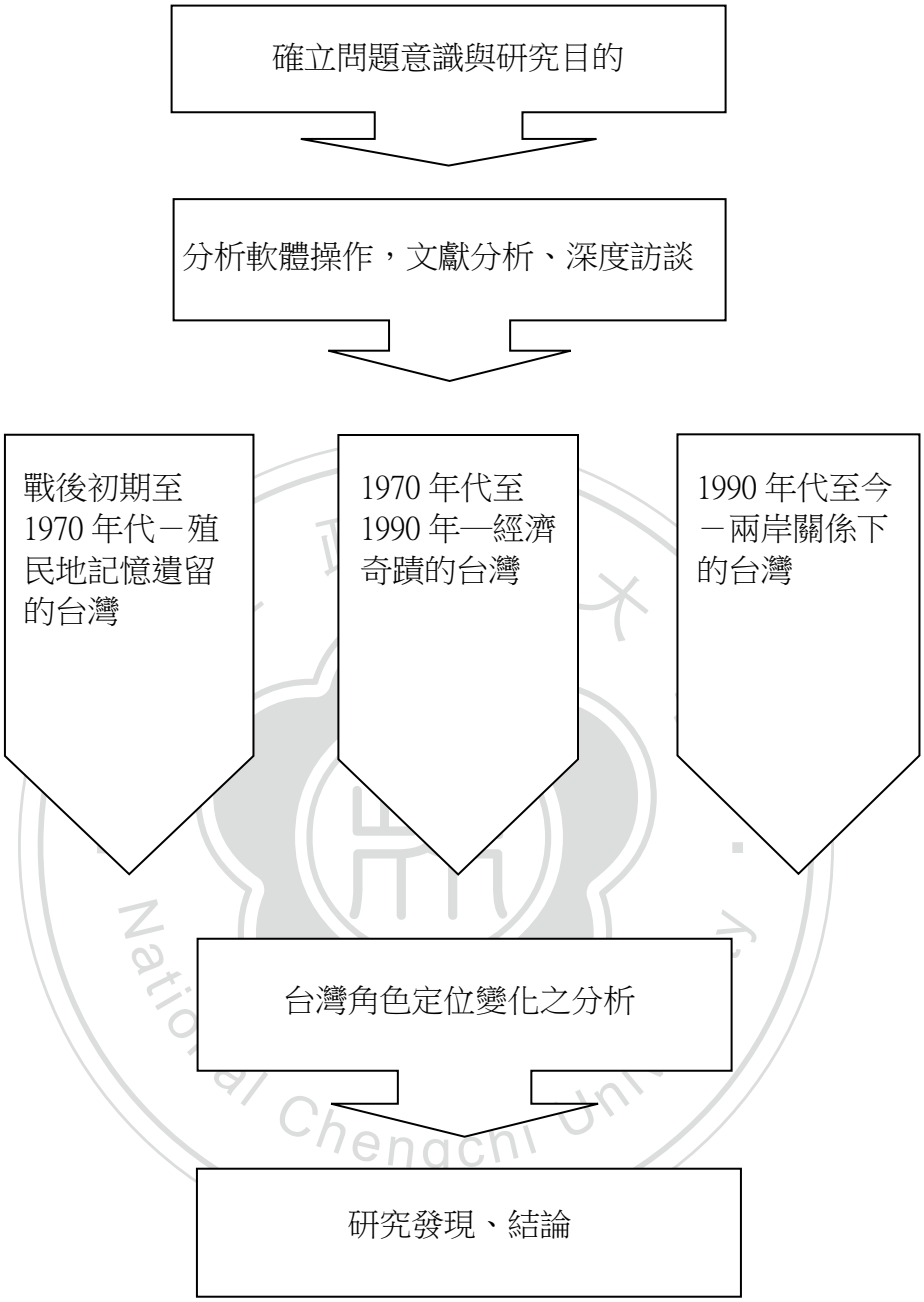

確立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分析軟體操作，文獻分析、深度訪談
戰後初期至1970年代－殖民地記憶遺留的台灣
1970年代至1990年—經濟奇蹟的台灣
1990年代至今－兩岸關係下的台灣
台灣角色定位變化之分析
研究發現、結論

圖1-1 本研究流程圖。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在台灣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中，曾有多位日本人類學者，例如：鳥居龍藏、森丑之助以及伊能嘉矩等等，在台灣進行長期的人類學研究。台灣為日本第一個帝國擴張之始之海外殖民地，因此，自日治時期開始，日本對於台灣研究特別是關於原住民方面最為重視，其最根本之原因在於樟腦的取得以及為使台灣成為下一個殖民地管制的典範。而1898年，學者伊能嘉矩更進一步提出臺灣原住民的分類體系，進而將臺灣原住民分為「四群八族十一部」（陳偉智，2014：82），分析各族的分佈區域和文化特質。關於日本對於台灣研究自戰前以來即以原住民研究之數量最豐，然本文主要探討之核心為戰後以來日本於國內外情勢變化下對於台灣研究的改變以及其相關內外部因素對於台灣認識的衝擊，因此日本的台灣原住民研究部分將不會深入探討。

另外由於二戰結束至今已歷時過長，許多該世代之相關研究學者已凋零，因此目前關於戰後初期日本對台灣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無法透過訪談方式取得，皆為文獻保留為主。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章 文獻分析與理論探討

第一節 孔恩「典範轉移」理論

孔恩（Thomas S. Kuhn）-「典範概念」

美國的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Samuel Kuhn）於1962年發表了『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並於其中提出「典範理論」之概念。最早出現「典範」一詞，是源自於希臘字「paradeigma」，原指模式（model）、形態（pattern）或範例（exemplar）。因此，一般而言，典範的概念可包含以下六種常見之定義，即為：1.一組共通的理論假設。2.了解經驗世界的理論架構，該理論架構建立於理所當然的假設。3.某一特定觀照經驗世界的方式。4.觀察社會世界的方式。5.人類感知經驗世界均自然方式，一如於對水的感知方式。6.典範是團體信念的集合體：代表特定社群的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與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孔恩，1994：234）。

「典範」可將一套基本的信仰系統認知為代表，也可以稱之為世界觀，一個典範通常為同一個學術社群的成員所共享，因此，在同一典範中的成員，由於對世界本質的基本信念相近，因而促使彼此之間的溝通較為容易。而「典範」之所以成為典範，在於擁有下列兩個特徵之科學成就：第一，該成就實屬空前，因此能從此種科學活動中的敵對學派中吸引一群忠誠的歸附者; 第二，該成就中仍留有許多問題能讓這一群研究者進行解決。研究者以共有的規範為基礎，信守相同的研究規則和標準，以及因而產生的明顯共識，此即為「常態科學」，亦為某一特定研究傳統發生與延續的先決條件。假若，典範發生轉變，則為「科學革命」，先前的典範在革命後會被另一個典範所取代，此種發展模式可視為成熟的科學所展現出之通常性的發展模式（孔恩著、王道還編譯，1989：53-54）。

美國政治學者－奧蒙(G. Almond)於1966年的演說當中便提出三點主張,「第一：在十八及十九世紀之美國政治理論中，確實有一致之政治理論公式；第二，在美國從世紀之交到1950年代，專業政治學之發展主要以典範之方式被從事的，在這幾十

年間最重要且獨特的理論思考及研究產生累積性地動搖其效力的異常發現；第三，在最後的十年或二十年間，新的、更確定是科學的典範之要素迅速地被顯示出來，此種新方法之核心概念即為政治系統之核心概念。」因此，進一步提及，「從政治學界的規模、結構、年齡分佈以及知識環境，可以推斷我們正在成為一門學科。」，而其結論為：「迄今我們所描述者，與孔恩於其科學革命理論中所提出者，相當類似。」然其更進一步補充：「若仍無法完全符合孔恩之模式，則我們必須記得社會科學當中有理論之辯證，與物理學及生物學是具有差異性的」（See Bernstein，Richard J.，1976：97-98），然而此種較為模糊的說法，亦遭受其他學者之批判。

1969年，孔恩提出該書的後記，對於「典範」及「典範轉移」再度提出了補充性的闡述，其認為「典範」有下列兩種不同意義的使用方時：第一，它代表一特定社群的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與技術等構成的整體; 第二，它指涉該整體中具體的問題解答，把其當作模型或範例，可以替代規則作為常態科學其他謎題的解答基礎，又就「典範轉移」而言，隨著該朝向成熟的轉變而發生的變化，不是出現了一個典範，而是這個典範的形質產生改變，只有在這一變化完成後，常態解謎研究才有實現的可能（孔恩著、王道還編譯，1989：234）。

由於孔恩的「典範理論」不僅對自然科學有所貢獻，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影響亦十分深遠,因此許多社會學家也試圖應用孔恩的論証與典範概念到社會學門之中，社會學家將孔恩的「典範理論」，當做分析社會學的一種後設系統，使用「典範」概念分析社會學以瞭解社會學當前的情況。在社會學家使用孔恩「典範」概念之時出現了二種爭論，其中一種主張「典範」是源自於自然科學的，所以無法應用到社會學當中，但同時亦有另一批學者認為使用孔恩的「典範」概念到社會學之中是合理的，而就孔恩的論點，其認為社會學尚未為一門成熟的學科，但卻仍存在著多元的典範。在任何的科學研究領域當中，透過「已經產生典範」以及「必須研究典範才能從事進一步的研究」（李秉正，2000：56。），為此研究領域逐漸趨於成熟的徵兆。

而學者苑舉正（1998：173-200）對於典範概念如何在“典範社會學”中詮釋亦提出了三項預設立場：1.所有的“典範社會學”均因其應用孔恩哲學中所指涉自然科學的原始內容於社會學中，所以對於孔恩的哲學均做了相當的修改。2.所有的“典範社會學”均因應用典範概念做社會學發展之分析，所以強調這一個發展過程中的階段化（periodization）。3.所有的“典範社會學”均因強調各個階段中並不具有連續性與累積性，所以強調社會學發展的本質是一個多元的（pluralistic）學科。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區域研究之發展源由與興起

自歐洲帝國主義擴張之始，西方知識界便開始著手於塑造理解非西方世界的雛形。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由美國學界所主導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主要以國家規模的區域為其對象，在關注各區域的共時性之同時亦關注該區域的特色並比較其他區域，且為廣泛研究該區域之政治、經濟、產業、法律制度、社會、文化、民俗等等的專門學科，而區域主義的興起與深化發展，則成為1980年代以來國際政經秩序的顯著現象。

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史華慈（B. Schwartz）便指出，區域研究為一種西方理解非西方的嘗試與努力之體現，其企圖透過「壓縮式的理解」迅速掌握非西方世界的現況。而為了突破過去侷限於歐洲大陸的世界觀，進而出現一種結合國家資源、私人基金與學院體制的「美國式區域研究」，以因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局勢，使得其能夠在美國學院體制中取得顯著的位置，進而帶動起一股「美國式全球化」的風潮。而印度的文化人類學者—阿帕度萊（A. Appadurai）也同樣認為，區域研究是「過去五十年間美國學院對於世界進行的大規模制度性認識活動」。區域研究為一個概括性的詞彙，指涉一系列具有共同信念以及相同特質的學術領域活動，並根據其研究對象所身處的相對位置進而加以定義。

在區域研究所展現出來的共同特徵中，「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或「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的特徵則是其中最引人矚目之處。學者詹頓（D. L. Szanton）認為，此種「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特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沒有任何單一學科可以概括區域現象的全貌，因此藉由這種整合途徑嘗試進行認識、分析、詮釋異文化與社會，能夠有助於外部研究者的自我省察，進而批判「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世界觀，儘管區域研究從一開始，便具有濃厚的現實關懷，以及政治、經濟和戰略取向，然而透過對於多樣性的認識，並以創新方式跨越傳統學科的邊界，區域研究不僅讓美國更瞭解世界，也讓其霸權和中心的位置受到衝擊，並促使既有分科的大理論和假定必須重新檢討，然而區域研究雖然深具貢獻，但在其

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卻不斷在制度上、資源上與知識上甚至於政治上面臨嚴峻的挑戰與考驗 (張世澤、張世強，2008：88-89) 。

日本的政治學者—國分良成將區域研究定義為,「發現世界各區域的獨特之處，並對其進行深入的理解與探究」。而關於區域研究的基本概念，自發展以來並無出現與過去太大的改變差異,一般來說,區域研究即為選定這個世界中的某一塊區域，進而對其的獨特性進行解釋和實證性的研究，因此首先應學習該區域之語言，並透過實地考察以及共同研究的方式進一步釐清該區域之特性為區域研究之首要任務。

區域研究自美國發源，主要發展原因為美國為解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其所處之戰爭區域之情報而出現（国分良成、酒井啟子、遠藤貢責任編集，2009：4）。1943年，美國的社會科學評議會即提出一份《社會科學領域下的區域研究》之報告書，其目的在於提出培育區域研究相關人才之重要性。同年，成立美國第一個有關區域研究的研究學會—遠東學會(Far Eastern Association)，也因於此，為了解決盟軍是否應該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的問題所困擾之美國政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時委託美國的人類學者—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進行研究，其藉由文化類型理論以及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分析當時的敵對國，仔細闡述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以及習慣等等，進而彙整而成提出報告，於1946年出版《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書。

而學者Robert B. Hall於二戰結束後便針對戰爭提出檢討報告，其當中便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可發現我們急需得到大量地對於不同區域之正確的情報訊息」以及「當面對全面性的戰爭時，軍方即發現對於該區域之相關知識的認識實為必要，因此各大學應著手於對於各區域以及其所使用之語言進行相關訓練」。Robert B. Hall亦曾指出，認為區域研究應確立之目標與方向性應為以下四點，即為：了解全面性地世界知識、進行共同調查以及知識方面的統合、對於比較文化的理解以及為解除在社會科學研究上所遭遇之困難。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緊接而來便是美蘇冷戰世代的來臨，尚處於發展之初的區域研究即隨著冷戰時期美國的世界戰略之走向而擴大，當時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集團以及卡內基等等的財團積極地提供美國各主要大學有關區域研究方面的資金援助，同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等等大學也於戰後立即成立俄羅斯研究所以及俄羅斯研究中心。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因應此一國際局勢的變化，上述之財團亦著手於在主要大學當中成立中國研究和遠東研究的研究機構，隨後，有關於歐洲、中東、非洲、拉丁美洲等等的相關區域研究機構亦接連誕生。而邁入1950年代，尤其1957年時蘇聯人造衛星史潑尼克計劃以及洲際彈道飛彈(ICBM)的成功，對美國造成很大的衝擊，因此替美國的區域研究更增添一層濃厚的戰略色彩。總而言之，冷戰時期下美國的區域研究致力於敵國以及同盟國相關知識的累積，進而摸索對其的管理方法。

而冷戰時期，美國財團對於區域研究的支援亦沒有停歇，福特集團於1950年至1973年之間向以區域研究為主的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投入兩億七千八百萬美元的資金支援，其中分配三千七百萬美元於亞洲研究、三千一百萬美元於含括蘇聯的歐洲研究、一千三百萬美元於非洲和中東研究以及一千一百萬美元於拉丁美洲之研究。且福特集團亦於1952年起於外國區域設置獎學金計畫，自1952年至1972年中間提供兩千零五十名研究者資金上的援助，且由於冷戰時期區域研究支援的中心為歷史學以及政治學，因此於提供支援的研究者名單內歷史學者即佔了六百零五名，而政治學者亦佔有四百三十九名。因此可以從中得知，美國的區域研究實為透過美國政治的現實面所孕育得來，然而，也因於此契機，使得區域研究的種子能開始在各大學以及各研究機關慢慢茁壯，且隨著時間的移轉逐漸注入其自立性。美國的區域研究之研究對象許多為非歐美國家，同時伴隨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世界戰略，可以發現到其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之現狀以及方向有著欲誘導其往美國型社會發展之趨勢，因此美國的區域研究亦可被稱為「提供社會科學持續發展之豐富的資料庫」。

而1960年代後半至1970年代，伴隨反對越戰的聲音越發激昂，近代化論成為被批評之對象，而越戰失敗的同時亦使得美國經濟停滯，美元價值急速低落，使得美

國在1970年代後半到1980年代時期對於區域研究的重視出現稍微下降的走向。在此相對低迷的氛圍之下，美國的歷史學者—柯文(Paul A. Cohen)所出版的《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即為對美國在區域研究領域中的中國研究下對其所付與的政治性給予批評。直至1989年冷戰結束，90年代遭受全球化浪潮的襲捲而來，美國再度重新拾起對區域研究的關心，而與反恐攻擊和伊拉克戰爭相關聯的中東與中亞區域，以及伴隨中國的崛起，使得美國對於區域研究愈發重視，將其置於學術界中的重點研究項目(国分良成、酒井啟子、遠藤貢責任編集，2009：6-8)。

冷戰的終結，使得區域安全的思維在區域主義的盛行下更顯突出，而與歐洲國家相較之下統合程度相對困難之東亞區域，即成為各國利害對立，勢力角逐之處。在1980年代初期，傳統被認定的「東亞」為一般使用漢字以及大乘佛教所分佈之區域，包含中國、台灣、越南、韓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及日本，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由於經濟的要因，廣場協議之後日圓急速升高，日本、韓國以及華人的資本開始大量流入東南亞地區，出現含括東北亞以及東南亞之「東亞」概念(小此木政夫，文正仁編，2009：289)。然而，區分區域之方法可分為許多種，單就亞洲地區，即可分為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中亞、西伯利亞等等，北美和南美可分為盎格魯美洲和拉丁美洲，基督教可分為天主教的、新教、東正教，除了上述以地理位置、人種以及宗教進行區分，亦有透過其經濟發展的階段區分為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和未開發國家，或藉由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區分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獨裁主義和極權主義。

近代用以劃分世界區域的方式多以民族國家為主，現階段的地球上約有兩百個國家存在，原則上雖是一民族一國家，但是經過移動、戰亂、侵略、貧困、開拓等等理由造成地球上幾乎不存在依據一民族一國家之原則所建立的國家，因此美國區域研究的出發立場即在於對其自身而言視為「敵對國」或「問題國家」進行本質上的解析進而達到其戰略目的，隨後亦從比較政治的觀點分析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使

此種的研究方向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而美國的區域研究亦反映在此，即以國家單位為其區分區域之方式。

而亞太區域主義興起之背景與亞太內外經濟相互依存度的提高、美國影響力的逐漸消退以及以中國為中心的情勢之變化緊密相關。亞太區域主義發展的契機，最初可說是受到歐洲的影響，1950至1970年代期間，分別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和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欲推行歐洲的經濟統合，而隨著冷戰的結束，進而相繼出現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歐洲聯盟(EU)的整合和亞太經合會(APEC)，皆為區域主義之體現，就歷史的角度而言，在1960年代時出現了整合理論以及新功能論，其試圖藉以說明當時不同區域安排的形成原因。

新功能論認為，整合的進行是透過政府和民間部門中菁英運作而達成的結果，而支持整合的理由亦為了實際面之考量，其預期能在超國家架構的活動下獲得利益，在學習過程的效果下，原本以權力導向的政府行動也進一步進化為採取以福利導向的行動，因此透過增加向國際組織的承諾，同時將整合的可能性大為提高，此即為新功能論中的「溢散」概念。然而從實際情形來看，並未如同新功能論所預期的順利，因此學者哈斯(Ernst Bernard Haas)便於1970年代中期提出對於新功能主義出現觸礁的看法，且關於區域主義理論模型出現認知錯誤的原因在於以下兩點：期待歐洲經驗能在世界其他地區出現的情形並未發生以及以歐洲為主的整合理論低估了各國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民族主義情感高漲的普遍性。因此哈斯認為，若以實質利益為其考慮的面向，則為一脆弱、短暫的想法，因為其並未受到深厚的意識形態和明確的思想所影響而強化。所以，關於整合理論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不僅在於理論預測和其現實面的經驗有相當大的落差所產生的結果，且關聯其之新功能論並未在社會科學界中得到普遍的支持。

於此同時，美國學者—柯恩(Robert O. Keohane)和奈伊(Joseph S. Nye)於1977年出版《權力與相互依賴》*(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其闡述關於「相互依賴」的概念，並對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追求權力的行為提出另一種新的詮譯，他們認為未來的國際社會將會是一個既追求權力又同時追求和平的社會，而此一理論有逐漸取代整合理

論的趨勢(宋興洲，2005：59-60)。而奈伊對於新功能主義提出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其試圖提出可供參考的分析架構模型，其將影響整合發展的因素歸為以下四大類：即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是否一致、精英的態度思考方向是否相近、社會多元化程度以及各國國內政治的穩定性程度。而在進行初步整合之後，對於其利益是否均沾、代價是否過高以及各國決策者的評估都將左右整合未來的進一步走向。因此，奈伊認為在整個整合的過程當中，可以觀察到四項特徵：第一項為政治化，即解決問題以及利益分配的方式是否改變，第二項是關於各國國內各個利益團體之間的利益重分配的情形，第三項是整合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強迫整合的壓力是否出現變化，第四項則是各國的對外政策漸趨一致的可能性。而對於這些衡量整合的指標，奈伊不同於以往的以一體化理論僅是單一層次為其之分析研究途徑，而是從國際關係轉向結合國內政治的多層次研究方法來進行發展新區域主義的理論(曾怡仁，2004：36)。

然而，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關於空間認識與文化地理認同的認識方面亦出現一個新的面向。即在空間認識方面，出現一種以全球視角進而探索亞洲論的概念，而在文化地理認同的認識方面，學者赫蘭德(Howland)與布魯斯・巴頓則利用東亞區域世界的文化空間之角度，重新對日本進行其邊緣化的定位。 此外，中國學者—孫歌認為，應該透過時間的順序對日本亞洲論的系譜的空間認識進行更為長期的考察。上述的系列思想不同於以往的傳統論述，即站在亞洲與歐洲對立的框架下所提出的亞洲論、日本論與近代論，而是藉由積極地將亞洲定位在全球視野之下，意圖使其在東亞世界的全球性以及亞洲對亞洲的框架之內對以往的研究進行重新探索，從而提出一個新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2004：34)。

第三節 日本的區域研究

日本「區域研究」的開端為戰後自美國所導入而成，因此，美國為日本對於區域研究之相關概念確立的模仿對象，而京都大學的東南亞研究中心即是以美國模式的區域研究模型所設立，日本農業經濟學者—本岡武指出區域研究所具備之特徵為以下七點：研究和教育組織之一體化、跨領域的綜合研究組織、重視現代研究、強調語言教育、尊重專門學科之教育、實地調查之必要性以及相關文獻資料之整理歸納。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於區域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論亦不斷地出現不同面向之論述，日本的文化人類學者—立本成文主張：區域研究學者應對於其選定某研究區域成為其研究對象的方式訂立出一套區域研究之固有的方法論，因此，立本成文將區域研究之特徵定為以下三點：1.作為研究的對象其具備之區域性、2.作為研究的方法應具備之綜合性以及3.作為研究的目的所應具備之現代性（国分良成、酒井啟子、遠藤貢責任編集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2009：5），進而透過此三點之連結進行論述。

關於區域研究，應重視區域之理解抑或是區域研究之專門學科，為區域研究自發展以來所出現的爭論點，日本相對於美國來說，自1980年代以來出現國際化的思潮，其認為區域研究之最終目的為對於現代世界進行深入的綜合認知，因此出現將區域研究定位為一門專門學科之現象，亦進而進一步地縮短了區域研究與國際政治學和國際關係論之間的距離。「區域研究」這個名詞雖然是自美國發源而起，然而其包括語言的學習、文獻調查、實地考察和共同研究等等基本要件的研究方法不論東西方皆有所流傳，美國歷史學者—任達(Douglas Reynolds)在其著作〈Chinese Area Studies in Prewar China: Japan's Toa Dobun Shoin in Shanghai, 1900-1945〉指出，日本在戰前於上海所留存下來的東亞同文書院即可視為區域研究的先行軌跡。而戰前日本為了中國經營設立了滿鐵調查部，若以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雖然其在戰後皆被視為戰前軍國主義的情報機關而被解散，然此調查部的設立可以說是日本區域研究的先驅單位。

歷經二戰結束知識斷層的狀況，因而出現一批留學生前往美國留學，日本的學術體系也因此出現由美國模式主導的狀況，透過留學歸國的學者將美國式 的學術研究方式帶入日本的大學以及研究機構，區域研究即為其中之一。例如: 慶應義塾大學的政治學科當中的「區域圈研究」課程即為日本的中國現代史學者 —石川忠雄於1957年自美國留學歸來後所設置。慶應大學戰後之中國研究以石川忠雄為中心，其被視為日本的中國研究學者—及川恒忠的繼承者，且使之持續發揚光大，使得中國研究成為慶應大學法學部以至戰後日本政治學界中的重點單位，而日本的中國研究亦在石川的領導下在政治學科中成為主流的研究，而若從當時的國際環境分析，慶應大學政治學科之所以大力發展其中國研究，則與美國戰後東亞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區域研究之發展，除了美國因素外，亦有日本的內在背景，區域研究是冷戰時代發展出來一種研究方式，自愛德華·薩伊德 (Edward Wadie Said)提倡後殖民研究以來，便不斷受到批評，但多半將其視為冷戰下的產物，亦即區域研究之作用及目的為認識敵人，劃分敵我界線。然而 Harry D. Harootunian 指出二戰後的區域研究，應包含著更深的認識論意義，即所謂的區域研究是美國社會學者—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建制之社會學影響下的產物，帕森斯欲處理之問題是現代化所帶來的影響，其基本論述的前提是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模式，然而，現代化亦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因此，如何調和永恆及變動這兩個矛盾現象是帕森斯要解決的難題。而帕森斯由社會體系提出解決方法，首先其強調社會是個有機體，可以透過自我調整，從而不斷地脫胎換骨，其次認為傳統社會是可以走向現代的，而最重要的關鍵處在於其必須有能力選擇正確的發展模式。因此，在上述之論証下，帕森斯的現代化理論為一種承認一個有機民族社會的存在的概念，而區域研究便是在此前提之下發展而來(李朝津，2007：38-41)。

日本於大戰結束兩年後，即1947年美軍佔領期間便設立了「美國學會」，1953年設立「亞細亞政經學會」，1956年設立「日本國際政治學會」。隨著美國式的區域研究在日本快速的發展，1955年北海道大學成立斯拉夫研究中心，1958年成立亞

細亞經濟研究所和同志社大學的美國研究所，1959年設立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而所謂美國式的區域研究，最直接的體現為，1963年京都大學接受福特集團的支援所成立的東南亞研究中心，其主要為一以東南亞的近代化為中心，伴隨進行實地考察以及該區域的語言學習等等的研究人員訓練計畫。東南亞研究中心成立之時，當時的京都校長平澤興便指出，「其在著手於研究東南亞之時，首要欲確認之事為此研究之目的在於對該區域進行科學式的深入理解，而非關於任何政治上的立場」。因此，區域研究雖然為一門由美國引入之學術研究，但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日本和其相較之下出現較明確的去政治化的意圖。

而日本的區域研究另一個和美國不同之處在於，相較於美國，日本對於區域研究上的政治學的理論化較不強調，主要是透過傳統上的實證和歷史分析為主，且相對於研究歐美國家在面對政治理論和比較政治學上相關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日本的區域研究更著重於對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的認識。而1980年代的到來，前往日本留學的亞洲各國學生的數量快速攀升，同時也出現勞動者的流入現象，因此在面對此一現象的日本，相關區域研究以及國際關係教育的人才需求再度提高。日本在世界的存在感也隨著因為越戰而疲憊不堪的美國以及自身自戰後以來經濟快速發展所形成的經濟高度成長而被世界其他國家所再度注意，因此許多國家亦出現「日本研究」的現象。而日本本身除了關於區域研究和國際問題的研究機構數量再度急速成長外，在大學科系以及研究所的名稱上與區域研究和國際關係相關聯者更是日益增加（国分良成、酒井啟子、遠藤貢責任編集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2009：9-10）。

在日本的區域研究之發展中，「中國研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點。自十九世紀以來，「時間」雖然為認知的主流方式，但是「空間」的重要性並未被完全忽略，而社會科學即為此項之代表，同時亦成為近代日本研究中國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美國社會學者—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涂爾幹、馬克思、韋伯以及柏森斯為對社會科學極具有貢獻的四位思想家，其共同之處皆在為關注社會構成的方式，涂爾幹認為社會的組織基礎是理性，馬克思則指出有關於社會階級的衝突性，韋伯則著墨於關於社會權力基礎在於其在乎能否取得合法性，而柏森斯則被

華勒斯坦認為是集上述三人論點之大成者。根據華勒斯坦之分析，社會科學之特點是由理性、階級衝突以及合法性來進而觀察社會，其可說是由空間角度切入之結構主義。

而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接著指出「空間」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性。空間基本上為一種社會建構，而且是多元化，並能夠互相重疊的。因此，華勒斯坦指出社會科學的三項特點：即為斷裂時間，劃分文明與野蠻，以及突出社會科學中的市場、國家與民間社會 (李朝津，2007：32)。其主要為突破時間的限制，並且進而將空間進行重新分配，成為去除以時間為主另一種新的思維方式。

因此，當日本於二〇世紀初引進社會科學時，其中國研究自然亦受其深厚地影響，然而進入1980年代以後，由於整個學術環境出現轉變，使得日本對於中國研究亦出現了另一新的看法。同時，由於解構主義之影響以及批判西方中心主義思潮興起，進而促使日本的研究學者開始討論日本面對西方時所持之真實態度，其為對西方全盤模仿抑或是在向西方學習之同時亦適時地保有自己的主體。而1993年Stefan Tanaka出版的《日本之東洋》(Japan’s Orient)一書中，對中國研究之部分便有深刻地論述。

Tanaka認為東洋史之出現，與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而產生的自我認同有密切的關係，東洋成為日本自我認識上的一個重要他者，在接受西方文明過程中，日本創造東洋史這個學問範疇，其目的不止於研究中國，而是重新建構日本史以及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因此，Tanaka的想法為反駁戰前中國研究為西化下產物說法，表示日本擁有其自身的議題，且在界定日本在世界史中所處位置的同時，欲進而突顯日本自身之主體性。然而，日本的中國思想史學者—溝口雄三認為自明治以來，日本一直在追求一個世界的普世價值，然而，所謂的普世價值其實就是歐洲文明，因此，溝口認為中國研究應著重於重視中國歷史發展的承傳，了解其脈絡之所在。而所謂「以中國作為方法」即是以中國的脈絡作為世界發展的一部份，屬於世界眾多模式之一，其與歐洲模式以至日本模式並存，而溝口稱其為一個多元世界，中國研究即為扮演了解這個多元世界的一部份(李朝津，2007：30-31)。

在日本的區域研究當中，最早以區域研究的方式討論中國的文獻是岩村三千夫於1957年所發表的〈日中国交回復の問題点〉，其注重對日中兩國政策的建議與討論，成為日本區域研究的重要基礎思維。到了1960年代，日本開始強調對中國的客觀現狀之研究。這當中主要包括施耐德(R. Snider)的政策決定論、杜意志(Karl W. Deutsch)的通訊研究途徑以及艾里遜(Graham T. Allison) 的官僚政治模型都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重要代表。因此學者—邵軒磊整理指出，自1960年代開始，日本的區域研究出現了以下三點特徵：第一點為研究對象的區域逐漸擴大，從原先完全偏重於東亞的區域研究，開始延伸至東南亞、南亞、 中東、非洲甚至是美國、蘇聯、東歐等等區域。第二點為以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為首(1958年)，京都大學的東南亞研究中心(1963年)，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1965年)陸續設立，促使研究機構人才逐漸擴展，而各機構也派遣研究學者前往各區域進行實地考察、學習當地語言，因而逐漸形成新一代的研究世代。第三點為戰後的社會科學受到美國的區域研究方法的影響而逐漸發達，所以在1960年代前半期的時候，美國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theory)以及文化研究途徑(cultural studies)傳入日本，其對於後進地區的政治狀況以民族解放運動的分析模式加以理解，與之前的日本區域研究立場出現很大的不同(邵軒磊，2012：32)。

相對於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區域研究主要以國家單位為其區分區域之方式，日本的區域研究則傾向於發展出和歐美型發展模式不同的發展模式，企圖透過對非歐美世界的摸索，進而掙脫以民族國家為目標的束縛。日本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學者—矢野暢，認為區域區分的原意即在於「切合國際政治的現實，進而將世界進行分割的想法」，存在其恣意性，而此認識手法並不僅僅是戰後美國的產物，毫無疑問的為近代歐洲所遺留下來之結果（国分良成、酒井啟子、遠藤貢責任編集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2009：13-14）。

第四節 戰後日本的台灣研究

日本台灣學會發起人之一的日本學者—石田浩，其在著作《アシアの中の台湾》中對於戰後以來日本的台灣研究提出系統性的整理。自二戰結束以來，日本的中國學術界對於 1949 年所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持有相當高的關心以及期待，相較之下，當時日本方面對於台灣的研究著墨較淺，其理由為四，首先最大的原因為，日本基於發動侵略戰爭進而展開「戰後反省」，而日本的中國學術界的研究學者對於在過去被認為是停滯且無發展可能、半封建和半殖民的中國竟然透過中國農民發起了自發性且同時具備革命性質的社會變革抱持相當程度的好感和共鳴。第二個原因為，自古以來，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橋樑便從未中斷，吸取中國的文化進而與日本文化相互融合,使得中國文化成為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基礎，因此多數日本人對中國懷有強烈的親近感，潛在性地對其產生憧憬。第三個原因為，戰後以來的日本研究學者認為，中國革命將會替亞洲社會帶來新的契機，因而給予其高度的評價，特別是在歷經韓戰過後，日本清楚地感受到民主化的界限和社會變革的挫折，因而將中國社會主義視為夢想和理想的寄託之處。第四個原因為，日本的中國學術界對於蘇聯的史達林社會主義的幻想破滅，因此轉而對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中國社會主義提出讚揚。

然而，之所以當時的進步知識人以及研究學者將重心著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台灣，其原因有二，首先為其對於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國民黨極度地不信任，認為戰敗的國民黨將腐敗、墮落的一黨獨裁體制帶入台灣，迫使台灣成為「反革命、反中國」的基地，而擁有中國的代表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其次為日本在戰後實施「戰後反省」的對象僅限於中國，將國民黨所統治下的中華民國‧台灣排除在外，忽視過去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台灣實施長達 50 年的殖民支配統治。有鑑於此，戰後以來日本對於台灣方面的研究數量相較之下則較為稀少，然而，自戰前延續至戰後，日本與台灣之間在民間上的交流是持續地緊密發展，於戰前時期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對台灣的情感為一主要助力，成為扮演當時在日台交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石田 浩，1999：5-6)。

日本在 1960 年代逐漸完成其戰後的經濟復興，日本的資本主義開始積極地向海外發展，而同為東亞鄰居的台灣和韓國即成為其首要投資的對象。因此，伴隨著日本對台灣投資的增加，日台雙方的貿易量成長，促使日台的經濟關係更加地深刻緊密。且日本當時高度的經濟發展使得日本人前往國外旅遊的機會提高，而台灣、韓國和香港皆為當時的首選，基於此使得曾經一度出現斷層的日台交流再度透過投資貿易和觀光旅遊等等民間的方式接軌。然而，1970 年 5 月 1 日，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發表了中國對日貿易的四項原則，即「周四條件」，明確指出中國不願意和以下四種的日本企業有貿易上的往來：大量對南韓、對台灣貿易之企業、協助越戰的企業以及日美合資的企業，且 1971 年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會員資格，1972 年日台斷交，使得日台雙方交流的難度與日遽增。直到 1990 年代，隨著國際環境的變遷，台灣民主化的改革和經濟發展，使得日本人對於台灣認識出現轉換，進而促使日本對於台灣的研究日益興盛。

由於甲午戰爭的戰敗，自 1895 年至 1945 年，長達五十年的時間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總督府以及各種行政和研究機關皆保留了龐大的調查資料和研究結果，然而結束殖民之後，戰後日本對於台灣研究的數量明顯地與戰前的台灣研究是無法相比的，戰後關於進行台灣研究時所需之年鑑、統計資料和文獻目錄等等數量較少，且關於收藏台灣政府出版品和相關台灣統計資料的日本大學圖書館亦為數不多。

學者—石田浩將戰後日本的台灣研究學者主要分為以下五大類，即戰前在台，戰後返日的研究者；反共立場的研究者；戰後世代〈1940 後半至 1950 年代出生〉於 1970 年代後開始研究台灣的世代；1960 年代出生的研究學者；台灣人研究者。

戰前在台，戰後返日的研究者大多憑藉著過去的研究基礎，至戰後仍持續進行其研究活動，為日台民間交流時在野研究者的主要來源，然而此一世代的研究人員大多已凋零。反共立場的研究者為明確地批判中國共產黨政權以支持國民黨的蔣介石政權，此一世代的研究者大約為 1940 年代出生，且不單就日本方面，台灣方面也相當依賴此一類型的研究者，於過去，台灣對日本的遊說活動大多傾向於委託這些

反共保守派人士。於 1970 年代後開始研究台灣的研究者世代，其出現從中國研究轉為台灣研究的現象，原因在於他們對中國研究框架下的「中國社會主義萬歲」的價值觀念提出質疑，認為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應給予新的定義，因而於 1998 年成立的「日本台灣學會」其中心人物即為以此世代的研究學者為主。1960 年代出生的研究學者則大多為一開始即視台灣為其專門的研究領域，因此較不易遭受到「反革命、反中國」的意識所限制，在「台灣史研究會」當中即有許多此類型之新興學者加入。而關於台灣人研究者，其特徵為大多於戰後至日本留學，最主要之貢獻為許多台灣留學生於學成後持續留於日本的大學或是研究所任職，其研究成果填補了戰後初期至 1970 年代時期日本對於台灣研究的空窗期（石田 浩，1999：7-9）。

關於戰後日本的台灣研究，石田浩教授將其歸納為以下八個領域，第一個領域為：日本帝國主義史研究、日本殖民地研究。其將台灣研究視為日本殖民地史研究的一環，透過反省過去的侵略戰爭，對日本的侵略戰爭以及殖民地支配進行研究，雖然此類型之研究於戰後初期即出現，然而，直到 1970 年代時日治時期的相關文獻再度重新整理出版促使其更為興盛，但此時期之研究觀點和歷史觀大多為中國中心的史觀，視台灣為中國之一部分，因此對於以台灣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則較為稀少。

第二個領域為：戰後台灣經濟研究。日本於 1950 年代末期逐漸完成戰後復興，開始朝向高度經濟成長期邁入，當日本將資本投向海外之時，關於台灣方面的經濟研究便作為其亞洲鄰近諸國研究的一環展開，在過去，台灣與韓國皆為日本之殖民地，同時也為戰後日本復興完成後的投資對象，因此 1959 年設立的通產省外圍研究機關—亞洲經濟研究所〈2008 年成為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IDE-JETRO〉為其代表性的研究單位，1965 年由於日韓條約和美援停止，自 1966 年開始，轉由日本代替美國提供韓國和台灣援助貸款，也藉於此，強化了日系企業與台灣和韓國的關係，因此台灣經濟研究的重要性便與日俱增。

第三個領域為：台灣史研究。此研究主要將台灣視為明清史研究、民國史研究和國民黨史研究的一環，其歷史研究的主軸仍以中國史為中心，台灣史為其中包含

之一部分，然而此種歷史研究的內容與現今台灣的直接關聯較淺，主要原因為此類型的研究並非以研究現代的台灣歷史為主體。

第四個領域為：原住民的民俗學研究、人類學研究以及民族學研究、社會學研究。此類型的研究從戰前的在台日本人延續至戰後仍維持主流之姿，自 1970 年代開始出現人類學研究和民族學研究，特別是針對原住民的研究，其方法深深受到台灣研究學者的影響，許多是利用日本的研究學者至歐美留學之時，與同樣居於國外的台灣人研究學者認識，進而透過其於台灣從事田野調查，然而此類型的研究學者大多為利用歐美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將台灣視為一個研究的對象，對台灣整體的認識方面則較為有限。

第五個領域為：台灣文學研究。其當初也以中國文學研究的一環為開端，直至 1980 年代後期關於台灣文學評論才逐漸興盛，同時戰前以日語書寫的台灣文學研究亦逐漸受到重視，日本方面更進一步成立有關台灣文學和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研究領域進行研究。

第六個領域為：國際政治研究和國際關係研究。關於國際政治研究與經濟研究一樣，大致可區分為兩大時期，前期的主要研究重心圍繞在國民黨政權之相關議題，後期的研究則主要著墨於 1980 年代末期台灣的民主化以及兩岸關係等等的議題，而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之所以盛行最大的原因在於國際環境情勢的大幅變動，東歐社會主義諸國以及蘇聯的崩壞、東西德的合併、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等國際變化，在亞洲區域當中，南北韓的對立和兩岸之間緊張的關係，皆為各國所密切關切，因此關於台灣方面的直接研究數量大幅增加，自 1990 年代以來，關於兩岸之間的研究為大眾所關切的主流。

第七個領域為：台灣經濟成長研究。大多集中為討論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的一員其在經濟方面的快速成長，當時的台灣處於國民黨一黨獨裁體制的統治之下，直至 1987 年解除戒嚴令，此領域之研究學者認為，台灣經濟的成長立基於出口導向的工業，而此皆為當時國民黨政府所主導之產業政策。

第八個領域為：日台民間交流的台灣研究。自戰後以來，除少部分的研究學者之外，關於台灣方面的研究已中斷了一段時日，對台灣持有高度關心的研究學者雖可以透過台灣的友人或與留學生和研究者之間的互相交流等等獲得與台灣相關的情報，然而對一般的日本人民來說，取得與台灣相關的訊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亦出現了一群能夠以流利日語表達其自身意思的台灣的研究學者和民間人士，藉由以日語介紹的方式，傳遞台灣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等相關事情，因此，戰後時期以來的台灣研究有一部份可說是由在日台灣人所促成，且近年來許多與台灣相關之風俗、食物、歷史、觀光、電影、音樂、傳記 等等一般性圖書於 1970 年代末期逐年增加，且在 1990 年代末期形成了一股台灣風潮(石田 浩，1999：10-13)。

根據「日本台灣學會」所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1945 年～2014 年），於 2014 年為止共收錄 10,715 筆文獻。本文依照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將目前的社會科學領域區分為九類主學門：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區域研究及地理學，以及人文學領域區分為六類主學門：文學（一）（二）、語言學、歷史學、哲學、 藝術學、其他。[2]

將其文獻進行分門別類，得出結果如下：刪去文獻目錄當中重複收納之文獻筆數 79 筆，因此實際文獻筆數為 10636 筆，其中，社會科學領域共計 8455 筆，即：人類學 1148 筆, 社會學 1632 筆，教育學 506 筆，心理學 3 筆，法律學 308 筆，政治學 2066 筆，經濟學 1366 筆，管理學 500 筆，區域研究及地理學 926 筆。人文學領域為 2181 筆，即：文學類 1575 筆，語言學 164 筆，歷史學 109 筆，哲學 0 筆，藝術學 128 筆，其他－人物傳記 205 筆。而本文僅就社會科學領域之文獻進行統計，因此統計數據將排除人文學領域之文獻。1945 年至 2014 年，戰後日本在社會科學

[2]各主學門之子學門或次領域及代碼列表請詳請附錄（一）。

領域下對於台灣之相關文獻分佈比例，如圖 2-1 日本在社會科學領域下對台灣之相關文獻分佈比例：〔1945-201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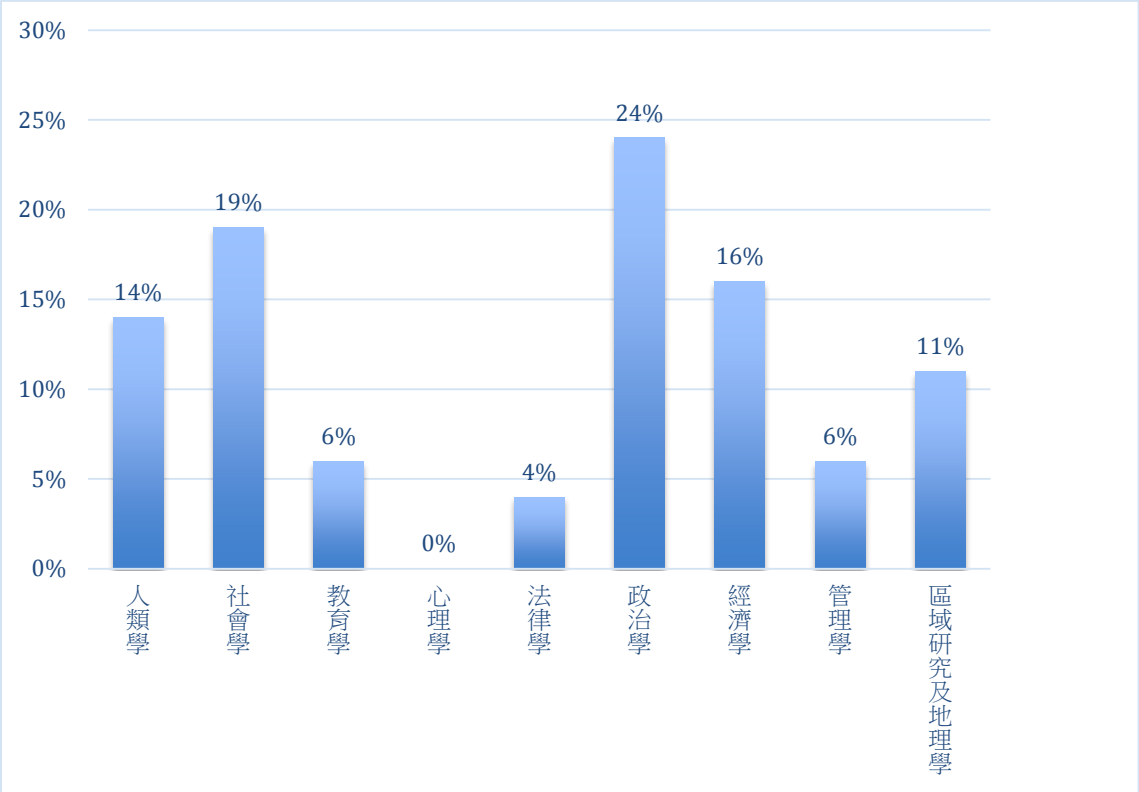


圖 2-1 日本在社會科學領域下對台灣之相關文獻分佈比例：〔1945-2014〕。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資料庫『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在孔恩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當中所提到：「典範」說明了該研究領域中的研究變遷。「典範」做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其該如何在科學進步的過程當中，進而影響政治客體、分析焦點、研究方法、哲學的討論等等研究因素。另外，「典範」說明了不同學科之間的主要分野。藉由政治客體、分析焦點、研究方法、哲學的討論，分辨各項分野其間的界線、相互關係以及相互對話與互補的可能性（孔恩，1992：226-227）。而日本的「台灣研究」隨著時序的更迭，在國內外環境所夾雜的因素下，可發現其研究重心從人類學轉為經濟學再轉為政治學，出現典範轉移

的現象。（詳見圖 2-2〔1945-1974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圖 2-3〔1974-1989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圖 2-4〔1990-2014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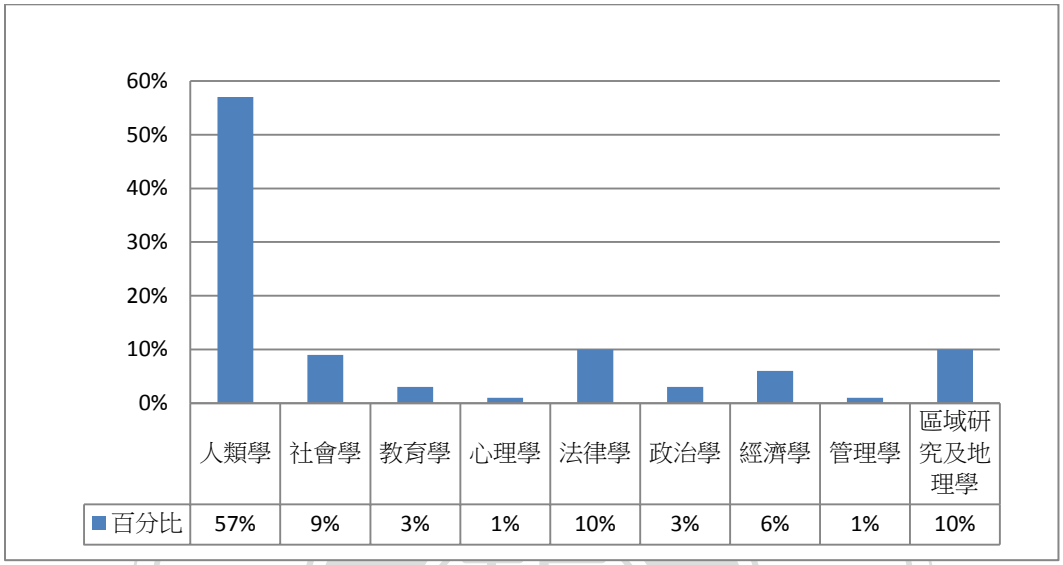


圖 2-2　1945-1974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資料庫『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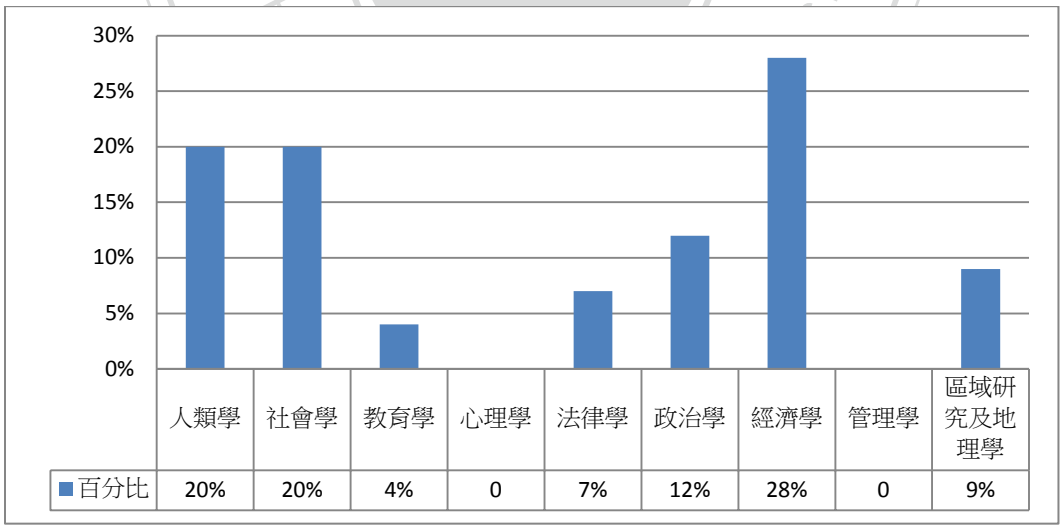


圖 2-3　1974-1989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資料庫『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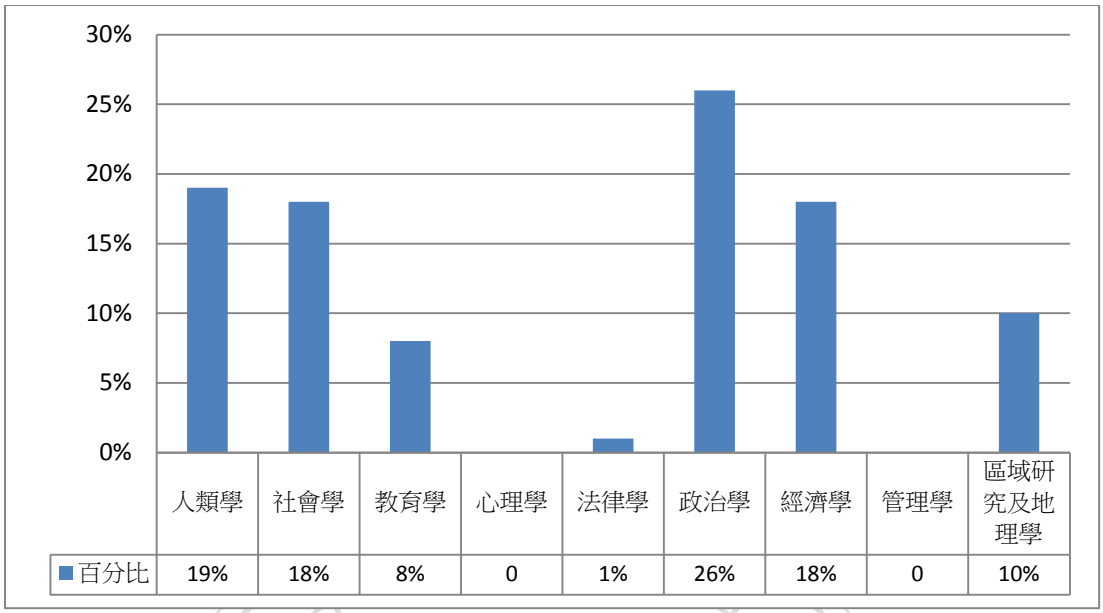


圖 2-4　1990-2014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資料庫『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由於除了將台灣研究之文獻進行分門別類之外，欲進一步繪製出其中的關連圖，因此為了避免九門學門所各自呈現的結果過於紛雜，參考日本社會學科分類的方式，將性質較相近的學門合併為同一領域做為基體以進行頻率統計，即：人類學與區域研究及地理學合併為人文地理領域；社會學因其子學門亦包含媒體傳播在內，故為社會傳播（社会メディア）領域；經濟學與管理學合併為經濟經營領域；法律學與政治學合併為法政領域；另外由於教育方面和本文所欲探討的方向關連性較淺且文獻數量不多，因此同心理學門一樣不計算在其中。其結果為下表2-1〔日本的「台灣研究」文獻於四領域（人文地理領域、社會傳播領域、經濟經營領域、法政領域）之分佈比例〕。計算紀錄於附表。

四つ領域分類 と 年代5年 のクロス表

			年代5年														合計
			1942-1949	1950-1954	1955-1959	1960-1964	1965-1969	1970-1974	1975-1979	1980-1984	1985-1989	1990-1994	1995-1999	2000-2004	2005-2009	2010-2014	
四つ領域分類	人文地理領域	度数	15	24	23	25	38	102	112	146	224	286	179	216	392	292	2074
		四つ領域分類 の %	.7%	1.2%	1.1%	1.2%	1.8%	4.9%	5.4%	7.0%	10.8%	13.8%	8.6%	10.4%	18.9%	14.1%	100.0%
		年代5年 の %	62.5%	72.7%	63.9%	38.5%	27.9%	35.9%	36.1%	53.7%	52.8%	40.7%	26.8%	19.7%	17.4%	17.8%	26.1%
		総和の %	.2%	.3%	.3%	.3%	.5%	1.3%	1.4%	1.8%	2.8%	3.6%	2.3%	2.7%	4.9%	3.7%	26.1%
	社会メディア領域	度数	3	5	2	13	31	75	80	47	51	113	125	303	452	335	1635
		四つ領域分類 の %	.2%	.3%	.1%	.8%	1.9%	4.6%	4.9%	2.9%	3.1%	6.9%	7.6%	18.5%	27.6%	20.5%	100.0%
		年代5年 の %	12.5%	15.2%	5.6%	20.0%	22.8%	26.4%	25.8%	17.3%	12.0%	16.1%	18.7%	27.7%	20.0%	20.4%	20.6%
		総和の %	.0%	.1%	.0%	.2%	.4%	.9%	1.0%	.6%	.6%	1.4%	1.6%	3.8%	5.7%	4.2%	20.6%
	経済経営領域	度数	0	2	3	14	44	47	60	46	99	142	141	241	574	453	1866
		四つ領域分類 の %	0.0%	.1%	.2%	.8%	2.4%	2.5%	3.2%	2.5%	5.3%	7.6%	7.6%	12.9%	30.8%	24.3%	100.0%
		年代5年 の %	0.0%	6.1%	8.3%	21.5%	32.4%	16.5%	19.4%	16.9%	23.3%	20.2%	21.1%	22.0%	25.4%	27.6%	23.5%
		総和の %	0.0%	.0%	.0%	.2%	.6%	.6%	.8%	.6%	1.2%	1.8%	1.8%	3.0%	7.2%	5.7%	23.5%
	法政領域	度数	6	2	8	13	23	60	58	33	50	162	223	335	838	563	2374
		四つ領域分類 の %	.3%	.1%	.3%	.5%	1.0%	2.5%	2.4%	1.4%	2.1%	6.8%	9.4%	14.1%	35.3%	23.7%	100.0%
		年代5年 の %	25.0%	6.1%	22.2%	20.0%	16.9%	21.1%	18.7%	12.1%	11.8%	23.0%	33.4%	30.6%	37.1%	34.3%	29.9%
		総和の %	.1%	.0%	.1%	.2%	.3%	.8%	.7%	.4%	.6%	2.0%	2.8%	4.2%	10.5%	7.1%	29.9%
合計		度数	24	33	36	65	136	284	310	272	424	703	668	1095	2256	1643	7949
		四つ領域分類 の %	.3%	.4%	.5%	.8%	1.7%	3.6%	3.9%	3.4%	5.3%	8.8%	8.4%	13.8%	28.4%	20.7%	100.0%
		年代5年 の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総和の %	.3%	.4%	.5%	.8%	1.7%	3.6%	3.9%	3.4%	5.3%	8.8%	8.4%	13.8%	28.4%	20.7%	100.0%

表 2-1 日本的「台灣研究」文獻於四領域（人文地理領域、社會傳播領域、經濟經營領域、法政領域）之分佈比例。[3]

資料來源：參酌「日本台灣學會」資料庫『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整理繪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 四つ領域分類：四領域分類。社会メディア領域：社會媒體領域。経済経営領域：經濟經營領域。

另外，由於『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當中收錄了一筆 1942 年的法政文獻，因此表格年代從 1942 年開始。

第三章 殖民地記憶遺留的台灣：戰後初期至 1970 年代

第一節 戰前日本對台灣的學術認知

1895 年，清朝於甲午戰爭中戰敗，進而使台灣成為日本帝國擴張之始於海外的第一個殖民地。1895（明治 28）年至 1945（昭和 20）年，長達約 50 年的殖民統治時期，日本面對台灣所進行的主要學門研究便以文化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為其大宗，而其中研究對象為佔居少數的原住民族群，而非當時人口數中佔大多數的漢族系住民為其一個顯要的特徵。

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族研究以其現地調查為基準可區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 1896 年開始，當時日本總督府的統治權力由於尚未武力平定成功而未擴及至山區，因此以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三人為主要研究者之代表，對未知的土地領域以「探險」之方式進行廣域式的調查。

第二時期為 1909 年開始，透過總督府所設置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以官方主導的身份進行「五箇年計劃理蕃事業」的現地調查，雖然於計畫結束之後仍遺留部分地區尚未進行調查，但透過此計畫完成後所發表的報告書-『蕃族調查報告書』以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可視為當時相當寶貴的原住民族之學術資料。然而，當時從事調查與執筆的負責人員：佐山融吉和小島由道等等於調查結束後便未持續進行原住民族之相關研究，因此使得第二時期的原住民族調查研究後期出現了空白的狀態，期間僅剩下森丑之助與原住民族持續保有緊密的信賴關係，因此由此可知，在日本統治下的 50 年當中，日本政府對於原住民族的調查研究並非毫無間斷的。

1928 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替第三時期的原住民族研究帶來一個新的轉機。在此一新設立之帝國大學中，以專家學者們為中心，對於昭和時期的台灣民族學和人類學方面進行更深入的原住民族調查研究。同年，文政學部於台北帝國大學中設立「土俗學、人種學」之講座，相當於現今之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當時研究室之構成人員僅有教授移川子之蔵及其助手兩人，而其學生－馬淵東一則促使原先處於沈滯

狀態之原住民族研究再度發展。同時，此一時期原住民族的自身社會狀況亦發生大規模的變動，1930 年，賽德克族大規模的武裝抗爭，是為霧社事件。於此一事件發生之後，日本總督府對於原住民族之統治方式採更為高壓強制之手段，更加快速強迫地去除原住民族之舊慣，以及強化山地開發和集團移住的促進。此一時期之代表人類學學者為馬淵東一，其於台北帝國大學創立之始，花費十餘年之時間於台灣各地進行原住民族之資料收集(笠原 政治，2012：124-125)。

而東京帝國大學的經濟學部早在 1909 年之時，設立「殖民政策」講座，根據『東京大學百年史』的記載，可追溯該講座的設立緣起與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以及與台灣總督府有淵源的人士之捐贈有著密切的關聯，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後藤新平等人希望能在帝國大學當中設置與殖民地有關之講座，以便培養未來持續經營殖民地之人才，而首任講座教授則由曾任台灣總督府臨時糖務局長的新渡戶稻造擔任。

1920 年，新渡戶由於將任職國際聯盟之因而離開東京帝國大學的教職，其職缺由矢內原忠雄繼任，在 1920 年到 1937 年期間，矢內原忠雄完成了關於殖民地的一系列著作，即為：『殖民政策講義案』(1924)、『殖民及殖民政策』(1926)、『殖民政策的新基調』(1927)、『帝國主義下的台灣』(1929)、『滿洲問題』(1934)，以及『帝國主義下的印度』(1937)，由此可見在矢內原忠雄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之時，已可將「殖民政策」視為一個逐漸邁向結構完整的學問體系（南原繁，1968：671）。

矢內原忠雄在『殖民及殖民政策』的序言中表明其對於殖民地的研究的態度，即為：「說明已為社會事實的殖民及殖民政策之意義，以及殖民對人類，特別是利害相關的殖民國對殖民地與殖民者對原住者的影響，以及殖民地社會各種關係的特色。因此，在如此意味下的殖民研究，應當對於不管是殖民國的國民、殖民地的人民、資本家階級、勞動者階級、帝國主義者亦或是非帝國主義者而言，可視為一種接近沒有偏見的方法。而這是因為以客觀分析為基礎的事實關係之理解，應為實際政策的基礎」（矢內原忠雄，1938：5），而在『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當中，其

主要觀點可視為一「糖業帝國主義」，即透過日本人資本為主的機械製糖業，進一步將殖民地台灣整編成為日本資本主義再生產結構的一部份。

馬淵東一出生於 1909 年，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於日本國內大學中少數接受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教育之研究者。然而，當時位於台灣總督管轄下的台北帝國大學之移川教授的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雖為名義上原住民族行政之相關諮詢機關，實際上總督府行政當局並未將面對原住民族之相關政策制定的人才培育視為重點。比起實際應用於原住民族相關政策制定之專門知識，更偏重於學術色彩濃厚的民族學/文化人類學之研究(笠原 政治，2012：126-127)。

在 1930 至 1932 年間，臺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室，接受了前總督上山滿之進的補助，進而進行長期田野調查，並於一九三五年出版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與馬淵東一共著之『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属の研究』，以及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等兩部巨著，並分別獲得日本學術院賞及恩賜賞，其中『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属の研究』著作將近四分之三的部分為馬淵東一所執筆，其本文內容方面將近六十萬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著作當中並未詳述記述台灣原住民族自十七世紀以來遭受各個外來勢力的影響，而是將重點完全放置於當前日本統治時期下的框架之中。

1931 年，研究學者們發起「南方土俗學會」之組織，且刊行『南方土俗』（後變更名稱為『南方民族』）學會誌，其直至 1943 年間共計發行二十二冊，當中所刊行與原住民族相關聯之論文及調查報告為數不少，可說是昭和前半期中，關於台灣原住民族研究中具有不可抹滅的份量。當時除了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及語言學兩研究室之外，如社會學研究室岡田謙，以及農業經濟研究室奧田彧與增田福太郎等等研究學者，皆投入對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此外，如臺北高等學校出身的鹿野忠雄等學者，亦對於臺灣南島民族誌和東南亞民族學有著重要貢獻 (張隆志，2006：44)。

馬淵東一雖於 1935 年（昭和 10 年）離開台灣，然其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的調查仍持續進行，與原住民族相關之學術論文亦相繼發表，特別是關於原住民族的社會組織、信仰、禮儀和慣習等等加以著墨，其中關於中部山地當中的原住民族-布農族、鄒族的調查當中又以彼此氏族、親族間「靈」的優劣關係持續深入探討，成為一後來主要之研究主題。且在時間的波流下，近年來關於日治時期統治下原住民族相關資料及研究文獻被翻譯、出版的比例亦逐漸提升。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戰後初期台灣研究的趨勢與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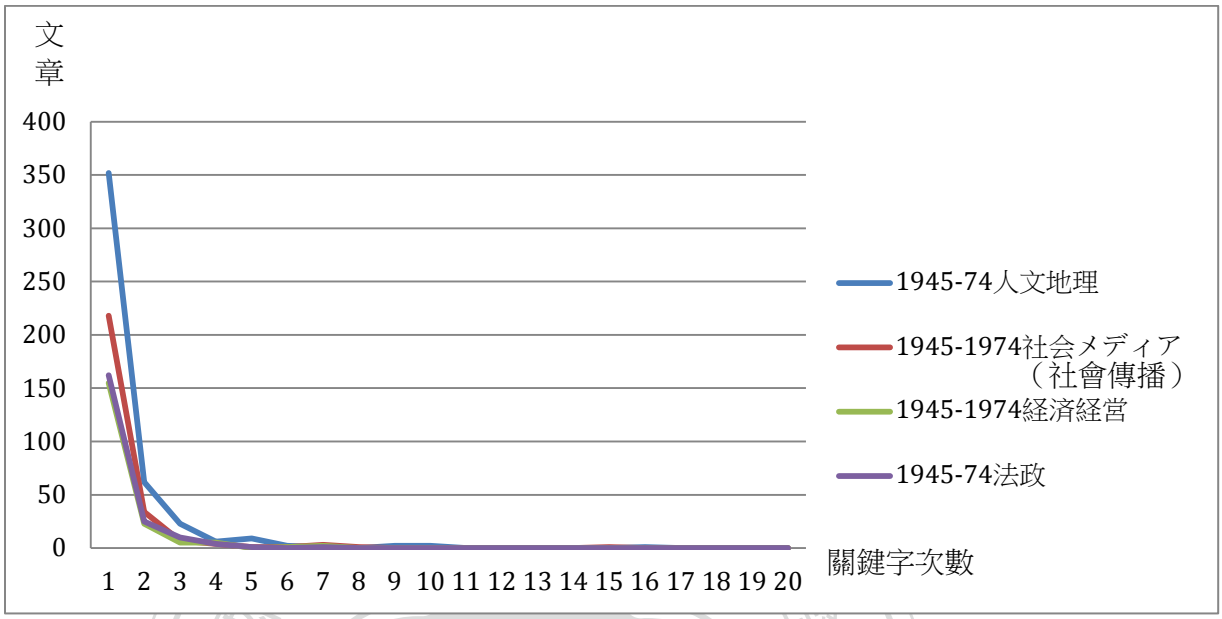


圖 3-1 1945－1974 年關鍵字頻率分佈折線圖。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資料庫『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由「1945－1974 年關鍵字頻率分佈折線圖」，可從中得知 1945-1974 人文地理領域關鍵字從出現頻率五次以後趨於平緩，因可推論出現頻率為五次以上之關鍵字為 1945-1974 人文地理領域中的重要關鍵字，即為：「台灣」、「高砂族」、「民族學」、「道教」、「阿美族」（アミ族）、「中國」、「人類學」、「佛教」、「宗教」、「信仰」、「社會組織」、「先史學」、「日本」、「香港」、「儀禮」、「雅美族」。（詳見附表 表 3-1 1945－1974 年四領域之關鍵字出現次數統計表與附表 表 3-2 1945-1974 年人文地理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另外，由於此一時期所著重之研究重心為「人文地理領域」，故為避免版面紛亂，於此章節僅放置〔1945-1974 人文地理領域關鍵字網絡圖〕，作為重點對象。而此時期的其餘三領域：「社會傳播（社会メディア）領域」、「經濟經營領域」、「法政領域」之統計結果以及關鍵字網絡圖標示於附表之中，以供參考。（社會傳

播領域：附表 3-3、附圖 3-3；經濟經營領域：附表 3-4、附圖 3-4；法政領域：附表 3-5、附圖 3-5）。

1945-1974 人文地理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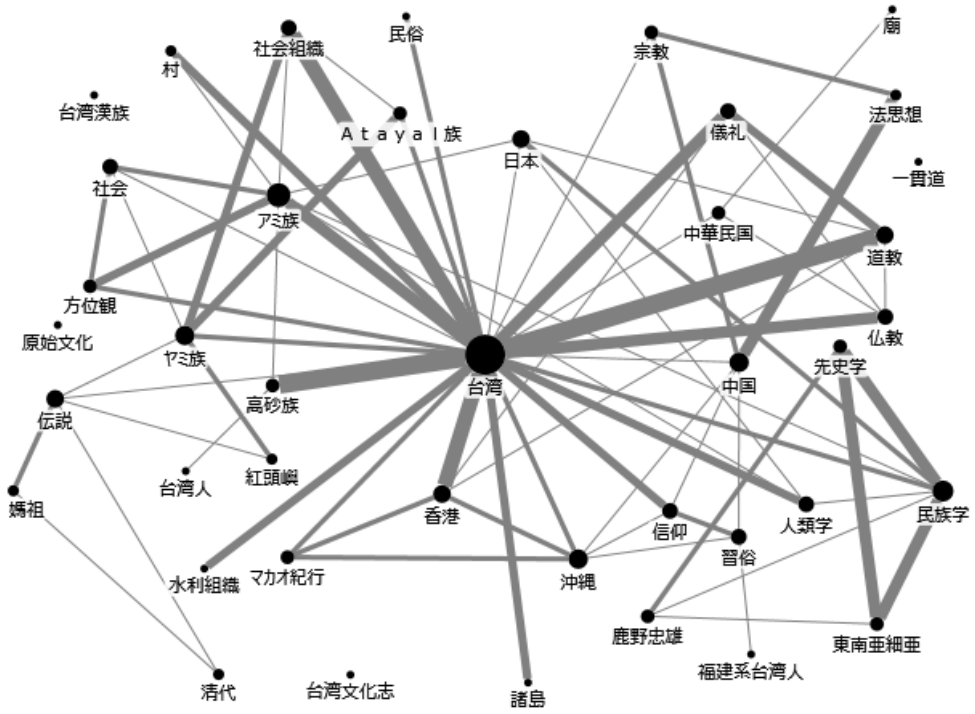


圖 3-2　1945-1974 年人文地理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資料庫『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台灣慣習研究會成立於1900年10月，以兒玉源太郎總督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為正副會長，覆審法院院長鈴木宗言為幹事長，並同時發行期刊『臺灣慣習記事 』。雖然此一組織為一會員制的民間團體，然而其主要成員實則以臺灣總督府、法院和各級地方官吏為主，民間律師醫生及金融界人士為輔。會員人數最多達至二千餘人，於1907年8月解散。1901年10月，台灣總督府以敕令第196號設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會長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擔任，第一部由岡松參太郎及織田萬負責法律制度的調查，第二部由愛久澤直哉與持地六三郎負責經濟制度的調查。並於1909年後增設番族科，著手進行調查臺灣原住民之固有習慣，直至1919年解散。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出版成果，包括以下數冊：『台灣私法與附錄參考書』(1903~1911) 、『清國行政法』(1902~191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1913~1921) 以及『臺灣番族慣習研究』（1921）等重要論著（張隆志，2006：38）。而作為「台灣慣習研究會」的機關誌－『台灣慣習記事』，其自1901年1月創刊，直至1907年8月停刊，共發行七卷八十冊。當中收錄有關清代台灣制度、慣習與民俗等文章、法令及實例等等。其文章的來源約可分成三種: 一是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的調查報告，二是會員個人對於台灣漢人風俗習慣的調查報告，三是會員個人對於「生番」的論著。內容包括台灣歷史地理、動植物、教育語文、宗教民俗、原住民、人口戶口調查、舊慣調查、法制慣習、經濟慣習、公文契字、印譜書籍等各類項目,尤其以法制經濟慣習為大宗。若以成員組成及活動性質而言，「台灣慣習研究會」可說是「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的輔助機構。相較於側重臺灣經濟與法律制度研究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臺灣慣習研究會」的調查則以生活習慣與風俗，例如：分類械鬥、民間信仰、歲時祭祀、生命禮俗、民俗器物等為主，並佐以原住民族的相關調查和報導(張隆志，2006：39)。

然而，除了台灣總督府的官方調查事業外，日本殖民初期臺灣調查研究的另一重點來源是來自於東京帝國大學和東京人類學會的研究學者們。日本殖民地人類學的展開，是以伊能嘉矩 (1867-1925)、鳥居龍藏 (1870-1953)、田代安定、森丑之助等先驅者作為臺灣學術探險之起點。日本於1884年成立東京人類學會，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之殖民地之後，當時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講座教授，同時也是東京人類學會領導者坪井正五郎（1863-1913)便指出，關於面對殖民地研究調查新領土上的人種、體質與風俗習慣為日本人類學者當前之首要任務。同年，日本人類學者伊能嘉矩與田代安定來臺展開實地調查，並於臺北成立臺灣人類學會，以研究臺灣人種的體質風俗習慣為其宗旨，進而修正過去以支那人與熟蕃生番三分法的族群分類方式。

1900年伊能嘉短與粟野傳之丞發表的『臺灣蕃人事情』即首次提出了臺灣原住民的分類架構。而另一方面，1902年來自於東京帝國大學的鳥居龍藏則出版了『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書』，成為第一部臺灣人類學民族誌。在官方的調查研究方面, 1898

年以總督府殖產局前後任局長木村匡及柳本通義為主，發起了蕃情研究會，名譽會長為立見尚文男爵，會員共有六十餘人，並進而分成十三個部門進行調查計畫，且進一步發行『蕃情研究會誌』，直至1900年共計出版四期。其後，於1913年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內成立生蕃研究會，發行會刊『蕃界』一共三期。而伊能嘉矩則除了由總督府殖產局出版其『臺灣蕃政志』(1904)外，同時並參與『臺灣總督府理蕃誌稿』(1911)的編纂工作(張隆志，2006：39-40)。

台灣考古學於1896年正式開始，由於此一階段尚處於日治時期初期，台灣總督府基於統治需要，一方面以武力鎮壓反抗聲音，另一方面則因應施政所需而展開各項學術調查與研究。而當時的人類學大致包含四大分科，即為：體質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以及文化人類學。因此關於初期考古學的研究可以說是主要依賴於調查台灣原住民族之研究學者們身上。在歷經長達五十年的研究過程當中，學者們亦逐漸接受史前文化晚期階段與現存原住民族群的關聯，並進一步尋找部分史前遺物或是遺跡的特質加以對應於原住民族群。而代表研究學者－從早年的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直到活躍於1930年代的鹿野忠雄和國分直一，皆提出對於台灣史前文化或是原住民族群的類緣關係，為從和東南亞的直接連繫擴張到與亞洲大陸的連結關係之觀念演變(劉益昌，2006：76)。

伴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的中心據點也從原來的台北帝國大學轉移至中國國民黨政府隸屬的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學研究所，以及繼承台北帝國大學的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在這兩者的研究機構當中，雖然日籍的研究學者仍具有一定數量，然而超過半數的研究人員則為中國出身的人類學研究學者。

因此，不論是台灣的原住民研究、研究機關、研究主體以及使用的語言等等，皆與戰前的情形有著很大的差別。1980年代，台灣全體社會要求民主化的聲浪愈發高昂，1987年戒嚴令解除，民主化、言論自由的推進亦促進日台之間的原住民族研究的學術交流日益頻繁且密切。在日本方面，研究學者將伊能嘉矩的日記、原稿進一步彙整，並將其中於台灣調查的日記匯集成冊出版，而遠野市立博物館更於1995年舉辦「伊能嘉矩－鄉土與台灣研究的生涯」特別展，其後，關於伊能嘉矩的年譜、

研究手稿與收藏的照片等等透過日本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會出版成冊。而在台灣方面，楊南郡學者於1996年將伊能嘉矩的平埔族關係著作和日記進行翻譯出版，以及台灣大學將所繼承之台北帝國大學的所藏圖書當中伊能嘉矩所收集的文獻資料和相關研究手稿、文物資料編纂成冊，此舉促使伊能嘉矩在台灣社會的知名度悄然興起，學術界中對於伊能嘉矩的研究數量亦大幅提升。

而與鳥居龍藏相關之文獻資料亦於此時期再次翻譯出版，在1988年至1990年期間，東京大學的綜合研究資料館（現今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將所持有的鳥居龍藏的相關相片、資料提交學術研究，當研究計畫完成之後，便將這些文獻向社會大眾公開，其中有關於台灣部分的影像資料於1994年開始在台灣各地巡迴展出，蔚為話題。第三位研究者－森丑之助的研究攝影集『台灣蕃族圖譜』亦於1994年在台北再度整理出版（宮岡真央子，2011：88-90），由此可見，在邁入1990年代之後，不論是日本社會抑或是台灣社會由於雙方之間的互動愈益頻繁，對於彼此在戰前即種下的連結的關注度逐漸加高。同時，台灣政府的原住民族政策部門所實施的政策方針，例如：原住民族的自身部族文化的教育權、在戶籍登記上能夠使用原本的部族名字等等，於法律中明確保障其身為原住民族的身份，促使原住民族的權益和過往相比有所成長，而原先在台北帝國大學出版的『系統所屬の研究』當中將原住民族區分為「九族」，亦透過政府機關的認證下，現今增加為「十四族」（宮岡真央子，2011：9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節 重要研究成果與代表著作

『民俗臺灣』創刊於 1941 年 7 月，在物資缺乏的戰爭時期持續發行至 1945 年 1 月，總共發行了四十三期(第四十四期未出刊)。此雜誌的主要推動者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解剖學教授金關丈夫與臺灣總督府情報部的池田敏雄。 而在籌辦此雜誌之前，岡田謙、須藤利一、金關丈夫、陳紹馨、黃得時、萬造寺龍等日台民間知識人皆共同聯名發表雜誌發行的趣意書，不約而同地提到台灣舊慣即將被消滅的危機感，以及表達對民俗紀錄研究的重視。

當時，『民俗台灣』的時代背景，是處於日本在臺灣的皇民化運動與臺灣民俗急速消滅的危機當中。1936 年，由總督小林擠造所推動的「園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其內容包括廢止新聞中的漢文欄、推行常用國語、強制參拜神社、寺廟整理、推行正廳改善運動、廢止中國式的風俗習慣、實行日本式的日常生活、改成日本式的姓名等等社會動員和同化政策。1940 年 7 月，近衛文麿第二次內閣成立，於 10 月成立大政翼贊會，作為與原有政府官廳並存的全國性動員體系。而臺灣殖民地也在 11 月時，由長谷川清出任臺灣總督，並成立皇民奉公會。1941 年 1 月號的總督府機關雜誌『臺灣時報』便出版「皇民化的再檢討特輯」，分別檢討皇民化政策下的改姓名、經濟生活、語言、家屋建築、寺廟 、農村與農民問題等等。而中村哲的總論「作為文化政策的皇民化問題」，則主張皇民化政策應考慮臺灣的特殊狀況，與內地大政翼贊會文化部地方文化運動相呼應。

相較於同時期由在臺日人西川滿所主持編輯的『文藝臺灣』，『民俗臺灣』的執筆者們更加多元，其中包括了當時臺北帝國大學的學者、在臺的日本文化人和臺灣本地知識人。其中臺灣人作者方面，包含有地方仕紳、醫生、律師、記者和作家等多元面向，其中亦包含數位女性。在內容方面，『民俗臺灣』以研究介紹臺灣風俗慣習為其宗旨，約可分成以下三類：一為投稿文章，有關民俗的研究記錄、文獻介紹、書評問答等等。內容包括日常生活禮俗、歌謠厘諺、民間傳說、 民間工藝、鄉土歷史、語言文字、社會制度等等各類，亦有關於考古發掘、自然誌與原住民習俗的報導。二為專欄文字，其包括卷頭語(金關丈夫等) 、攝影集、 民藝解說(松山

虔三)、民俗圖繪(立石鐵臣)、文獻書評、各地通信、與「亂彈」及「點心」等時事短評。三為特輯，如土林、臺南和北門等地方、新年風俗和厘諺等等，以及童養媳制度等相關專題報導和討論。在面對著當時戰爭的困難時局下，以及皇民化論者的質疑反對，『民俗臺灣』的主要成員除了抱持著民俗即將消滅的危機感, 更積極展現出搶救文化的使命感。且另一方面，伴隨著大東亞戰爭的激烈化，『民俗臺灣』亦面臨到配合日本實施南進政策的學術挑戰（張隆志，2006：44-46）。

1942年日本成立大東亞省，因此『民俗臺灣』的雜誌封面亦於十月號起，由原先強調「臺灣與相關地方風俗習慣的研究介紹」，改成「南方文化的研究介紹」，原本由業餘民俗愛好者組成的民間雜誌，也因為透過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的參與,而進而接受到日本內地民俗學界的注目。柳田國男與臺灣研究學者伊能嘉矩為故識，兩人曾共同討論關於伊能嘉矩於其故鄉-日本岩手縣遠野市之風俗民情,並且在伊能嘉矩過世後，協助出版其代表作『臺灣文化志』。同時，柳田國男更與前臺灣總督安東貞美為叔姪關係，並曾於1917年間訪問臺灣 ，並進而探訪臺灣中部霧社番地及西來庵事件遺址。

1943年10月，柳田國男與『民俗臺灣』之核心人物金關丈夫、中村哲以及岡田謙等人於東京舉辦座談會。其討論內容便以「大東亞民俗學的建設與『民俗臺灣』的使命」為題，出版於1943年十二月號的『民俗臺灣』。柳田國男在此座談會中亦提出三個可以作為共同調查的主題：即為對異者的接待、祖先觀念、結婚道德。並條列出共同的民俗採集調查項目，並分別在東亞各地調查，隨後在進行調查結果的比較工作。

1944年1月, 金關丈夫發表其「國際共同研究課題的提案」，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呼應柳田國男所提出之三大主題範疇內所具體列出之十六個項目。在大東亞各地區創立利用「日本語」收集、分類 、分析的「民俗學」，然後作為與「日本民俗學」比較、對照的研究對象。而關於『民俗臺灣』的轉向及其與日本帝國「大東亞民俗學」的關聯，在1990年代曾引發日本新生代學者川村湊與『民俗臺灣』成員國分直一的論爭，成為殖民地人類學史的重要課題。相較於從日治初期具有殖民地文化統

治和殖民論述性格的「舊慣」調查，『民俗臺灣』成為皇民化運動時期日臺知識人對於鄉土認同與文化保存的重要案例，並進一步反映出日本在戰爭動員體制下，由臺灣總督府、臺北帝國大學、臺灣民間知識人、以及日本內地學界所構成的特殊文化政治生態(張隆志，2006：46-48)。

然而，萌芽於日本殖民後期的臺灣民俗研究，其在戰後並未能發展成為獨立的主流學科。雖然當時參與『民俗臺灣』調查報導的臺灣知識人，例如：楊雲萍、陳紹馨、黃得時、戴炎輝及曹永和等人，其在戰後均成為從事臺灣歷史及社會文化研究的主要人才。但是，在 1953 年出版的『季刊民族學研究』之「臺灣研究特集」(第十八卷第一、二期合刊) ，其中便未將民俗學列為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

而『民俗臺灣』時期的調查報導傳統，除了地方文獻會等機構外，則僅能透過『公論報』臺灣風土版等報章專欄 (1948 年發行至 1955 年停刊，共 195 期) ，以及『臺灣風物』等民間刊物(1951 年創刊迄今)進而加以延續。且另一方面，相較於東亞地區中日韓等國民俗學的延續發展，戰後臺灣民俗的研究傳統，亦出現交叉傳遞和移植混融的現象。源自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與 1920 年代後期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與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學術傳統，則隨著中國大陸學者渡海流亡而輾轉引介至臺灣。例如：中國民俗學者婁子匡與朱介凡等人，除了致力於蒐集臺灣鄉土傳說與歌謠厘諺以外，並同時與歐美漢學家-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 等人合作出版「亞洲民俗、社會生活專刊」等資料叢書。

雖然在 1970 年代，人類學研究學者王崧興等人曾試圖結合中國社會人類學、日本民族學及歐美區域研究的理論傳統，從而進行對於臺灣漢人社會文化的集體研究，但有關於臺灣地方宗教、民間文學，以及民俗曲藝等課題的討論方面，長期以來仍然附屬於中國俗文學、中國地方史及漢人社會研究等等不同學科的領域當中。直到 1980 年代開始，臺灣本土研究風潮漸漸興起，出現了諸位民間學者，例如：劉還月等人投入平埔族群與常民文化的田野調查，而人類學研究學者林美容等人除了探討

臺灣村庄史和民間信仰圈之外，更進一步重新重視劉枝萬等臺灣民俗研究先軀學者的學術業績，並加以追求具臺灣主體性的本土民俗學典範與論述(張隆志，2006：49)。

1894 年，透過日清戰爭，日本獲得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因而成為東亞唯一之帝國主義國家。而認為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之最高階段的列寧所提出之五點帝國主義成立的條件為：一、生產和資本的高度累積，二、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以及金融寡頭制度的成立，三、商品輸出以及資本輸出之重要性，四、資本家所持有之獨佔團體對於世界之分割，五、資本主義列強對於地球上之領土分割。因此，自戰後以來日本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大多承襲列寧帝國主義的論述，特別是 1950 年、1960 年代更出現此種傾向。1970 年代以後，殖民地史的研究數量越發豐富，其問題意識及方法論更進一步擴大(日本植民地研究会編，2008：21)。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四章 經濟奇蹟的台灣：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後期

第一節 1970年代之國際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的對台政策皆受到美國東亞與台灣政策的影響，表現出親台反共的「兩個中國政策」。然而，世界局勢在進入 20 世紀 1970 年代初期時，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1971 年 10 月，中國恢復了其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權益，國際地位因而隨之提高。且同時由於蘇聯奉行大國沙文主義政策，中蘇關係亦由冷淡轉而破裂。另一方面，美國由於越戰情勢所逼，為扭轉與蘇聯的軍備競賽中其逐漸趨於弱勢的局面，進而與當時和蘇聯對立的中國政府接觸，謀求和解，期望透過中國的力量，進而牽制蘇聯的擴張，以維持亞太地區的戰略均勢。

此舉美國式的「越頂外交」在日本政界引起很大的震動，因此於此背景之下，日本的外交政策迅速做出了調整。1972 年 7 月，田中角榮新任內閣總理，隨即與中國進行國交正常化的談判。同年 9 月 29 日，中日雙方簽署『中日聯合聲明』，日本方面進而對其過去的侵略戰爭進行反省，且此聲明中的第二、三條提到：“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此一立場，並堅持貫徹『菠次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進而確立了”七二體制“。

所謂”七二體制“的確立，即為基於中美『上海公報』以及『中日聯合聲明』所規定之框架下建立，即日本政府將保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日台之間將僅限於民間關係交流，不保持政府之間的關係。而日本政府為維持與台灣之間的關係不至於完全破裂，雙方便互相設置了半官方、半民間性質的“日本交流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作為雙方相互交流的聯絡窗口，以持續日台斷交之後實質的交流關係（巴殿君，2010：35-36）。

自 1972 年中日建交以來，日本政府基於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政府當局斷交，僅維持“民間交流”之往來。然而日本的對台政策，實為中日關係之焦點所在，其

不單僅影響日台雙方之關係，更為影響中日關係發展之重要因素。1978 年 8 月 12 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確認『中日聯合聲明』為兩國間和平友好關係的基礎，其當中所表明的各項原則都應予以嚴格遵守。為中日雙方建交之後，其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重要進展。而『中日聯合聲明』中的各項原則之確認，亦成為日後雙方發展國際合作之重要法律基礎（巴殿君，2010：37）。

歷經一連串外交挫敗以及遭受國際孤立之衝擊下，1970 年代初期的台灣對外政策為經濟外交的強化。為使促進台灣內部建設的發展，進而摸索出對外經濟關係實質上的擴大方式。蔣經國將當時政治改革以及經濟建設訂為第一優先目標，而維持能夠支持國內經濟建設的外交環境便為當時對外政策的中心課題之一。

對於此時期的台灣來說，日本與美國所占之總輸入額及總輸出額為五成以上，為當時經濟貿易活動之重點國家，然而，日本方面由於 1970 年春天，松村謙三訪中交涉之際，與當時中國主席周恩來訂下為維持日中貿易，日方所應遵守之四大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拒絕與符合以下四點之企業進行合作：1.受中華民國和韓國援助之企業。2.中華民國以及韓國所投資的企業。3.在越戰當中，以援助美國為目的，進行兵器和彈藥等等軍事物資供給的企業。4.為美國企業之子公司或合夥公司。因此與台灣關係匪淺的住友化學、三菱重工以及在日華協力委員會中的重要成員，包含三井物產等日本四大商社，皆因為「周四條件」的提出，而形成沈重的壓力，因此為了扭轉台灣退出國聯的逆勢，轉而走向「彈性外交」、「現實外交」之外交道路(清水 麗，2009：96)。

日本的台灣研究與日中之間政治、經濟變化有著連帶性的影響,其主要在戰後處理問題上以及台灣地理位置對亞洲安定發展之重要性和日台貿易摩擦的擴大有不容小覷的力量。20 世紀 1960 年代以前，日本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直至 1961 年開始，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台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則退居第二，此一狀態維持將近 40 年之久，直至 1990 年代中期，中國取代美國與日本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巴殿君，2010：111）由此可見，日本與台灣之前的經濟關係一直以來都十分的緊密。

第二節　1970 年代東亞地區的經濟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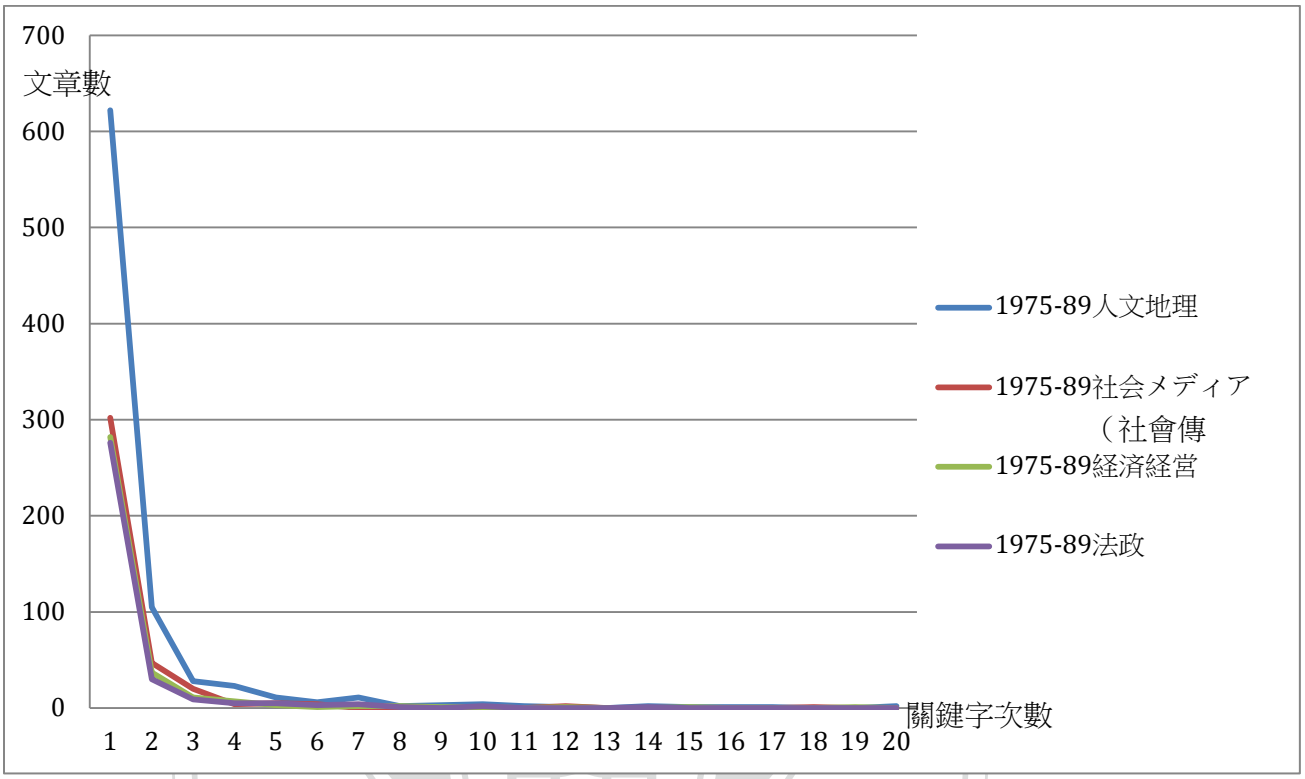


圖 4-1 1975－1989 年關鍵字頻率分佈折線圖。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資料庫『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由「1975－1989 年關鍵字頻率分佈折線圖」，可從中得知 1975-1989 經濟經營領域關鍵字從出現頻率四次以後趨於平緩，因可推論出現頻率為四次以上之關鍵字為 1975-1989 經濟經營領域中的重要關鍵字，即為：「台灣」、「韓國」、「貿易」、「日本」、「殖民地」、「經濟」、「香港」、「產業」、「物價統計」、「中國」、「轉換」、「NIES」、「關稅」、「纖維產業」、「流通事情」、「工業化」、「糖業」、「勞動問題」、「台灣纖維產業關聯統計」、「企業組織」、「東南亞」。詳見附表 4-1〔1975－1989，四領域之關鍵字出現次數統計表〕與附表 4-2〔1975-1989 經濟經營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參考－人文地理領域：附表 3-3、附圖 3-3；社會傳播領域：附表 4-4、附圖 4-4；法政領域：附表 4-5、附圖 4-5）。

1975-89 經濟經營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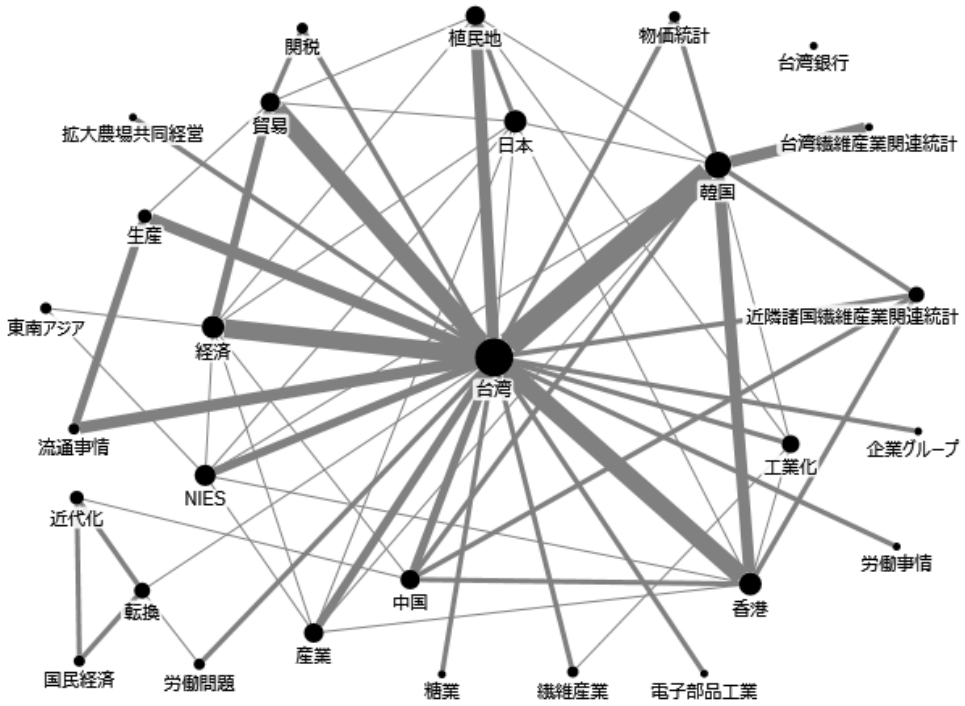


圖 4-2　1975-1989 經濟經營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資料庫『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在 1950 年代及 1960 年代早期，經濟發展學者認為發展的過程是由經濟成長中一連串相繼不斷的階段所組成，且每一個發展的國家都會經過這些階段。而發展主要的代表現象就是迅速的總體經濟成長，在線性階段成長理論裡，最主要的兩個理論及模型為羅斯托(W.W.Rostow)的「經濟成長階段論」(stages of growth)，以及哈羅德－多瑪成長模型(Harrod-Domar growth model)。

美國經濟史學家－Walt W. Rostow，其利用歷史資料觀察各國經濟發展現象，進而歸納出以下結論：所有的經濟體必需通過經濟成長的五個階段才能達到工業國家的地步，此五階段分別為：傳統社會、起飛前的準備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度大眾消費階段。

首先在「傳統社會」中，生產以農業為主，政府形式多為中央集權，人民多以家庭、宗教為生活重心。此時期之社會變革緩慢，大約要歷經數千年，且由於沒有生產技術之進步，因此人民多抱持「宿命論」之角度看待生命。第二階段為「起飛前的準備階段」，在牛頓帶領新科學之發展後，人民開始以新知識從事農業及農業之外的活動，因此將生活之價值逐漸轉向於經濟活動之提升，也由於生產技術有所進步，人類開始認為命運是可以改變的。此時，人類也開始注重對於教育方法之改變，也因此有新企業家出現，也由於經濟活動開始發達，金融借貸之行為也因運而生。

根據羅斯托之推估，此階段大約要持續一百至兩百年左右。第三階段為「起飛階段」，在此階段中投資之數額增加許多，生產上也出現了領導部門，帶動其他部門之發展，在投資之加速效果之下，整個社會與經濟有大幅度之成長。且根據羅斯托之估計，從起飛前準備至起飛大約需歷時三十年之時間。第四階段為「成熟階段」，此時農業人口下降許多，生產以工業為主，因此有技術的勞動力增加，高度分工及專業化之生產方式亦出現，在經營上，所有權與經營權開始分離，使得生產力大幅增加。此時各項法律也逐漸完善，勞動之立法也朝人道化方向前進。而最後一階段為「高度大眾消費階段」，此時產業之領導部門由工業轉為耐久財之生產，而第三級產業之結構比重亦增加，具有技術之勞動力占所有勞動人口之比例上升很快。都市人口在此階段大量增加，許多城鎮也開始都市化，人民也開始注重休閒生活，有大量消費之行為出現。

而哈羅德—多瑪成長模型則為 1940 年代，Roy Harrod 和 Evsey Domar 分別提出一個數學模型，主要解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成長和失業之間的關係。此模型後來被大量使用於解釋發展中國家成長和資本需求(capital requirement)間的關係，為最簡單及最著名以生產函數來分析經濟發展之模型。在此兩人的模型當中，一個國家經濟起飛發展之主要因素在於動員國內和國外的儲蓄，以產生足夠的投資來加速經濟成長。因此哈羅德—多瑪成長模型主要的目的即是為說明投資與成長之間的關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8-9)。

而日本方面，早在 1930 年代，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便根據日本紡織業與機械業的經驗與統計，而提出古典版雁行理論。就本質上，古典雁行理論的基本命題有三項: (一)世界各主要國家可分成東亞、歐洲與美洲等三大雁群。每個雁群各有其雁首或先進國(advanced or leading countries)，如東亞的日本、美洲的美國與歐洲的西歐。雁首之後，分別是新興國(middle or newly rising countries)與後進國(follower countries)。(二)雁群內，各國依其產業發展層級，將形成「人字形」或倒 V 字形的階梯或階層。

然而，先進國、中間國與後進國所構成的階層並非僵硬不變，而是依結構因素而變換位置。先進國可能被中間國或後進國趕上，中間國也可能被後進國趕上，但這種「趕超」並非定律，亦即雁行理論並非論斷後進國一定能超趕前面國家，至於能否超趕則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產業政策與國際經濟情勢等。(三)新興工業國家要推動產業發展，通常有一定順序亦即先進口勞力密集產品，再透過進口替代工業化，生產原先進口的勞力密集產品，最後則因技術成熟與市場飽和，再透過出口導向工業化，輸出國內生產的勞力密集產品，甚至進入產業外移階段。1930 年代，赤松要提出「雁行理論」，指出雁行模式的發展階段、過程與結構。這企圖推論與解釋日本與其他開發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的產業發展。

赤松要認為，世界上所有國家可依其工業化與經濟成長，分成不同的階層：先進國、中間國與跟隨國。雖然，這三層次是依各自的技術能力、經濟成長而排列，但其地位則是彼此競爭而非固定的。先進國努力維持領先，造成先進國與後進國的產業結構異質化，這使先進國的產業與技術發展層次均領先後進國，例如先進國的資本密集產業結構與後進國的勞力密集產業結構之對比等等。

然而，依雁行理論之「超趕」工業化過程，後進國將試圖努力趕上，若後進國能達到先進國的層次，從勞力密集升級到資本密集，則後進國與先進國即處於產業同質化(homogenization)階段。但若先進國能再升級至技術密集層次，則先進國與後進國的產業發展層次即再度表現為異質化。如果先進國不能持續升級，甚至被後進國趕上，則後進國就可能成為先進國，甚至成為雁首。依雁行理論之內涵，日本被

稱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而亞洲四小龍(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或稱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簡稱 NIEs)的發展幾乎是依循日本腳步亦步亦趨。因此，日本的夕陽產業如紡織、家電業等，透過貿易或直接投資而傳遞給台灣、南韓等等。

1970 年代以來，亞洲四小龍的多數製造業承接自日本，到 1980 年代初期，東南亞國協(ASEAN)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尼,也繼亞洲四小龍之後成為接棒者。亦即東亞的產業發展歷程，基本上是呈現出：日本→亞洲四小龍→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尼)之發展模式。就產業結構而言,當某些產品在日本的競爭力已逐漸趨弱，且已不具競爭優勢時，日本會將這類產品的技術移轉至東亞新興國家，而繼續在這些國家生產以延續產品的比較利益或生命週期，然而，隨著產品技術在東亞新興國家成熟後，這些產品又可能下移至更落後國家。這過程將使產品能不斷在不同國家間生產，而原先國家生產產品的層次也就逐漸提升。因此基本上，亞洲四小龍已成功承接日本的夕陽產業而提升產品技術層次，並再進一步交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尼，成為繼日本之後的第二代雁首（江和華、林香吟，2014：71-72）。

赤松要強調，在一個區域性國際體系中，由於經濟成長與發展的共同意識與目標，因此可分成「領導」與「追隨」兩個具有次序性的群體，然而，國家或地區間的相對位置並非一成不變，一旦追隨者的發展速度與程度超過領先國家，後者的領導位置便可能遭到根本取代。而就日本而言，其雁行機制是由四個基本要素組成，亦即：(1)由政府支撐的銀行財務體系與受壓抑的資本市場，(2)財閥模式與交叉持股的影響，(3)內部依賴性產業部門與政治保護措施，(4)工作優先與效率原則的社會契約概念，而上述四項要素都對日本經濟有著深厚影響。

台灣自 1953 年以來，歷經多次經濟建設計畫。其具備三項特徵，第一：來自美國之經濟援助自 1950 年代起十五年間，平均一年一億美元之援助金額，成為當時經濟建設計畫（第一次～第三次）之最主要來源。第二：克服殖民地經濟的構造以及確立自立的經濟體制成為其首要的政策方針，因此為了達成目標，整備社會資本，

進而以邁入工業化作為其方向。第三：去除石油危機時所造成經濟發展的激烈變動原因以外，原則上看來政府所訂定之計畫目標與實際績效之間並無太大的差距。

1953 年至 1960 年間為第一～二次經濟建設四年計畫之實施時期，在此計畫實施之前，是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受波及之農業生產力及工業的復興時期，因此此時期之重點工業化目標為建設以輕工業為主且內需導向的產業。並且進而保護新興產業，導入華僑與外國人的直接投資，實施國內民間投資獎勵等等方式，同時，促進化學肥料和電力方面等等公營企業領域的建設和擴展。

1961 年至 1972 年間為第三～五次經濟建設計畫實施時期，此時期的戰略目標之一為，培育輕工業成為輸出產業的重點，而為了促使民間投資更加積極，實施稅制上的優遇措施，提升投資環境的容易度，直至後半期，進而將重化學工業的建設訂定為另一個戰略目標。因此自 1970 年代以來，長期性的大規模公共事業計畫即逐漸成為經濟建設計畫的政策中心（谷浦孝雄 編，1988：25）。

台灣自 1965 年經濟起飛後，工業建設加速成長，對外貿易亦相對開展，但是公共建設及重要原料已無法適應需求，使得經濟發展遭到限制。自 1974 年以來，共實施三次大規模公共事業計畫（十大建設、十二項目建設及十四項目建設），其對於 1970 年代以後台灣的經濟社會開發和工業化帶來很大的影響。以短期面向來看，實施「十大建設」是當時在 1973 年 10 月，全球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使得油價上漲、物資短缺，導致各國通貨膨脹，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前提影響，為提升跟深化總體經濟發展，以刺激景氣復甦及提高人力雇用率所做出的決策，若以長期面向來說，台灣政府將台灣經濟開發的基盤整備以及工業化，特別是重化學工業的發展定為此時期的公共事業目標，而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亦發表了「在完成十大建設之後，台灣將成為重化學工業國」的言論（谷浦孝雄 編，1988：26）。

戰後日本企業的對台投資始於 1953 年，日本企業的對台投資在 196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末期形成第一波。由於台灣當局的加工出口區等外資吸引政策，以及日本人事成本高漲等內外產業環境的變遷之下，日本企業於是開始尋找海外生產據點，

至 1970 年代末期為止，來台投資的日本企業多以利用台灣的廉價勞力之出口導向的家電產業和電器產業為中心。

台灣日立電視、台灣 Canon、台灣瀧澤科技、台灣松下電器、台灣三菱電梯、台灣兄弟公司為此時期的代表性企業。1980 年代後，日本企業對台投資主要以精密機械產業和汽車產業為主。尤其在 1985 年的廣場協議之推波助瀾下，形成日本企業對台投資的第二波高峰。而台灣政府方面，為了構築區位優勢，在 1986 年時開放外資對服務業的投資，1987 年則廢除出口義務規定，以及對海外匯款的鬆綁。在此時期，尤其是汽車產業與汽車零組件產業，日本企業具支配性的地位，對台灣企業的生產方式改革與生產力提升有相當深遠的影響（黎立仁，2012：33）。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節　重要研究成果與代表著作

由隅谷三喜男、劉進慶及涂照彥三位學者所著之『台湾の経済—典型 NIES の光と影』一書，偏重日據時代及二次大戰後之研究，並詳盡地敘述台灣經濟狀態發展之脈絡。自 1953 年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經歷許多不同的階段，每階段各有其特色。可將經濟發展分為以下六個階段：

1. 第一階段:1945 年至 1952 年為重建時期

民國 38 年之前，台灣原有建設遭受戰爭破壞及大陸局勢混亂的影響，未能進行重建的工作。到了民國 38 年，政府為了穩定物價和刺激農工生產，6 月 15 日實施幣制改革。另外，實施外匯管制、土地改革、對部分農工產品實施管制出口以及積極進行交通運輸設施的修建工作。此實施結果為，民國 41 年時，農工生產和交通運輸營運已逐漸恢復至光復前最高水準，且物價亦趨於穩定。

2. 第二階段：自 1953 年至 1960 年為進口替代時期

自 1953 年開始實施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主要經濟發展目標為發展工業，並進而創造就業機會。在在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策略下，第二階段的農、工生產值大幅提高，平均每年增產幅度分別為 5.0%、11.7%，實質經濟成長率則平均每年達至 7.6%。

3. 第三階段：自 1961 年至 1972 年為出口擴張時期

由於台灣內需市場小，至 1950 年代末期，當中部分產品在國內市場已趨於飽和狀態，政府在上一階段的末期，即開始採取新台幣貶值、外銷退稅、外銷低利貸款，以及至 1961 年設立加工出口區等以進而鼓勵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和拓展國外市場。本階段成長結果為，每年平均出口成長 27.4%，工業生產增加 17.6%，經濟成長 10.2%，而物價卻僅上漲 3.3%，因此達成了穩定與成長的雙重目標。

4. 第四階段：自 1973 年至 1983 年為經濟結構轉變時期

在第四階段時期，因遭受到兩次石油危機，國內物價上漲，且另外加上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致使台灣的出口減緩，經濟成長較上期緩慢。而為因應國際環境的改變，本階段以「穩定中求成長」為原則，來穩定國內物價為重心。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政府於 1974 年實施「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而在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為平抑物價膨脹，進而採取緊縮性的金融政策，以促進經濟復甦。此外，十項建設計畫亦陸續完成，之後政府亦陸續推動十二項重要建設，使得台灣經濟在全世界經濟景氣低迷之情形下，仍能維持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 8.1%的狀態。

5. 第五階段：自 1984 年至 1990 年為加速推動經濟自由化時期

自 1980 年代以來，台灣大量的超額儲蓄與工資上漲已逐漸引發工業升級緩慢、流動性資金過剩威脅金融安定等因素，不利經濟發展。此外，不斷累積鉅額出超的狀況亦使貿易摩擦加劇和物價膨脹壓力等問題發生。因此為導正總體經濟失衡，政府於 1984 年宣布「經濟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的政策方向，並於同年 9 月宣布推動「十四項重要建設」，1985 年 5 月成立「經濟革新委員會」，檢討並策劃經濟革新的原則與方向。而第五階段實施結果，使得台灣年平均經濟成長率達至 8.7%，消費者與物價年增率平均為 1.5%，呈現平穩的狀態。

6. 第六階段：自 1990 年以後為推動公共建設，發揮民間企業活力的時期

1990 年以後，政府推動「國家建設六年計畫(1990 年至 1996 年)」，加強公共建設，以厚植產業發展的基礎，並讓民間企業參與國家建設計畫。1991 年 6 月，立法院修訂通過「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1993 年 6 月行政院通過「振興經濟方案－促進民間投資行動計畫」，1994 年通過「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1995 年推動亞太營運中心。其在在顯示出台灣政府的經濟政策已走向以發揮民間活力為主的策略，而政府的功能則著重於塑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因此，1990 年代以後台灣的經濟發展亦邁入另一種新的面向。在台灣的產業發展上，過去政府強調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三級產業均衡發展，三級產業中，又以工業部門的發展關連性較廣，能有效促進資本形成，因此，較易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

而政府過去對於台灣工業的發展則可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1. 第一階段:自 1945 年至 1952 年為戰後重建時期。

1949 年中央政府遷台，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恢復對台灣之經濟援助，使得台灣在重建工作方面得以加速進行。同時，政府為增加工業生產以及考量當時有限的人力與物力和經濟所需所能發揮的最大效能，因此決定優先發展工業動力來源的電力、農業生產必需的肥料工業、以及民生必需且耗用大量外匯的紡織工業，以做為優先發展的產業，因此奠定了農工生產的基礎。

2. 第二階段：自 1953 年至 1972 年為發展輕工業時期。

1950 年代以來，以進口替代為主的輕工業，例如：紡織業、食品、合板、水泥、平板玻璃、味精、化學品、電器業等等，在透過政府扶植和保護之下快速地成長，然而卻逐漸因面臨到國內市場的飽合，因此需向外拓展市場，才能進一步地促使產能增加。因此，政府採取了鼓勵外銷措施的方式，到了 1960 年代，許多早期發展之勞力密集的輕工業，紛紛進軍國外市場，輕工業也因而快速成長。另外，關於人造纖維、塑膠原料、鋼鐵、機械、汽車和造船等等，屬於高技術且需投下較多資金的重化工業的領域，亦有所發展。在 1960 年代，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加為 16.4%，為 1950 年代成長速度的 1.4 倍。

3. 第三階段：自 1973 年至 1983 年為發展重化工業的時期。

1970年代，進行的第二次進口替代政策，即替代重化工業原料及零組件之進口，亦為 1970 年代工業發展的重點。重化工業包括了鋼鐵、煉銅、煉鋁等等基本金屬工業，造船、汽車、機車等交通運輸工具業，塑膠、人纖所需的中間原料，以及乙烯、丙烯等石化工業，機械、重電機、電子組件等工業在 1970 年代中均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在 1970 年代，政府所推動十大建設中之一貫作業鋼鐵廠、造船廠及石油化學工業等等，皆加速了達成第二次進口替代的目標。而 1970 年代期間，工業生產平均每年成長率為 13.5%。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4. 第四階段：自 1984 年至 1990 年為發展策略性工業時期。

由於此時期台灣許多的產業發展已逐漸步入成熟期，而政府為了持續產業發展，在第四階段則選擇了市場潛力大、關聯效果大、附加價值高、技術密度高、能源係數低及污染程度低的工業，作為策略性發展的對象，同時給予資金的補助，並且在技術、管理及市場等方面予以輔導，發揮促進產業升級,改善產業結構的功能。1983 至 1987 年之中，除了 1985 年外，工業生產各年均有 10%以上的高成長。1986 年下半年起，由於長期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外匯存底加速累積，造成了新台幣對美元匯率大幅升值的情形，也因於此，使得台灣產品的外銷競爭力減弱。

另外加上此時期環保運動盛行和勞工意識的逐漸抬頭，生產成本因而增加，使得傳統產業面臨生存困難，紛紛移至國外工資低廉的國家進行生產，例如：紡織業、成衣服飾業、皮革業、木竹製品業、雜項工業等等皆大量移至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及中國大陸等地設廠，造成工業生產迅速降低，1988 年僅小幅成長 4.4%，1989 年則降至 3.7%。整體而言，1982 年至 1988 年間，工業生產平均每年成長 7.7%，其中重工業部分年成長 9.8%，輕工業則成長 5.7%。

5. 第五階段：自 1991 年以後為發展高科技工業時期。

1991 年以後為了加速產業升級，政府推動了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之十大新興高科技工業、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及建立亞太營運中心。其中，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中，除了加速傳統勞力密集產業升級，以維持國際競爭力外，並選擇以通訊、資訊、消費性電子、半導體、精密器械與自動化、航太、高級材料、特用化學及製藥、醫療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項高科技產業，作為發展的重點，期望作為未來工業發展的主力（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2-4）。

學者凃照彥認為矢內原忠雄之『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可說是對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對於台灣經濟所提出之最早的科學研究，尤其在透過國家資本與日本國內資本的相互配合之下，如何使得其在台灣經濟的取得上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為此研究的著墨焦點。然而，另一方面，凃照彥亦指出矢內原忠雄最大的研究問題在於只強調

國家的角色，而「未能將台灣土著社會的傳統經濟構造，列入分析對象」，以致於矢內原忠雄所描繪出來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經濟，只是日本國內資本在台灣的活動情形而已，針對此點，凃照彥提出了「台灣經濟本位」的觀點，在其所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當中的第五章「土著資本的對應與變貌」，對於台灣本地資本的應對情形給予具體地描繪，進而補足了當年矢內原忠雄研究的不足之處（凃照彥，1975：2-3 ）。

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凃照彥從經濟學的層面作為其研究的切入點，進而觀察台灣經濟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下，其各階層所遭受到的影響與改變，並將重點放置於殖民地與殖民者雙方在經濟學領域、治理政策、歷史因素與背景之上，以進行更深入地交互探討，同時藉由經濟學的角度，討論經濟基底的農業之衝擊與影響和個別資本的活動，以衍伸至台灣經濟的殖民地化過程，並且分別從兩個角度，即：日本資本的入侵以及本地資本的抵抗，進而分析以日本資本的統治及擴張的實際狀況、台灣本地資本的存在情形、本地資本的獨特累積模式、日本的殖民政策、發生民族運動的必然性、本地地主制的變化等等。

在日本殖民時期以前，台灣的土地被稱之為「荒蕪之地」，或是以共同方式佔有的「藩地」（即原住民族所被侵占的土地），透過富豪租用或是給予的方式，讓身無分文的無業者到台灣來藉此發跡。逐漸地，商業都市建立起來，即為俗稱的「一府二鹿三艋甲」。1843 年，大租戶向政府繳交的地租，由納穀制改為納銀制，由此可知當時台灣的商業流通已經非常發達，且農產品已經逐漸商品化。

當時最主要的農產品為：茶、糖、樟腦，外國洋行亦發現此一龐大商機，伺機介入當時台灣最大的大稻埕茶葉市場。另一方面，由於台灣早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經形成，以致日本人較難進行原始掠奪或是收買，為解決此一困境，製糖公司不得不向蔗農購買作為原料的甘蔗，而日本糖業資本便透過與國家權力相勾結，進而對農民進行剝削。在當時，糖、米為兩大對外輸出的生產產品，形成日本資本主義再生產結構的一環，也因於此，出現了「米糖相剋」的問題。但凃照彥認為，其根本問題在於台灣固有的土地私有制所引起的阻礙作用，地主勢力主要以小租戶為中

心，而隨著地主制的漸漸擴大，日本總督府難以排除其固有的勢力，因此在台灣的資本主義化中，不得不保存並利用地主制以求其發展。

日本殖民時代初期，日本總督府開始了一連串的改革，1897 年，實施三段警備體制，面對土匪最猖獗的一等地區，派駐「軍隊」充當警備，而土匪騷亂較輕的平地市街則劃為三等地區，以「警察」維持治安，二等地區則以憲兵為主，主要從事警備工作。另外，為了便於管理鄉黨，亦實施保甲制度，即：十家為一牌，設牌位牌頭；十牌為一甲，甲設甲長；十甲為一保，保設保正，以便平時能利用其整理戶頭，監視本地人的行動。1898 年，進行土地丈量，其所丈量到的面積比劉銘傳時期增加了 71%，因此日本總督府將隱田收歸國有，此舉導致大租戶不敢不申報土地，也急欲與日本人改善關係，使其能承認其土地。金融方面則為建立台灣銀行，完善貨幣制度，以改善當時混亂的貨幣流通狀況。

當時的日本正走向加工進口產業，然而其面對原料的進口相當困難，且從其他國家進口又被其他國家給壟斷，因此必須讓台灣進行生產原料的工作，如此一來，日本總督府不但防止外匯流出，更使得原本糖廠的本地勢力皆被日本勢力所驅逐離開，並以國家權力進行保護關稅政策，以保住日本國內的市場。同時，日本也將蓬萊米引進台灣，以收購價格的方式，優待種植蓬萊米，造成台灣原有的再來米的價格產生崩跌。

由台灣所生產的蓬萊米剛好能夠銜接日本本地所種植的一期稻作，因而穩定了日本的稻米市場，且高達 80～90%的蓬萊米都用於出口。由於種植稻米的獲利遠高於甘蔗，導致甘蔗的種植數量逐漸減少且被稻米所取代，導致米糖相剋。造成米糖相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日本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構問題，由於地主勢力的頑強抵抗，加上農民傳統對農地的眷戀，導致日本總督府無法將集團農地全部收購。最初，日本在台灣進行一系列的糖業發展，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量需求，因而使得糖業發展的腳步持續加快，然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落幕，隨之而來的生產過剩問題便映入眼簾，糖價的一落千丈導致台灣糖業的虧損及農民放棄種植甘蔗，改種稻米。台灣的糖業約有 80%的甘蔗是由當地農民及地主所栽培，但流通及加工則完全

被日本人所掌握。稻米則相反，米穀由農民生產，交易及流通由本地商人或地主進行，日本人只能通過籠絡政策，籠絡當地地主，進而壟斷出口。為了解決米糖相剋的問題，日本運用國家強權的介入，透過調整價格，獎勵種植甘蔗的農民，並透過建立「嘉南大圳」，藉由配水強制當地農民進行農耕。

在過去，台灣的甘蔗是以實務分份制（分糖法），但日本殖民化改為現金交易制（甘蔗收購法），讓貨幣進入農業裡，且製糖公司的資本家使用機器和蒸汽灌溉生產，此一變化使得正式勞工的需求量大大減少，1930 年，台灣製糖公司分發每人一百甲或兩百甲的佃耕地給負責擴大甘蔗栽種面積的原料獎勵委員會，再進一步藉由他們分租給農民佃耕，此舉造就出大租戶向國家納稅，而原料委員（小租戶）繳納佃租，再度複製了地主制的局面，而直屬佃耕蔗農的負擔亦十分沉重，由於土地的零細化，激化了農民之間謀求佃耕地的競爭，導致農民不得不為了生存而忍受不合理的剝削。

1901 年至 1905 年，台灣的本地資本設立六間小規模的機械製糖廠，而日本資本方面則只有三井和賀田設立製糖廠。1906 年至 1908 年，明治製糖、大日本製糖及東洋製糖等資本進駐台灣，台灣的本地資本快速萎縮，1909 年至 1913 年，日本資本為能確實掌握生命線，收買本地資本經營的改良糖廍而設立製糖會社。

1905 年至 1914 年，日本完成了對台灣的基礎工程，同時，由於日俄戰爭的勝利，促使日本進入名副其實的帝國主義階段。以糖業為中心的日本資本積極向台灣擴張，並著手讓台灣本地資本「從屬化」。 1915 至 1931 年，台灣本地資本被納入日本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結構之中，部分本地資本與日本統治勾結，加強了買辦轉化的傾向，同時亦志向於政治改革，其中尤以林獻堂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主。

1921 年，台灣文化協會開始其第一次的議會設置情願運動，向日本總督府要求參政權，針對日本的同化主義、內地延伸主義，主張台灣應保有其特殊性，台灣的民族運動與這些戰後興起的農民運動及工人運動不無關係，這些階級運動的主要爭議對象，是日本人的大資本家和總督府，但是，民族運動和階級運動兩者之間並不

存在相互結合的必然性，階級運動並非以驅逐在台灣的日本資本勢力為最終目標，而是進一步要打破以民族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地主私有制。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五章 兩岸關係下的台灣：1990年代至2014年

第一節 台灣的民主化

時序進入1990年代，不論是經濟亦或是政治上的變化都促使台灣社會產生劇變，而其中構造層面的變動為主要原因。台灣歷經日本殖民時期和國民黨蔣氏父子之統治，因此可將台灣社會視為一種「外來者」與「原住者」的二元對立，以及「統治層」和「被統治層」的二層構造下所組成（沼崎一郎、佐藤幸人編，2012：38）。

遠自日本殖民之前，台灣社會便存在著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二元對立關係，然而在日本殖民時期時，身為外來者的日本人以殖民者的身份統治著於更早之前即居住在此地的漢人和原住民族群，使得原先漢人和原住民族的二元對立的構造變動，合併為同一構造層，形成日本人（統治層）與漢人和原住民族（被統治層）間的二元關係（沼崎一郎，2014：48）。

伴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其喪失對於台灣之統治權，蔣介石政權於1944年4月設置台灣調查委員會，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1949年底，國民黨敗退至台灣，透過《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戒嚴令》等非常時期的法制來維繫其統治，並在1950年代初期進行「黨改造」來強化「領袖（蔣介石）－國民黨－中華民國」此統治架構的基礎，這個漸趨一元並穩固下來的政治體制，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後半解除戒嚴為止。

因此台灣社會的統治者從日本人再度變更為中國大陸出身的「外省人」，接手自日本殖民時期所殘存之大部統治機關，同時進一步加強特務機關和監視體制，造成「白色恐怖」籠罩台灣社會，此時期的二元關係轉變為統治層的「外省人」（中國大陸出身）與被統治層的「本省人」（台灣出身）和原住民族群（沼崎一郎，2014：74）。自蔣經國政權過渡到李登輝政權，隨著國內外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轉變，原先根深於台灣社會的二元結構關係似乎也開始出現流動的現象，多元化的族群認同以

及新移民的加入等逐漸滲入二元結構的鴻溝，進而填補，往多元構造延伸、發展(沼崎一郎，2014：91)。

1960年代以前，在台灣本土有兩股政治反對勢力，一股是以大陸籍的反對人士為主，並以籌辦「自由中國」月刊為政治鼓吹的勢力；另一股則是藉國民黨所開放地方選舉中，藉選票而擊敗國民黨候選人的本土異議人士。

1949年，在國民黨即將撤守中國大陸之際，部分國民黨員和社會中層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數度集合，認為應辦刊物，以宣揚「自由與民主」，對抗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其後由於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軍援臺灣後，使得國民黨對「自由中國」的興趣降低，而另一方面，自由中國的言論也逐漸從對共黨專政的批判轉移至對臺灣內部政治問題的檢討。

從1951年6月至1960年9月，「自由中國」的批判言論節節升高，其所提出之議題，例如：蔣介石連任問題、軍隊國家化、黨要尊重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內閣制精神、尊重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撤銷青年反共救國團、泛政治的文化和籌組反對黨等等，皆觸及了黨國體制違逆自由民主之處之核心問題。

此後至1970年代中期，臺灣的政治民主及自由的程度甚為低落。其中如在1957年至1965年間發行的「文星雜誌」及1968年創刊的「大學雜誌」，此兩份刊物雖然皆提出改革之議，然究實而論，其皆不如「自由中國」般的激進。「文星雜誌」雖探討政治與文化間的課題，但其矛頭並不具體；而「大學雜誌」內容並不以反對黨國為主軸，主要是針對國際情勢逆轉下的革新保臺論點，因此其影響力皆相當有限。然而，這時期為臺灣經濟發展飛躍的年代，因此藉由經濟發展強化了黨國政權的合法性。即便在1970年代前期，臺灣在外交方面已開始屢屢挫敗，然而當時臺灣的最大邦交國－美國仍在政經利益的考量下對臺灣現狀大體上採支持的態度，經濟發展及政治安定遂成為黨國當時的主要目標。

相對「自由中國」而言，在1975年所出版的「臺灣政論」則有兩大特點：第一，這份雜誌的參與者清一色是本省籍人士；第二，其主張少作言論與思想的宣揚，而

是透過實際參與選舉來與黨國抗衡。然而「臺灣政論」出刊五期即遭查禁，隨後，較溫和的「八〇年代」雜誌及較激進的「美麗島雜誌」(1979年)相繼推出，「美麗島」成員雖然成長於黨國教育之下，然其多半屬年輕且懷抱著強烈的本土意識。

對於1970年代出現的政權合法性危機，蔣經國採行了兩大策略，即為：第一，推動「本土化」，亦即除了地方選舉之外，著手實施將有限的政治參與擴及中央民意代表機關，於1972年，國民大會、立法院與監察院等增額選舉法制化；另一方面，國民黨在1970年代開始大量吸收本省籍人士入黨，而中央黨部的中常會臺籍中常委的比例亦漸增加。第二，推動兩次國家大型建設，透過從事公共基礎工程及重工業的興建，鞏固政治基礎並藉由此與資本家建立更深層的互利關係。

1977年11月的五項地方選舉，使得黨國遭遇遷台以來最大的挫敗，其結果為：黨外贏取五個縣市長，21席省議員及6席臺北市議員。而且在北部中壢市，由於抗議國民黨作票的群眾與警察嚴重衝突，爆發了遭受國際矚目的「中壢事件」，此次事件使得黨外激進路線運動者開始更為公開地從事政治反對運動。然而，在1978年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當中，雖然黨外首次全省串聯，企圖組織助選團巡迴助選以求戰果，但因美國突然宣佈承認中共，而被迫中止，突然停頓的選舉參與，使得黨外導向街頭發展。1979年12月，爆發「高雄事件」，是整年黨外人士一連串街頭抗議活動的高潮，而「高雄事件」為國民黨對於黨外抗議所採取最後一次的大規模鎮壓，其意味著1970年代與1980年代國民威權體制逐漸轉型的分水嶺。

1991年以後，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的席位全面改選，資深中央民黨代表全數退職，逐漸朝向政權民主化的道路邁進。1994年底，省市長及高雄、臺北兩市市長開放民選。1996年3月，總統一職由原先之間接選舉(由國大代表選舉)改為全面普選，至此，整個政府的職位已全數開放民選之方式，民主化的進程可視為已大致結束（沈宗瑞，132-135）。

在面對國內外環境的夾雜下，推使台灣邁向民主化道路的因素則有以下三項：

(一) 國際因素。1980年代開始，不單止拉丁美洲進行新一波的民主化，亞洲國家如南韓、菲律賓等等也都陸續發生政治反對運動，而這股民主趨勢則帶給台灣相當的影響。另一方面，美國在1978年，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中共進行建交，在面對險峻的國際環境下，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援，台灣仍需持續以往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的考量，接受美國貿易自由化、人權外交及政治民主化等多方面的建議。

(二) 黨國體制的政權危機。國民黨由於面對1980年代下全球經濟不景氣，聯盟的資本家不投資；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多元化，各種社會運動勃興；以及政治反對勢力的組織制度化，本土勢力在政經方面的多重要求，使得黨國在此一政權合法性的危機中，為求延續而作出替代選擇。

(三) 領導階層的態度。1980年代後，國民黨領導階層率以現實與妥協立場來解決政治衝突，其中蔣經國是一關鍵因素，國防部開始出現由文人接替的現象，象徵著降低軍人主政的可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日本「台灣研究」的體系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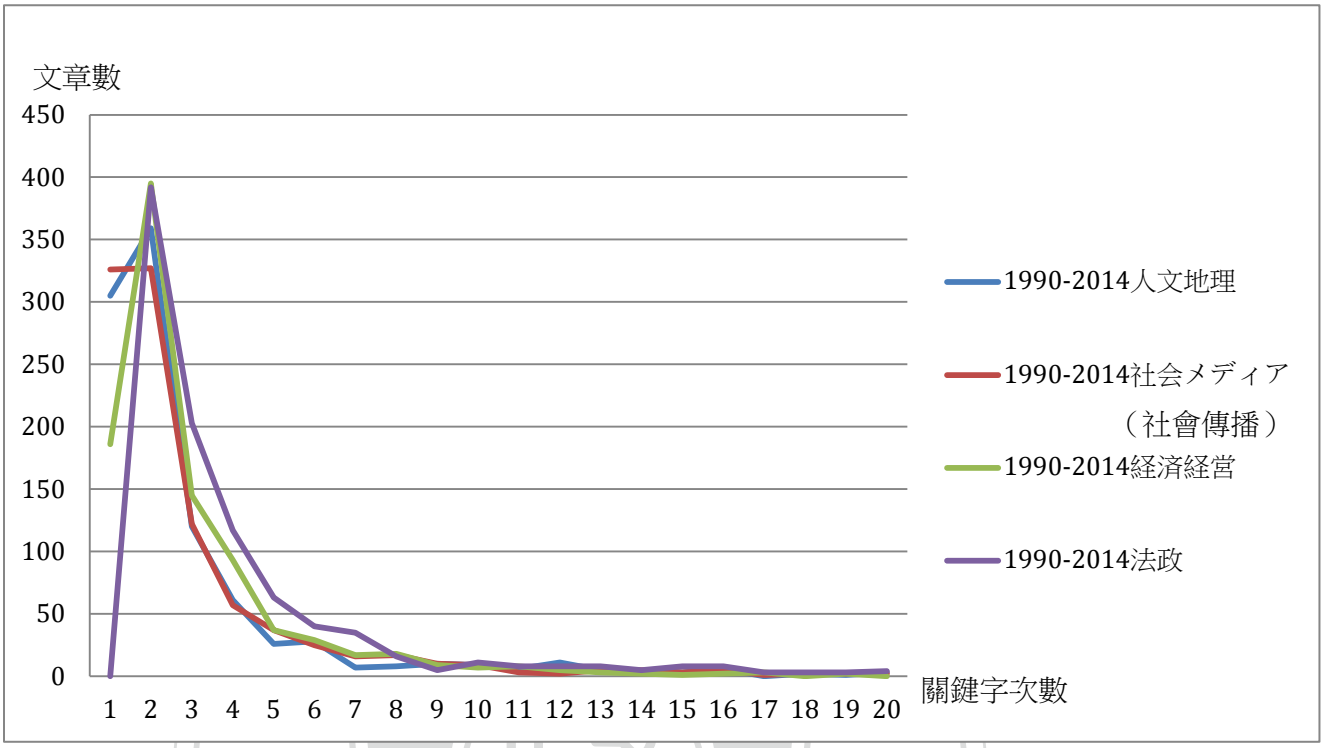


圖5-1　1990－2014年關鍵字頻率分佈折線圖。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資料庫『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由「1990－2014 年關鍵字頻率分佈折線圖」，可從中得知 1990-2014 法政領域關鍵字從出現頻率 20 次以後趨於平緩，因可推論出 1990-2014 法政領域當中，重要關鍵字皆出現了 20 次以上。即為：「台灣」、「中國」、「民主化」、「日本」、「ASIA STREAM」、「台灣海峽」、「韓國」、「馬英九」、「陳水扁」、「國民黨」、「民進黨」、「李登輝」、「總統選舉」、「中台關係」、「台灣獨立」、「東亞」、「美國」、「政權」、「中華民國」、「台灣問題」、「台灣人」、「日台關係」、「香港」、「立法委員選舉」、「台灣總督府」。詳見附表 5-1〔1990－2014，四領域之關鍵字出現次數統計表〕與附表 5-2〔1990-2014 法政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參考－人文地理領域：附表 5-3、附圖 5-3；社會傳播領域：附表 5-4、附圖 5-4；經濟經營領域：附表 5-5、附圖 5-5）。

1990-2014法政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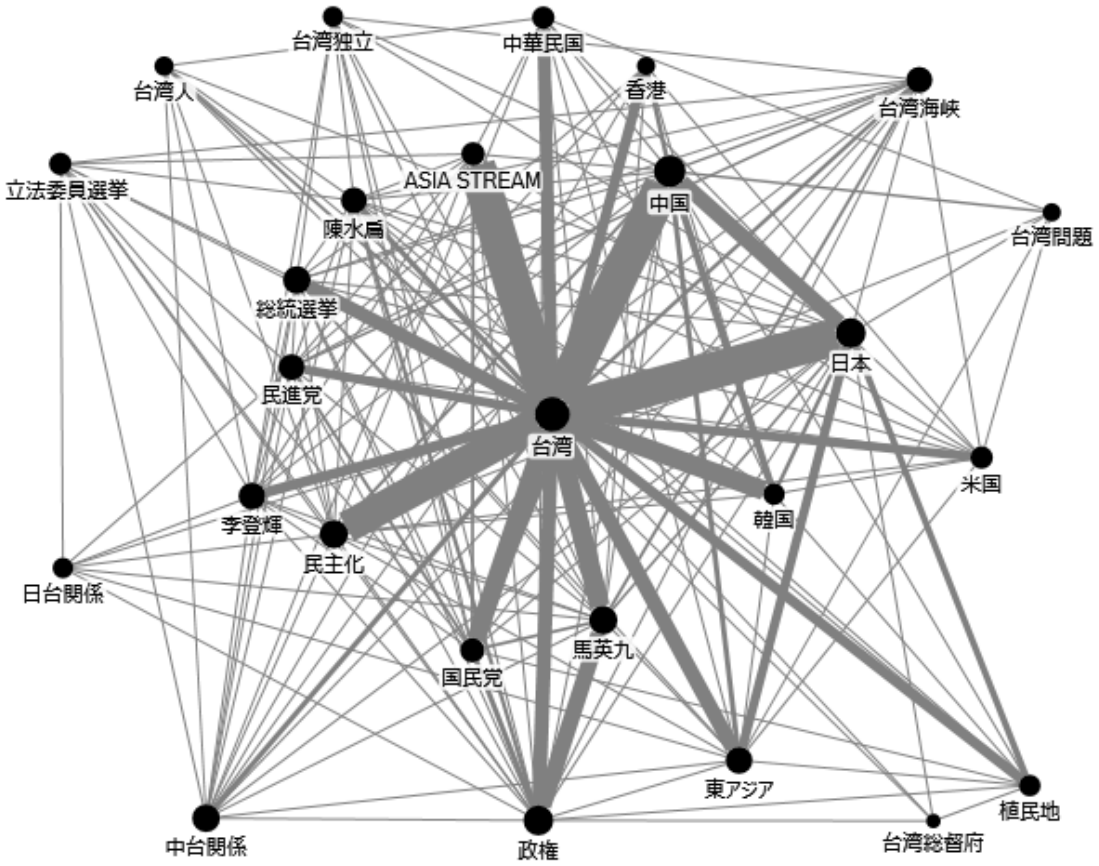


圖 5-2　1990-2014 年法政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資料庫『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環境下民主化浪潮的擊襲，台灣的威權專制政體逐漸消弭，進而急速地向民主化社會邁進。然而，多元組成的台灣內部社會，並未因為威權政治體制的變遷而平靜,反而愈加激起對社會內部對立的火花。總體來說，台灣的政治和經濟狀態自1990年代以來，由於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出現大轉變，因而促發一連串的連帶影響。

由沼崎一郎和佐藤幸人所編之『交錯する台湾社会』一書便以1990年代以來，經濟構造產生巨幅變化，同時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愈發緊密，以及政治層面上的民主化經歷和2000年與2008年時政權交替為背景，進而概觀分析台灣社會。關於自1990

年代以來台灣的經濟變動可分為經濟結構的變化和與中國之間日漸趨於緊密的關係之兩個層面。台灣的經濟結構的再變化始於198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主要是倚靠勞力密集型的製造產業帶動經濟的高速成長，然而，台灣勞動力成本的逐漸提高，使得經濟結構出現轉型。

自1990年代開始，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逐漸趨緩，而進入2000年以來，由於遭受了2001年時的網際網路泡沫之影響，使得邁入以資訊、通訊產業為主的台灣經濟型態更受打擊，且2008年發生雷曼兄弟債券事件，因而使得台灣經濟曲線於2001年和2009年出現負成長的狀態。另外，以經濟結構中的貿易比重為觀察基準，進而發現由於台灣民間消費的內需市場逐漸擴大，使得1990年以來，台灣的貿易出口依存度出現下滑的趨勢，然而，進入2000年後，出口依存度又再度向上攀爬，台灣經濟型態再度轉回出口主導形式，且最主要的出口對象亦從原先的美國轉為中國（沼崎一郎、佐藤幸人編，2012：5-6）。

自十七世紀以來，原先居於中國大陸的漢族開始大量移民台灣，同時也將原有的中國特色一併帶入，因此，廣義來說，有關於台灣方面的學術研究多半是包含於中國研究當中進行。然而，出現一批日本學者認為，台灣位處於日本與東南亞連結之西太平洋海上交通路線之中心點，且與中國大陸之間有台灣海峽將其兩者相隔分開，而在民族結構的組成上，亦原屬於南島語系而非漢民族的居住地，因此台灣社會出現了與中國主流社會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方面不同的發展，同時，藉由其地理位置之優越性，伴隨經濟發展的躍進，成為台灣歷史的發展特色。

有鑑於此，從事台灣研究的日本學者認為，應進一步建立一套專屬於台灣的區域研究系統，從而進行跨學科的區域研究，擺脫過去位居中國研究領域下的地方研究，發展成為具有獨立性的台灣區域研究。

因而集結了三十一位學者，依照其姓氏的五十音順序以及其當時所隸屬之單位分別為：石田浩(関西大学経済学部)、井尻秀憲 (筑波大学)、大橋英夫(専修大学)、岡崎郁子(吉備国際大学)、河原功(成 蹊学園)、栗原純(東京女子大学)、黄英哲(愛

知大学現代中国学部)、駒込武 (お茶の水大学文教育学部)、近藤正巳(近畿大学)、佐藤幸人(アジア経済研究所地域研究部)、下村作次郎(天理大学国際文化学部)、瀬地山角(東京大学 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武見敬三(東海大学)、クリスチャアン・ダニエルズ(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研究所)、張士陽(神奈川大学)、塚本 照和(天理大学国際文化学部)、塚本元(法政大学法学部)、土田滋(順益台湾 原住民博物館)、余照彦(名古屋大学経済学部)、中川昌郎(京都外国語大学)、中島利郎(岐阜教育大学外国語学部)、沼崎一郎(東北大学文学部)、春山明哲 (国立国会図書館)、檜山幸夫(中京大学法学部)、藤井省三(東京大学文学部)、 松田康博(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松永正義(一橋大学経済学部)、三田裕次(台湾史研究家)、山田敬三(神戸大学文学部)、劉進慶(東京経済大学)、若林正丈(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為發起人。眾學者於1997年成立「日本台灣學會」〈The Japan Association for Taiwan Studies，簡稱JATS〉，作為日本關於台灣研究的研究學者之間相互連結、合作的基點以及日本與其他國家地區關於台灣研究的交流窗口（註：日本台湾学会，日本台湾学会設立趣意書）。

同時，「日本台灣學會」亦蒐集整理自戰後以來日本方面有關台灣之研究內容，進而編輯成一檢索目錄—《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至2015年7月15日為止共收錄一萬兩千三百三十一筆文獻資料，其內容含括廣泛，為一系統性的檢索目錄（註：日本台湾学会，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1999年5月，「日本台灣學會」開始發行《日本台灣學會報》，一年一期，直至2015年6月為止共發行十七期，《日本台灣學會報》歷年所刊載論文請詳見附錄（二）。

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即陸續出現有關台灣之學術研究團體，1977年，「台灣史研究會」成立，為當時大阪市立大學的森田名教授以及三名年輕的研究學者所發起，後由關西大學的石田浩教授持續發展，直至2006年3月， 由兵庫教育大學的松田吉郎接手成為新的代表。「台灣史研究會」為一以台灣為研究對象，含括不同職業的研究人才、戰前時期於台灣生活開始著手台灣研究的碩士學生以及在日本留學中或已留學歸國的台灣人等等富含多樣化色彩的研究會，且研究範圍不單只有歷

史方面，與台灣相關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學、教育等等皆為其中，至今組織運作超過三十年，其對於日本的台灣研究之貢獻不可言喻，因而於2007年獲得「日本學術會議協力學術研究團體」的認證，現今的主要活動內容為每兩個月一回定期舉辦的定期研究會以及每年兩回的《現代台灣研究》〈舊名:台灣史研究〉的刊行（註：台湾史研究会，研究会の概要）。

1991年，日本天理大學決議組織以促進台灣相關學術發展為其目標的「天理台灣研究會」，自1991年6月起每年舉辦研究發表會，其各學者所發表之研究論文皆刊載於《天理台灣學報》，1995年「天理台灣研究會」更名為「天理台灣學會」，至2015年6月底為止，共計舉辦二十五回研究大會，為日台雙方學者進行交流之學術平台(註：天理台湾学会)。

2003年10月，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成立了以台灣為研究重點的「台灣研究所」，主要目的為促進日本和台灣學術界之間的交流和增進日台雙方的相互理解。其持續提供相當程度的支援，積極地促進深入台灣研究的展開，成為日本關於「台灣研究」的學術重鎮。成立初期，透過設立「了解台灣」之講座組織、訪台遊學團、收集整理台灣相關資料、舉辦與台灣議題相關之演講等方法，以及2006年開始開辦的日台市民社會相互交流平台為其主要方式。在累積部分的研究成果之後，於2007年與明石書店協定合作，出版「台灣研究叢書」系列—《東アジアの市民社会と民主化-日本、台湾、韓国にみる》、《東アジアの社会運動と民主化》、《台湾人元日本兵の手記小説集『生きて変帰る』》、《東アジア新時代の日本と台湾》和《台湾における脱植民地化と祖国化—二・二八事件前後の文学運動から》，主要著墨於日台關係、日台市民社會、台灣經濟和台灣文化。

2008年4月，台灣研究所提出了第二次的五年計畫，其主要目標有三：首先為研究基礎的明確具體化；由於自2003年成立台灣研究所以來，其對於「台灣研究」所處之研究位置尚處於模糊階段，為能進一步加以明確定義，因而決議於2009年4月時將其隸屬單位從原先的綜合研究機構變更為亞洲研究機構，欲透過運作組織上主管機構的改變，進而使其更便利地與關於亞洲區域的研究活動相互連結，達到互通合

作的效果，同時利用台灣研究作為其研究特點，進一步與各領域的研究計畫接軌，進行共同研究和教育活動，且透過國內外有關於台灣研究學者之間的交流討論等方式，營造更加多元完善的台灣研究的基礎環境。

其次為培育豐富的日本關於台灣研究方面之專業人才；於2009年開始開授關於區域研究下的台灣之課程內容，期望能出現更多對台灣持有高度關心且進行台灣研究方面取得博士學位的研究學者，同時，以從事台灣研究方面的博士生和相關研究之學者為中心所組成的「台灣研究會」亦定期舉辦。

第三點為強化以台灣為研究對象的教育體系；在早稻田大學成立台灣研究所之前，日本在進行區域研究之時，尚未將台灣研究置於一個清楚的定位，因此為了確保從事台 灣研究的學者們能持續順利地進行其研究，避免在進行研究活動之時受到各式各樣的阻礙，因而於第二期計畫中提出「台灣研究」之專題，目的即在於將台灣研究朝體系化的學術道路推進（註：早稲田大学 台湾研究所）。

而日本的台灣研究的持續，不單只依靠日台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平台，日本政府部門所持有的態度亦為指標之一。根據本文進行訪談之日本政府部門K官員表示：日本政府部門對日本學者進行台灣研究時所提供的支持與補助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一般性的學術研究補助，另一種則為針對性的支持。

一般性學術研究補助的代表是文部科學省與日本學術振興會所提供的「科學研究費」，在日本，所有學術研究科類皆可申請此項研究經費的補助，因此雖然許多從事台灣研究的日本學者能申請到此科學研究費，但並不能因此視為日本政府對台灣研究所提供的針對性的補助。目前，日本政府面對台灣研究所提供的針對性支持為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的「日台知的交流事業」，其所提供的後援補助以及各式獎學金。此補助的對象只限於日台間的學術交流，其中亦包含了台灣學者赴日調查研究的補助。雖然於形式上，日本交流協會屬於民間的財團法人，然而，其主要活動內容皆須經過日本外務省的督導與審查，因此日本交流協會的活動內容在某種程度上亦反應出日本政府部門對於台灣研究的支持與力度。

根據日本交流協會所公開之平成27年度預算結算書，其對於「日台知的交流事業」投入6398萬日圓的經費，由於「日台知的交流事業」當中亦包含台灣學者進行日本研究的補助，因此扣除此一部分，即可視為日本政府對於日本的台灣研究的支持與補助。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節 重要研究成果與代表著作

關於「台灣研究」的定義，日本政治學者—若林正丈指出，台灣的特殊性即在於其先後歷經社會組成上之重疊性以及位於國際社會中的身分認定問題，因此，當前位於區域研究框架下的台灣研究，應著手於現今所面臨之國際情勢進行分析和研究。在傳統的區域研究中，其含括對該區域歷史、政治、經濟、文學、文化人類學等等各方面之學術認知，然在進行台灣研究之時，除了透過傳統學術領域的探究 之外，應加上與其相關聯之外來歷史，即：荷蘭史、中國史、日本史和國際政治史等等同時進行跨學科的研究，因此可以說台灣研究具備其一定程度的開放性。

而戰後關於台灣研究的問題意識可分為三個系列，即為:「發展」系列、「民主化」系列和「身分認同」系列，1970 年代末期，台灣經濟快速地發展，其迅速發展之姿成為第三世界以及開發中國家所欲爭相模仿的對象，於此同時，由於經濟的快速成長，實現民主化的聲響亦如同浪潮般隨之席捲而來，因此於 90 年代開始，逐步實踐一系列的民主選舉，並於 1996 年完成總統直選，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確立民主化的基礎。同時，兩岸關係的發展也成為台灣最不容忽視的問題，不論歷史、文學亦或是以文化為中心的研究皆圍繞著台灣的身分認同問題打轉，因此也進而出現了「台灣為其自身之主體」以及「台灣為中國之一部分」此兩種史觀在認知上的拉鋸（若林正丈，1999：1-3〈「台湾研究」のイメーシ〉）。

1992年出版之『東アジアの国家と社会』系列之一，由日本的政治學者－若林正丈教授所著『台湾—分裂国家と民主化』，為當時期之代表著作。其透過「權威主義體制下民主化的政治社會學」以及「在國家、社會框架下的台灣歷史社會學」此雙向的視角解析台灣政治的現況。而在面對台灣威權主義體制的轉型，若林正丈教授對此過程提出了四種主要的方向性，即為「台灣化」、「政治的自由化」、「從脫內戰化至憲政改革」以及「金權政治和國民黨的自民黨化」（若林正丈，1992：274-278）。

在『台湾—分裂国家と民主化』當中，若林正丈提出了五項論述來討論國民黨的威權主義體制，分別是：

（一）疑似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

所謂的列寧主義，指的是共產黨統治方式的若干特徵，例如：以黨控制國家官僚機構、軍隊、社會團體、友黨以及輔助機構的青年團（共青團）、黨政策決定上的民主集中制。而1950年代中期之後的國民黨，其在統治上的特色，即符合上述之屬於列寧主義的若干特徵。

然而，國民黨另有兩項特徵卻讓其與列寧主義式政權區別開來：一個是信奉孫文的「軍政、訓政、憲政」為政治發展論的正統學說，並仍以「民主憲政」為口號；二是其資本主義經濟型態。故其列寧主義式的性格是「疑似的」，其黨國是「不完全」的，因此與「極權主義」有了界線可以區隔，因而被放入「威權主義」的範疇之內。

（二）以「法統」體制排除大眾

所謂的「法統」體制，即為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所組成的政府，以此所延伸的概念是國民黨才是法統的唯一繼承者，亦即國民黨才是中國唯一的正統政府的概念。然而，由於內戰慌亂，使得「中華民國憲法」不久之後即遭《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凍結部分條文，並輔以「戒嚴令」而進入了戰時體制。在國民黨敗退至台灣後，除了第一屆中央民代不改選，進而形成了萬年國會，更鞏固了強人統治，蔣介石即是在修改《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狀況下，得以持續連任直至於任內當中去世，另外，社會普羅大眾也因此被長期摒除於政治參與之外圍。

（三）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架構

「中央／地方」的統治組成，呈現「外省人／本省人」的族群二重構造，且兩者間鮮少流動，而能在地方佔據一席之地的本省人，主要是透過「地方派系」所維持，他們雖受黨國體制的控制，但並不屬於他們的一部分。

（四）對於外部正統性的依存——戰後世界霸權國美國的支持

1970年代以前，國民黨政權對於美國的依存是全面性的。舉凡於「軍事」，即：軍事援助、條約協定、第七艦隊協防；「經濟」，即：總額15億美元以上的經濟援助、提供巨大的出口市場；「政治」，即：支持國民黨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透過這些支持，提供了國民黨追求內部正統性的環境和資源。

（五）二重的侍從主義

此種二重的侍從主義，即「黨國菁英（統治菁英）－地方派系－地方選民」三者的架構，也是國民黨內部正統性的重要來源。

統治菁英先是以龐大的資源來保持外省人菁英集團內部的團結，接著懷柔有聲望的本省人世家，在地方選舉的層次扶植相互競爭關係的複數地方派系。透過此種手段分配，黨國與地方派系之間出現了恩庇關係，便產生所謂「地方聯合壟斷經濟」的地方經濟型態，藉以掌控地方運輸業路線、農業金融、地方公共事業等等。

另一方面，地方派系領導者則利用「地方聯合壟斷經濟」而產生的資源，來培養自己社會上侍從主義的網絡，並在選舉時以此網絡獲得選票。進一步地，地方選民對地方派系領導者的支持，最後再轉換成大眾對國民黨的支持，因此，黨國菁英和地方派系之間，便成為了相互依存的關係，用賦予地方被分割的政治威權即地方經濟特權，進而交換民眾投票給國民黨予以支持。此機制可以使國民黨柔軟地克服在台灣社會上的孤立，把隨著經濟發展而引發的社會壓力，限制在選舉政治的框架內，並在自己仍保持主導權的情況下，推動漸進的民主化。

第六章 結論

同屬於東亞區域範圍內的日本和台灣，其歷史糾葛源遠流長，若嘗試以馬克思以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考察資本主義，可主張資本主義是人類邁向群居生活歷史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因此可視為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歷史產物」，因此各國在資本主義形成的歷史過程中交織入許多不同的條件，導致即使人類歷史已進入到資本主義的階段，卻因為各國所持有的條件相異而呈現出既不平等又相互糾結的歷史圖像，其中，殖民地則處於資本主義結構中的最底層，而伴隨世界大戰的結束以及國際情勢的變化，透過威權主義體制的確立、展開、修正及轉型的過程中，能藉此見證台灣政體的變動。

本文藉由孔恩所提出之「典範轉移」，探討戰後以來日本的「台灣研究」之研究重心轉移之情形。1969 年，孔恩提出『科學革命的結構』之後記，對於「典範」及「典範轉移」再度提出了補充性的闡述，其認為「典範」有下列兩種不同意義的使用方式：第一，它代表一特定社群的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與技術等構成的整體；第二，它指涉該整體中具體的問題解答，把其當作模型或範例，可以替代規則作為常態科學其他謎題的解答基礎，又就「典範轉移」而言，隨著該朝向成熟的轉變而發生的變化，不是出現了一個典範，而是這個典範的形質產生改變，只有在這一變化完成後，常態解謎研究才有實現的可能。

因此，許多社會學家也試圖應用孔恩的論証與典範概念到社會學門之中，社會學家將孔恩的「典範理論」，當做分析社會學的一種後設系統，使用「典範」概念分析社會學以瞭解社會學當前的情況。

石田浩教授將戰後以來日本的「台灣研究」歸納出八種方向，本文則進一步將其濃縮為四個領域，透過將「日本台灣學會」所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的所有文獻分門別類，利用 TTM 形態素解析軟體以及社會網路分析法軟體 NodeXL 將資料量化歸納，因而得出日本的「台灣研究」在戰後初期至 1970 年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代時期，以人類學為研究主軸；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以經濟學為研究主軸；1990 年代至今，則以政治學為研究主軸 。

因此，戰後的日本在區域研究下所進行的「台灣研究」，若進一步與孔恩的典範轉移理論相結合，即可發現其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情勢皆展露出不同的面貌，與日中之間政治、經濟的變化亦有著連帶性的影響。戰後初期為殖民地記憶的延伸與遺留，因此主要研究類別集中於戰前延續下來的人類學領域，1960年代後期由於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使得日本對於台灣經濟的相關研究於1970年代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其研究重心逐漸偏向經濟領域，直到1980年代末期，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巨大轉變促使日本的台灣研究學者對台灣的研究重心再度出現轉移，對在位處兩岸關係下的台灣之政治變化的研究相對更趨盛行，因此，台灣在日本眼中的認識變化亦從殖民地印象轉為經濟發展國家，再進一步轉為亞太區域中的關鍵角色。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參考文獻

（一） 專書

英文：

See Bernstein，Richard J.，1976年，《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中文：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2004年，《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巴殿君，2010年，《冷戰後日本對台灣政策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

孔恩著，王道還編譯，1989年，《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出版。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年10月，《台灣經濟發展新藍圖》，編號:(93)047.106。

宋興洲， 2005，年《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陳偉智，2014年，《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日文：

天児慧、浅野亮，2008年，《中国・台湾》，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石田 浩， 1999 年，《アシアの中の台湾:政治、経済、社会の変容》，大阪市:関西大学出版部。

笠原 政治 編，2010年，《馬淵東一と台湾原住民族研究》，東京：風響社。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笠原 政治，2012年，ヨーゼフ・クライナー編，《近代「日本意識」の成立 民俗学、民族学の貢献》，東京：東京堂出版。

川島 真、清水 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2009年，《日台関係史１９４５-２００８》，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家近亮子、川島真，2016年，《東アジアの政治社会と国際関係》，東京：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

小此木政夫，文正仁編，2009年，《東アジア地域秩序と共同体構想》，東京都：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国分良成、酒井啟子、遠藤貢責任編集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2009年，《日本の国際政治学—地域から見た国際政治》，東京都：有斐閣。

谷浦孝雄 編，1988年，《台湾の工業化—国際加工基地の形成》，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凃照彦，1975年，《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凃照彦，1995年，《台湾からアジアのすべてが見える》，東京：時事通信社。

島田克美，1994年，《東アジアと台湾の経済—政府、市場、組織・ネットワークの役割》，東京：学文社。

松村史紀、森川裕二、徐顕芬，2012年，《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二つの「戦後」》，東京：国際書院。

三木敏夫，2010年，《東アジア経済発展論—東アジア共同体形成にむけて》，東京：創成社。

宮岡 真央子，山路勝彦 編著，2011年，《日本の人類学—植民地主義、異文化研究、学術調査の歴史》，兵庫：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南原繁等 編，1968年，《矢内原忠雄：信仰・学問・生涯》，東京：岩波書店。

日本植民地研究会編，2008年，《日本植民地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東京都：アテネ社。

沼崎一郎、佐藤幸人編，2012年3月，《交錯する台湾社会》，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沼崎一郎，2014年3月，《台湾社会の形成と変容−二元・二層構造から多元・多層構造へ》，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

若林正丈，1992年10月，《東アジアの国家と社会２−台湾　分裂国家と民主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矢内原忠雄，1929年，《帝国主義下の台湾》，東京：岩波書店。

矢内原忠雄，1938年，《植民及植民政策》，東京：岩波書店。

（二） 期刊論文

江和華、林香吟，2014年，〈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雁行理論:台灣經濟發展之展望〉，《東亞論壇季刊 (EAST-ASIA REVIEW) 》，486 (2014) 67-78。

李秉正，2000年10月，〈世紀之交□人文社會科學典範的移轉〉，《淡江人文社會學刊五十週年校慶特刊》。

李朝津，2007年3月，〈日本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慶應義塾大學政治學科之個案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 第1期。

邵軒磊，2012年9月，〈中國研究議程之系譜—以日本國際政治學會會誌為例〉，《問題與研究》，第51卷 第3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曾怡仁，2004 年10月，〈區域主義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全球政治評論》，第八期。

張隆志，2006年11月，〈從「舊慣」到「氏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通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二期。

張世澤、張世強，2008年3月，〈區域研究之下的南亞視野－從美國學院體制中南亞研究的發展與困境談起〉，《問題與研究》，第47卷第1期。

黎立仁，2012年，〈台日經濟產業互動之回顧與展望〉，《全球政治評論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第四十期(2012)No.40。

劉益昌，2006年，〈台灣考古學與原住民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6）。

淺野和生著 何義麟譯，2007年春季號，〈一九七二年體制下日台關係之再檢討—往制定日本版『台灣關係法』目標前進〉，《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3卷第1期。

若林正丈，1999 年 5 月，〈「台湾研究」のイメーシ〉，《日本台湾学会報》，創刊号。

（三）網路資訊:

日本台湾学会，〈日本台湾学会設立趣意書〉，http://www.jats.gr.jp/shuisho.html，檢索日期2015年 8 月 2日 。

日本台湾学会，〈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http://www.koryu.or.jp/taiwanstudies.nsf，檢索日期2015 年 8 月 2 日。

台湾史研究会，〈研究会の概要〉，http://www.geocities.jp/taiwan_studies/about/about.html，檢索日期 2015年8 月 8 日。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天理台湾学会，http://www.tenri-u.ac.jp/tngai/taiwan/index.htm ，檢索日期2015年8 月 15 日。

早稲田大学 台湾研究所，http://www.waseda.jp/prj-taiwan/gaiyou.html，檢索日期 2015 年 7月 15 日。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錄（一）社會科學領域九類主學門之分類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社會科學領域目前區分為九類主學門:人類學、 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區域研究及地理學，若期刊主要研究領域跨上述主學門兩類(含)以上,則視為綜合類期刊。 各主學門之子學門或次領域及代碼列表如下:

<u>H09 人類學</u>

子學門 / 次領域及代碼

H09A1 文化人類學

H09A2 體質人類學

H09A3 語言人類學

H09A4 考古學

H09A5 人類學區域研究

H09A6 信仰、儀式與實踐

<u>H17 社會學</u>

H17A1 社會理論 H17A2 社會學方法論與研究法 H17A3 社會組織與階層 H17A4 社會心理 H17A5 人口、家庭與社區 H17A6 社會問題與控制 H17A7 社會變遷與發展 H17A8 文化研究 H17A9 社會福利

H17B0 社會工作

H17B1 性別研究

H19 傳播學

H19A1 傳播理論 H19A2 傳播研究方法論與研究法 H19A3 傳播法規與制度 H19A4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傳播史 H19A5 新聞 H19A6 廣告 H19A7 公共關係 H19A8 電訊傳播/傳播科技 H19A9 攝影

H19B0 印刷 H19B1 媒體個論(電視、廣播、雜誌等) H19B2 傳播教育 H19B3 文化研究 H19B4 性別研究

H11 教育學

H11A1 教育學理論基礎 H11A2 教育學方法論 H11A3 教育史 H11A4 我國教育制度 H11A5 比較教育 H11A6 教育行政 H11A7 社會教育 H11A8 特殊教育 H11A9 課程與教學

H11B1 教育有關專門領域

H11C0 幼兒教育 H11C1 多元文化教育

HA2 體育學 HA2A1 運動哲學 HA2A2 體育運動史學 HA2A3 運動社會學

HA2A4 運動行政與管理 HA2A5 體育課程與教學 HA2A6 運動生理學 HA2A7 運動心理學 HA2A8 運動生物力學 HA2A9 運動教練學 HA2B0 運動術科

HA3 圖書資訊學 HA3A1 圖書館學 HA3A2 資訊科學 HA3A3 圖書資訊學教育

HA3A4 圖書館組織與管理 HA3A5 資訊服務與管理 HA3A6 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

HA3A7 圖書館事業 HA3A8 圖書文獻學

H12 心理學

H12A1 心理學理論與方法學 H12A2 生物心理學 H12A3 發展心理學 H12A4 實驗及認知心理學 H12A5 人格及社會心理學 H12A6 臨床與諮商心理學 H12A7 教育及教學心理學 H12A8 工商心理學 H12A9 心理計量與統計學

H12B0 其他心理學

H13 法律學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13B1 基礎法學 H13B2 憲法 H13B3 行政法 H13B4 商事財經法 H13B5 刑法學 H13B6 民事法 H13B7 勞工及社會法 H13B8 國際法

H14 政治學 H14B1 政治理論 H14B2 公共行政 H14B3 國際關係 H14B4 比較政治

<u>H15 經濟學</u>

H15A1 經濟學概論與教學 H15A2 方法論與經濟思想史 H15A3 數理與數量方法 H15A4 個體經濟學 H15A5 總體經濟學與貨幣經濟學 H15A6 國際經濟學 H15A7 財務與金融 H15A8 公共經濟學 H15A9 健康、教育與福利

H15B0 人力資源 H15B1 法律與經濟學 H15B2 產業組織與政策 H15B3 企業管理與企業經濟學 H15B4 經濟史 H15B5 經濟發展、技術變動與成長 H15B6 經濟制度 H15B7 農業與自然資源經濟學 H15B8 城鄉與區域經濟學 H15B9 其他專題

<u>管理學</u>

H40 財會 H40A1 財務 H40A2 會計

H41 管理學一 H41A1 人力資源管理 H41A2 組織行為與理論 H41A3 國際企業 H41A4 策略管理 H41A5 科技管理 H41A6 醫務管理

H42 管理學二 H42A1 行銷 H42A2 作業研究/數量方法 H42A3 生產及作業管理 H42A4 交通管理 H42A5 資訊管理

<u>H22 區域研究及地理學</u>

H22A1 人文地理 H22A2 交通運輸 H22A3 地政 H22A4 休閒遊憩 H22A5 建築與都市設計 H22A6 都市及區域 H22A7 景觀學 H22A8 環境與資源管理

人文學領域目前區分為六類主學門：文學一、文學二、語言學、歷史學、哲學、 藝術學，若期刊主要研究領域跨上述主學門兩類(含)以上，則視為綜合類期刊。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錄（二）《日本台灣學會報》歷年刊載論文

創刊號 1999 年 5 月

川島 真，〈装置としての「台湾」と日本人の外縁～在暹「台湾人」国籍問題〉。

吳 豪人，〈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祭祀公業制度の改廃問題〉。

張 季琳，〈楊逵と入田春彦～台湾人プロレタリア作家と総督府警察官の交友をめぐって〉。

何 義麟，〈「国語」の転換をめぐる台湾人エスニシティの政治化－戦後台湾における言語紛争の考察〉。

第 2 號 2000 年 4 月

垂水 千恵，〈呂赫若の演劇活動――その演劇的挫折と文学への帰還〉。

李 郁蕙，〈吳濁流『アジアの孤児』論――その地政学的配置とジェンダー〉。

丸川 哲史，〈1948 年前後の台湾新文学運動にかかわる論争と脱植民地化の問題――『新生報「橋」副刊』を中心に〉。

陳 文玲，〈エスニック・バウンダリーから「民族集団」を考える――台湾先住民族サイシャットを事例として〉。

劉 夏如，〈台湾祭祀公業研究をめぐる「伝統中国」と「近代法継受」の相克〉。

渡辺 剛〈戦後台湾の官吏制度と党政関係――政府の「党化」と現代公務員制度〉。

許 雪姬（張 士陽訳），〈台湾家族史の回顧と展望〉。

松田 康博，〈蔣経国による特務組織の再編―特務工作統括機構の役割を中心に。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 3 號 2001 年 5 月

松本 充豊，〈台湾の政治的民主化と中国国民党「党営事業」〉。

林 成蔚，〈社会保障制度の政治過程—90 年代の台湾における健康保険と年金の改革・形成〉。

山崎 直也，〈九年国民教育政策の研究—戦後台湾教育の二面性の起源に関する考察〉。

丸川 哲史，〈台湾のポスト植民地期(1945-50)における文学—異文化接触とステレオタイプの形成〉。

姚 巧梅，〈佐藤春夫の台湾物「女誡扇綺譚」を読む—「私」と世外民を中心に〉。

呉 文星〈日本統治前期の台湾実業教育の建設と資源開発—政策面を中心として〉。

宮岡 真央子，〈台湾原住民ツォウの旧〈猟場〉における土地権〉。

白 先勇（池上 貞子訳），〈60 年代台湾文学—「現代」と「郷土」〉。

石川 誠人，〈「ダレス・蒋共同コミュニケ」再考〉。

第 4 號 2002 年 7 月

松田 康博，〈台湾の大陸政策（1950-58）—「大陸反攻」の態勢と作戦〉。

青山 瑠妙，〈中国の対台湾政策—1950 年代前半まで〉。

赤羽 淳，〈台湾の直接投資と産業空洞化〉。

張 文薫，〈立身出世を求める青年たち—「風俗小説」張文環新論〉。

李 承機，〈植民地統治初期における台湾総督府メディア政策の確立—植民地政権と母国民間人の葛藤〉。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野口 真広，〈日本統治期台湾先住民社会の変化—霧社地域を事例に〉。

渡邊 ゆきこ，〈台湾の対沖縄投資計画〉。

第 5 號 2003 年 5 月

菅野 敦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と「方言」問題(1966～76 年)—マスメディアの「方言番組制限」に至る過程を中心として〉。

宮崎 聖子〈，青年会から青年団への転換—台北州 A 街の場合(1926～1934 年) 〉。

李 文茹，〈植民地を語る苦痛と快楽—台湾と日本のはざまにおける真杉静枝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形成〉。

中村 平，〈マラホーから頭目へ—台湾タイヤル族エヘン社の日本植民地経験〉。

冨田 哲，〈1905 年臨時台湾戸口調査が語る台湾社会—種族・言語・教育を中心に〉。

中原 裕美子，〈外国人労働者が台湾の雇用と産業構造に与える影響〉。

赤羽 淳，〈台湾企業の直接投資と本国の生産活動—企業ベースのデータを使った投資先別比較分析〉。

若林 正丈，〈現代台湾における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展開とその現在的帰結—台湾政治観察の新たな課題〉。

第 6 號 2004 年 5 月

上村 ゆう美，〈銀鈴会の投稿活動〉。

末岡 麻衣子，〈周金波研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形成分析を通して〉。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林 泉忠，〈戦後台湾における二つの文化の構築―「新中国文化」から「新台湾文化」への転轍の政治的文脈〉。

菅野 敦志，〈台湾における「簡体字論争」―国民党の「未完の文字改革」とその行方〉。

前田 直樹，〈「反共」から「自由中国」へ―末期アイゼンハワー政権の台湾政策の変化〉。

北村 嘉恵，〈蕃童教育所の教員が巡査であったこと―日本植民地下台湾の先住民教育の担い手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

藤森 智子，〈皇民化期（1937－45）台湾民衆の国語常用運動―小琉球「国語講習所」「全村学校」経験者の聞き取り調査を中心に〉。

<u>第 7 號 2005 年 5 月</u>

湊 照宏，〈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台湾拓殖会社の金融構造〉。

金戸 幸子，〈台湾の「両性工作平等法」成立過程に関する国際社会学的考察―多様化社会建設に向けた国家戦略としてのジェンダー主流化をめぐって〉。

小笠原 欣幸，〈2004 年台湾総統選挙分析―陳水扁の再選と台湾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松田 康博，〈中台の軍事バランス―中台の安全保障戦略に与える影響〉。

張 文薫，〈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における「女性」イメージの機能性〉。

丸川 哲史，〈二.二八事件以後の「沈黙」の意味―『国声報』「南光」副刊を中心に〉。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李 文茹，〈「蕃人」・ジェンダー・セクシュアリティ—真杉静枝と中村地平による植民地台湾表象からの一考察〉。

魚住 悦子，〈台湾原住民族作家たちの「回帰部落」とその後〉。

第 8 號 2006 年 5 月

中嶋 航一，〈台湾総督府の政策評価—米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を中心に〉。

宮崎 聖子，〈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の変容—1930 年代後半の諸制度との関連を中心に〉。

佐橋 亮，〈ジョンソン政権と台湾海峡両岸—信頼性と自己抑制〉。

菅野 敦志，〈「台湾語を媒介とした国語教育」再考—戦後初期台湾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の一断面〉。

橋本 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学志』におけるエグゾティスムの役割〉。

戸田 一康，〈葉石濤作品に見られる日本文学の影響—太宰治を中心に〉。

第 9 號 2007 年 5 月

顔 杏如，〈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 年）〉。

許 時嘉，〈植民地体制における「文明」の両義性—『台湾協会会報』の二言語使用の明暗構造への分析を通して〉。

藤井 康子，〈1920 年代台湾における地方有力者の政治参加の一形態—嘉義街における日台人の協力関係に着目して〉。

陳 文松，〈洪元煌の抗日思想—ある「台湾青年」の活動と漢詩〉。

家永 真幸，〈故宮博物院をめぐる戦後の両岸対立（1949-1966 年）〉。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竹茂 敦，〈台湾の外交関係断絶国との実務関係—1950 年初頭の英国との例を中心に〉。

佐藤 和美〈民進党政権の「人権外交」—逆境の中でのソフトパワー外交の試み〉。

田上 智宜，〈「客人」から客家へ—エスニック・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の形成と変容〉。

星 純子，〈現代台湾社会運動の「成功」と変容—高雄県美濃鎮におけるダム建設反対運動とまちづくり〉。

石垣 直，〈現代台湾の多文化主義と先住権の行方—〈原住民族〉による土地をめぐる権利回復運動の事例から〉。

陳 真鳴，〈台湾の介護サービスとホームヘルパー〉。

橋本 恭子，〈在台日本人の郷土主義(レジョナリスム)—島田謹二と西川満の目指したもの〉。

<u>第 10 號 2008 年 5 月</u>

許 佩賢，〈「愛郷心」と「愛国心」の交錯—1930 年代前半台湾における郷土教育運動をめぐって〉。

菅野 敦志，〈1950 年代初期台湾の中国化—「改造」と「中央化」の影響を中心に〉。

森田 健嗣，〈1950 年代台湾における「失学民衆」への「国語」補習教育—元「日本人」の「中国化」の挫折〉。

石川 誠人，〈アメリカの許容下での「大陸反攻」の追求—国府の雲南省反攻拠点化計画の構想と挫折〉。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羽根 次郎，〈ローバー号事件の解決過程について〉。

黄 偉修，〈李登輝総統の大陸政策決定過程―「戒急用忍」を事例として〉。

和泉 司，〈懸賞当選作としての「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改造』懸賞創作と植民地〈文壇〉〉。

唐 顥芸，〈王白淵の東京留学について〉。

黄 毓テイ，〈翁鬧を読み直す―「戇爺さん」の語りの実験をめぐって〉。

<u>第 11 號 2009 年 5 月</u>

春山 明哲，〈日本台湾学会の 10 年を振り返って〉。

下村 作次郎，〈台湾研究、この 10 年、これからの 10 年関西地域における台湾研究〉。

松田 康博，〈台湾政治研究はどこから来て、どこへ向かうか？―これまでの 10 年、これからの 10 年〉。

佐藤 幸人，〈台湾経済研究における課題とアプローチの変化〉。

三尾 裕子，〈台湾研究この 10 年：台湾を対象とした人類学の発展過程〉。

星名 宏修，〈台湾文学研究、この 10 年、これからの 10 年〉。

駒込 武，〈台湾史研究の動向と課題―学際的な台湾研究のために〉。

川島 真，〈設立 10 年を経た「台湾研究」のイメージ〉。

黄 偉修，〈李登輝総統の大陸政策決定モデルに関する一考察―1998 年辜汪会見を事例として〉。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小笠原 欣幸，〈2008 年台湾総統選挙分析—政党の路線と中間派選挙民の投票行動〉。

三尾 裕子〈「蕃語編纂方針」から見た日本統治初期における台湾原住民語調査〉。

ヤユツ ナパイ，〈台湾原住民族部落　スマグスにおける観光事業と多文化教育—タイヤル住民の「部落を教室にする」実践〉。

倉本 知明，〈身体的記憶が喚起する廃墟の記憶—朱天心『ハンガリー水』における眷村表象を中心に〉。

謝 惠貞，〈台湾人作家巫永福における日本新感覚派の受容—横光利一「頭ならびに腹」と巫永福「首と体」の比較を中心に〉。

<u>第 12 號 2010 年 5 月</u>

駒込 武，〈「台湾原住民族にとっての霧社事件」—特集に寄せて〉。

タクン・ワリス，〈ガヤと霧社事件〉。

呉 密察，〈霧社事件研究の課題〉。

北村 嘉恵，〈「台湾原住民族にとっての霧社事件」を問う〉。

春山 明哲，〈霧社事件研究の回顧と展望〉。

下村 作次郎，〈「ガヤ」回復への歩み—霧社事件研究の意味を考える〉。

羽根 次郎，〈啓蒙思想期以降の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南台湾記述と「南東台湾」の発見について〉。

張 曉旻，〈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強制性病検診治療制の確立過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藤井 康子，〈1920 年代台湾における高雄州設置と中等学校誘致問題—高雄・鳳山・屏東各街の日台人の動向に着目して〉。

福田 円，〈毛沢東の対「大陸反攻」軍事動員（1962 年）—台湾海峡における「現状」と蔣介石の「歴史的任務」〉。

佐橋 亮，〈米中和解プロセスの開始と台湾問題—アメリカによる信頼性と安定の均衡の追求〉。

謝 惠貞，〈巫永福「眠い春杏」と横光利一「時間」—新感覚派模写から「意識」の発見へ〉。

松崎 寛子，〈台湾の高校「国文」教科書における台湾文学—鄭清文「我要再回来唱歌」を中心に〉。

八尾 祥平，〈戦後における台湾から「琉球」への技術者・労働者派遣事業について〉。

<u>第 13 號 2011 年 5 月</u>

小金丸 貴志，〈日本統治初期の台湾における刑法適用問題—依用慣行の起源と総督府・法院の対立〉。

松岡 格，〈台湾原住民社会地方化の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展開〉。

顔 杏如，〈「帝国の時間」と植民地台湾—天長節と紀元節を例として〉。

倉本 知明，〈愛情のユートピアから情欲と狂気のディストピアへ—「解厳」前後における蘇偉貞の眷村表象〉。

明田川 聡士，〈「虚構」の想像と創造—李喬《寒夜三部作》におけるフォークナー作品の影響を中心に〉。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豊田 周子，〈『台湾民間文学集』故事篇にみる 1930 年代台湾新知識人の文化創造〉。

第 14 號 2012 年 6 月

星 純子，〈県市合併後の地域政治変動と社会運動—高雄市美濃区におけるローカルレジーム再編の初歩的考察〉。

三野 和惠，〈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と反植民地主義ナショナリズム—宣教文書『山小屋』(1938)に見る「苦しみ」と「愛国」の問題に着目して〉。
深串 徹，〈戦後初期における台湾の政治社会と在台日本人—蔣介石の対日「以徳報怨」方針の受容をめぐって〉。
楊 子震〈帝国臣民から在日華僑へ—渋谷事件と戦後初期在日台湾人の法的地位〉。
鳳気至 純平，〈書いたのは誰の歴史か？—『南方移民村』から見る濱田隼雄の歴史意識〉。
張 文薫，〈帝国アカデミーの「知」と1940年代台湾文学の成立—『台大文学』と「東洋学」を中心に〉。
清水 美里，〈在台日本人商工業者の日月潭発電所建設運動〉。
冨田 哲，〈日本統治期台湾をとりまく情勢の変化と台湾総督府翻訳官〉。

第 15 號 2013 年 6 月

森田 健嗣，〈戦後台湾山地社会における原住民族言語の維持と継承—キリスト教会が果たした役割に注目して〉。
大野 育子，〈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仏教留学生の学知・思想—台湾人仏教青年曽景来を中心として〉。
赤松 美和子，〈台湾ポストニューシネマの日本表象—『悲情城市』（1989年）から『海角七号』（2008年）へ〉。

第 16 號 2014 年 6 月

明田川 聡士，〈李喬「小説」と 1960 年代台湾文学界における安部公房の受容—台湾文学における 1960 年代実存主義運動から 80 年代民主化運動への展開〉。

八木 はるな，〈白先勇小説の映画への改編をめぐって—エグザイルとしての在米中国人〉。

小笠原 欣幸，〈2012 年台湾総統選挙と立法委員選挙の分析—同日選挙効果と分割投票〉。

周 俊宇，〈もう一つの新嘗祭—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祭日としての展開〉。

井上 弘樹，〈国立台湾大学における日本人留用政策〉。

森田 健嗣，〈戦後初期台湾における言語政策研究再考—代行された脱植民地化の視角から〉。

<u>第 17 號 2015 年 9 月</u>

呉 介民（平井 新 訳），〈「太陽花運動」への道—台湾市民社会の中国要因に対する抵抗〉。

林　宗弘（平井 新 訳），〈現実と想像上の台湾—両岸関係が中国経済、文化、政治に与える影響〉。

林 成蔚，〈「対立」をつくり出すメディア—台湾におけるメディアと政治の相互関係〉。

川上 桃子，〈台湾マスメディアにおける中国の影響力の浸透メカニズム〉。

何 義麟，〈GHQ占領期における在日台湾人のメディア経営とその言説空間〉。

若林 正丈，〈康寧祥と「党外」の黎明—台湾オポジション第2次組党運動前夜〉。

明田川 聡士，〈李喬『結義西来庵』における「抗日」表象の重層性—1970年代官製文学の中での抵抗と台湾意識の再編成〉。

小笠原 淳，〈坂口樗子の台湾蕃地小説とその系譜—戦中と戦後を通して〉。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佐和田 成美，〈19世紀中葉の台湾北西部における隘の制度的役割と実態に関する一考察—隘首の任免をめぐる行政訴訟を例に〉。
五十嵐 隆幸，〈蔣経国の「大陸光復」構想（1969～88年）—蔣介石からの継続性と情勢に応じた変質に着目して〉。
寺沢 重法，〈現代台湾において日本統治時代を肯定的に評価しているのは誰か？—「台湾社会変遷基本調査」の探索的分析〉。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表、附圖

➢ 附表 2-1：〔日本的「台灣研究」文獻於四領域分佈比例之計算紀錄〕。

クロス集計表

記録

出力の作成日付		30-APR-2016 16:11:32
コメント		
入力	データ	C:¥Users¥山本先生¥Desktop¥政治大学　陳さん¥0429 deta.sav
	アクティブ データセット	データセット6
	フィルタ	<なし>
	重み付け	<なし>
	分割ファイル	<なし>
	作業データファイル内の行数	10636
欠損値の取り扱い	欠損の定義	ユーザー定義欠損値は欠損値として処理されます。
	使用されたケース	各表の統計量は、各表中の全変数に対する指定範囲に有効データを持つすべてのケースに基づいています。
シンタックス		CROSSTABS /TABLES=四つ領域分類 BY 年代5年 /FORMAT=AVALUE TABLES /STATISTICS=CHISQ /CELLS=COUNT ROW COLUMN TOTAL /COUNT ROUND CELL.
リソース	プロセッサ時間	00:00:01.03
	経過時間	00:00:00.97
	要求された次元	2
	使用可能なセル	524245

処理したケースの要約

	ケース					
	有効数		欠損		合計	
	度数	パーセント	度数	パーセント	度数	パーセント
四つ領域分類 * 年代5年	7949	74.7%	2687	25.3%	10636	100.0%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附表 3-1:〔1945-1974 四領域之關鍵字出現次數統計表〕。

關鍵字出現次數	1945-74人文地理	1945-1974社会メデイア	1945-1974経済経営	1945-74法政
1	352	218	155	162
2	62	34	23	25
3	23	7	5	10
4	6	4	5	4
5	9	1	0	1
6	2	1	1	0
7	1	3	2	1
8	0	1	0	0
9	2	0	0	0
10	2	0	0	0
11	0	0	0	0
12	0	0	0	0
13	0	0	0	0
14	0	0	0	0
15	0	1	0	0
16	1	0	0	0
17	0	0	0	0
18	0	0	0	0
19	0	0	0	0
20	0	0	0	0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表 3-2：〔1945-1974 人文地理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45-74人文地理
台湾	名詞	85
高砂族	キーワード	23
研究	名詞	16
民族学	キーワード	10
道教	キーワード	10
アミ族	キーワード	9
中心	名詞	9
中国	名詞	7
人類学	キーワード	6
仏教	キーワード	6
場合	名詞	5
宗教	名詞	5
信仰	名詞	5
社会|組織	複合名詞	5
先史学	キーワード	5
日本	名詞	5
香港	名詞	5
儀礼	名詞	5
ヤミ族	キーワード	5
清代	キーワード	4
中華民国	キーワード	4
東南|亜細亜	複合名詞	4
媽祖	キーワード	4
法|思想	複合名詞	4
伝説	名詞	4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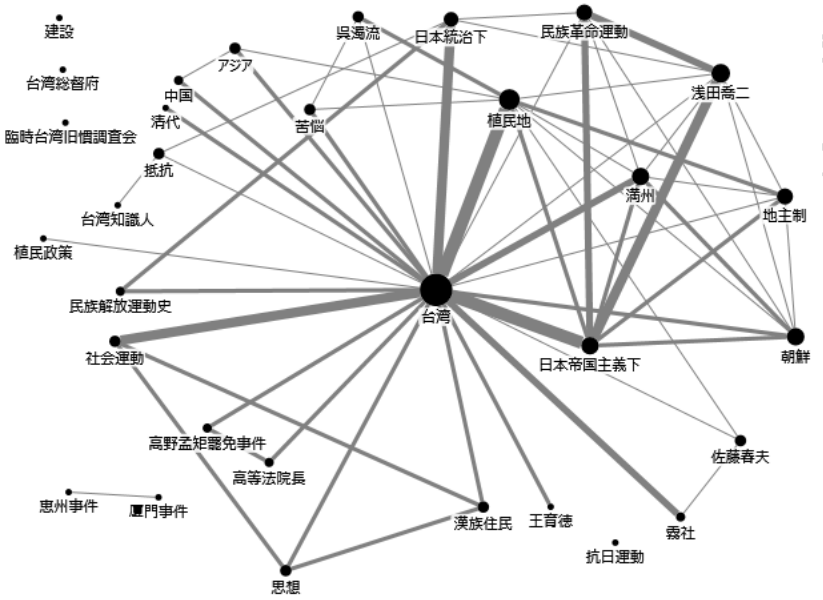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附表 3-3：〔1945-1974 社会メディア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42-1974社会メディア
台湾	名詞	48
植民地	キーワード	15
日本人	名詞	8
中国	名詞	7
霧社	キーワード	7
日本統治下	複合名詞	7
民族革命運動	キーワード	6
浅田喬二	キーワード	5
日本帝国主義下	複合名詞	4
地主制	名詞	4
漢族住民	複合名詞	4
社会運動	複合名詞	4
佐藤春夫	複合名詞	3
吳濁流	キーワード	3
抗日運動	キーワード	3
惠州事件	キーワード	3
アジア	名詞	3
厦門事件	キーワード	3
満州	キーワード	3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圖 3-3：〔1945-1974 社会メディア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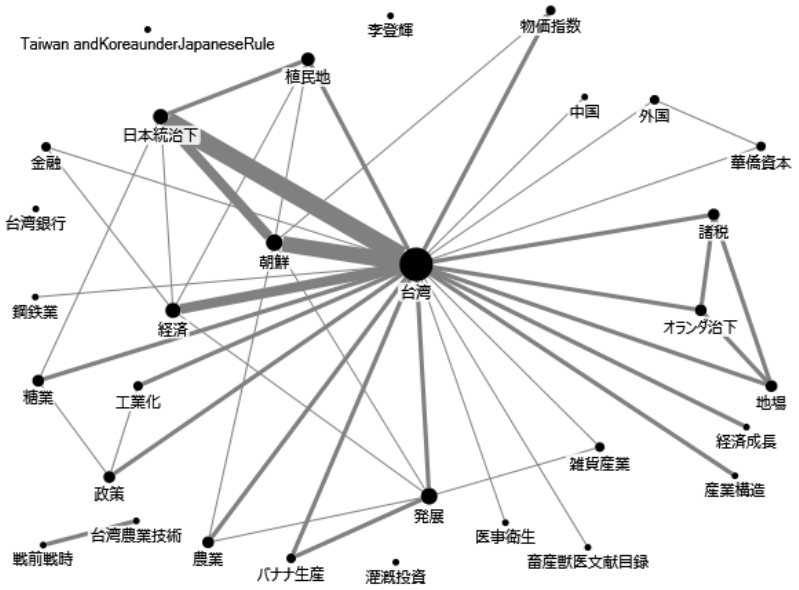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 附表 3-4：〔1945-1974 經済経営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45-1974 **経済経営**
台湾	名詞	62
朝鮮	名詞	7
日本統治下	複合名詞	7
糖業	キーワード	6
政策	名詞	4
経済	名詞	4
農業	キーワード	4
諸税	キーワード	4
発展	名詞	3
工業化	名詞	3
物価指数	キーワード	3
産業構造	複合名詞	3
植民地	キーワード	3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圖 3-4：〔1945-1974 經済経営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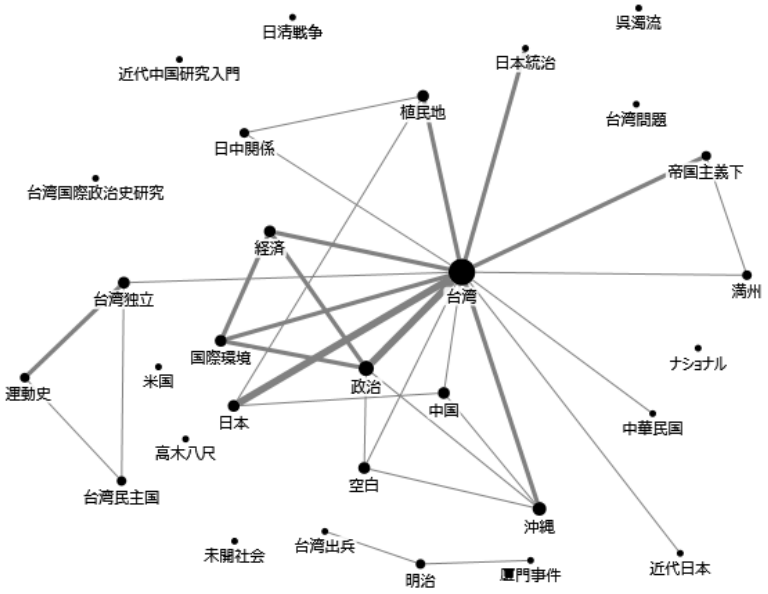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 附表 3-5：〔1945-1974 法政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45-74法政
台湾	名詞	34
日本	名詞	7
植民地	キーワード	5
中国	名詞	4
台湾独立	キーワード	4
台湾問題	キーワード	4
政治	キーワード	4
日本統治	複合名詞	3
日中関係	キーワード	3
国際環境	キーワード	3
中華民国	名詞	3
沖縄	キーワード	3
台湾民主国	複合名詞	3
ナショナル	名詞	3
満州	キーワード	3
高木八尺	キーワード	3
台湾出兵	複合名詞	3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圖 3-5：〔1945-1974 法政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 附表 4-1：〔1975-1989 四領域之關鍵字出現次數統計表〕。

關鍵字出現次數	1975-89人文地理	1975-89社会メディア	1975-89経済経営	1975-89法政
1	622	302	282	276
2	105	47	37	30
3	28	20	11	9
4	23	4	7	5
5	11	5	3	5
6	6	4	1	3
7	11	0	2	4
8	2	0	2	1
9	3	0	1	0
10	4	0	1	2
11	2	0	0	0
12	1	2	1	0
13	0	0	0	0
14	2	0	0	1
15	1	0	1	0
16	1	0	0	0
17	1	0	0	0
18	0	1	0	0
19	0	0	1	0
20	2	0	0	0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表 4-2：〔1975-1989 経済経営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75-89経済経営
台湾	名詞	121
韓国	名詞	19
貿易	名詞	15
日本	名詞	12
植民地	キーワード	10
経済	名詞	9
香港	名詞	8
産業	名詞	8
物価統計	名詞	7
中国	名詞	7
転換	キーワード	6
NIES	名詞	5
関税	キーワード	5
繊維産業	名詞	5
流通事情	複合名詞	4
工業化	名詞	4
糖業	名詞	4
労働問題	名詞	4
台湾繊維産業関連統計	複合名詞	4
企業グループ	複合名詞	4
東南アジア	キーワード	4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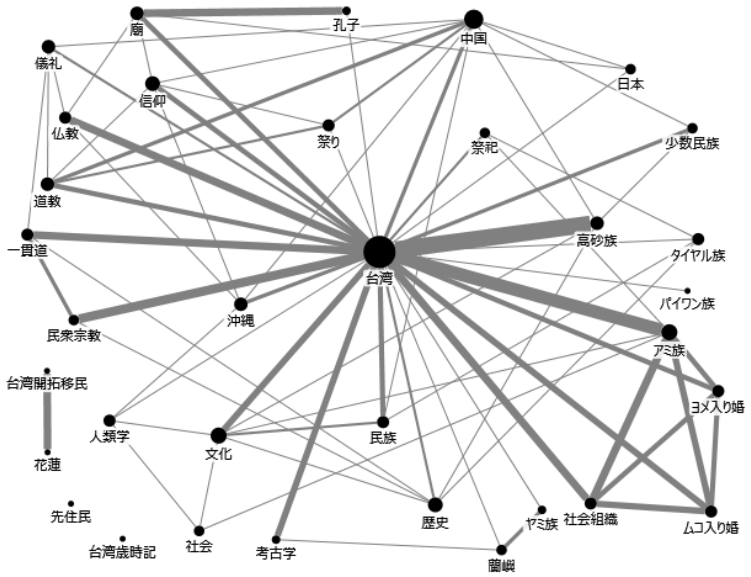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附表 4-3：〔1975-1989 人文地理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75-89人文地理
台湾	名詞	153
中国	名詞	23
高砂族	キーワード	21
仏教	名詞	21
道教	キーワード	20
アミ族	キーワード	20
廟	キーワード	17
信仰	名詞	16
文化	名詞	15
沖縄	名詞	14
民族	名詞	14
ヤミ族	キーワード	12
タイヤル族	複合名詞	11
社会組織	複合名詞	11
民衆宗教	名詞	10
人類学	キーワード	10
一貫道	キーワード	10
考古學	名詞	10
少数民族	キーワード	9
パイワン族	キーワード	9
儀礼	名詞	9
祖先祭祀	キーワード	8
ムコ入り婚	複合名詞	8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圖 4-3：〔1975-1989 人文地理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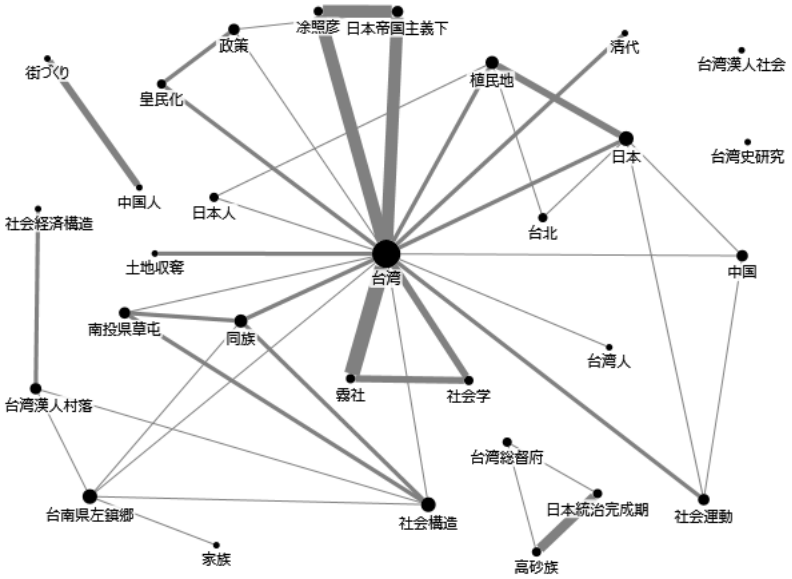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 附表 4-4：〔1975-1989 社会メディア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75-89社会メディア
台湾	名詞	43
植民地	キーワード	18
日本帝国主義下	複合名詞	12
霧社	キーワード	12
皇民化	キーワード	6
社会構造	キーワード	6
日本人	名詞	6
同族	名詞	6
社会運動	名詞	5
高砂族	キーワード	5
土地收奪	キーワード	5
涂照彦	キーワード	5
台湾人	複合名詞	5
台湾総督府	複合名詞	4
社会學	複合名詞	4
南投県草屯	名詞	4
台湾漢人	キーワード	4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圖 4-4：〔1975-1989 社会メディア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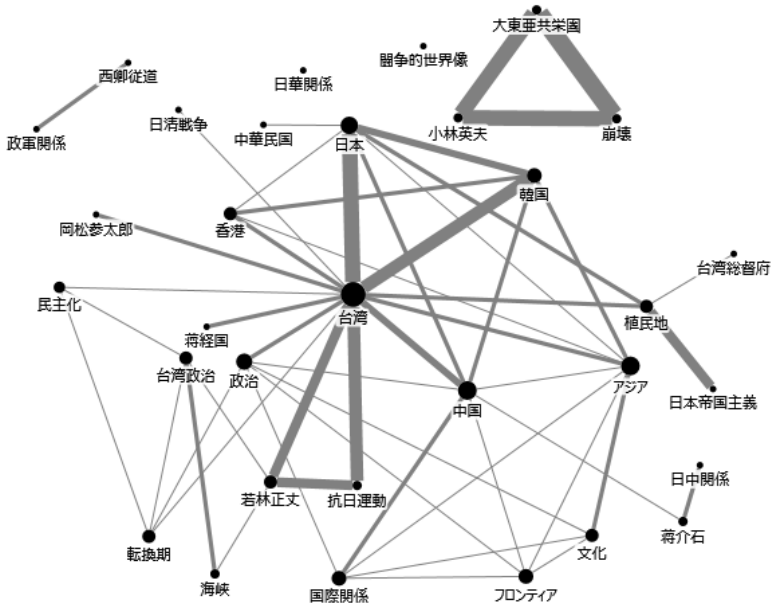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 附表 4-5：〔1975-1989 法政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75-89法政
台湾	名詞	35
中国	名詞	14
日本	名詞	10
植民地	キーワード	10
大東亜共栄圏	キーワード	8
若林正丈	キーワード	7
韓国	名詞	7
アジア	名詞	7
香港	名詞	7
小林英夫	キーワード	6
抗日運動	キーワード	6
政治	キーワード	6
岡松参加太郎	キーワード	5
蒋経国	キーワード	5
民主化	名詞	5
転換期	名詞	5
蒋介石	キーワード	5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圖 4-5：〔1975-1989 法政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 附表 5-1：〔1990-2014 四領域之關鍵字出現次數統計表〕。

關鍵字出現次數	1990-2014 人文地理	1990-2014 社会メディア	1990-2014 経済経営	1990-2014 法政
1	305	326	186	0
2	359	327	395	392
3	120	122	145	203
4	61	57	93	117
5	26	37	37	63
6	28	25	29	40
7	7	16	17	35
8	8	17	18	16
9	10	10	9	5
10	9	9	7	11
11	6	3	8	8
12	11	2	5	8
13	5	5	3	8
14	4	5	2	5
15	3	3	1	8
16	6	5	2	8
17	0	1	3	3
18	2	2	0	3
19	1	2	2	3
20	3	2	0	4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表 5-2：〔1990-2014 法政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90-2014法政
台湾	名詞	936
中国	名詞	236
民主化	キーワード	215
日本	名詞	142
ASIA STREAM	キーワード	93
台湾海峡	キーワード	88
韓国	名詞	80
馬英九	キーワード	74
陳水扁	キーワード	68
国民党	キーワード	65
民進党	名詞	61
李登輝	キーワード	58
総統選挙	キーワード	54
中台関係	キーワード	54
台湾独立	キーワード	53
東アジア	名詞	52
米国	名詞	52
政権	キーワード	43
中華民国	キーワード	39
台湾問題	キーワード	36
台湾人	複合名詞	35
日台関係	キーワード	28
香港	キーワード	28
立法委員選挙	キーワード	27
台湾総督府	キーワード	26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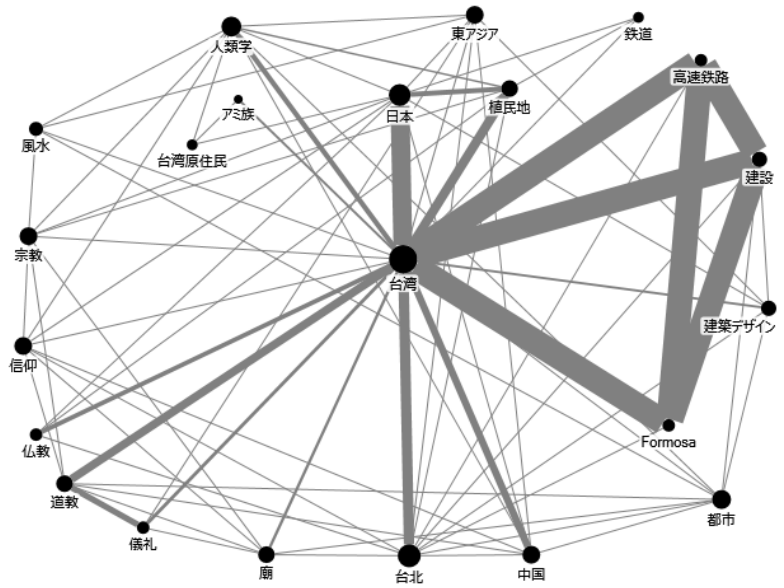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附表 5-3：〔1990-2014 人文地理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90-2014人文地理
台湾	名詞	541
日本	名詞	90
台北	名詞	89
高速鉄路	キーワード	83
Formosa	キーワード	83
中国	キーワード	81
廟	名詞	56
都市	名詞	55
道教	キーワード	46
人類学	キーワード	45
建設	名詞	39
植民地	キーワード	35
儀礼	名詞	30
信仰	名詞	28
宗教	複合名詞	25
台湾原住民	名詞	24
アミ族	名詞	23
建築デザイン	複合名詞	22
風水	キーワード	22
東アジア	名詞	22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圖 5-3：〔1990-2014 人文地理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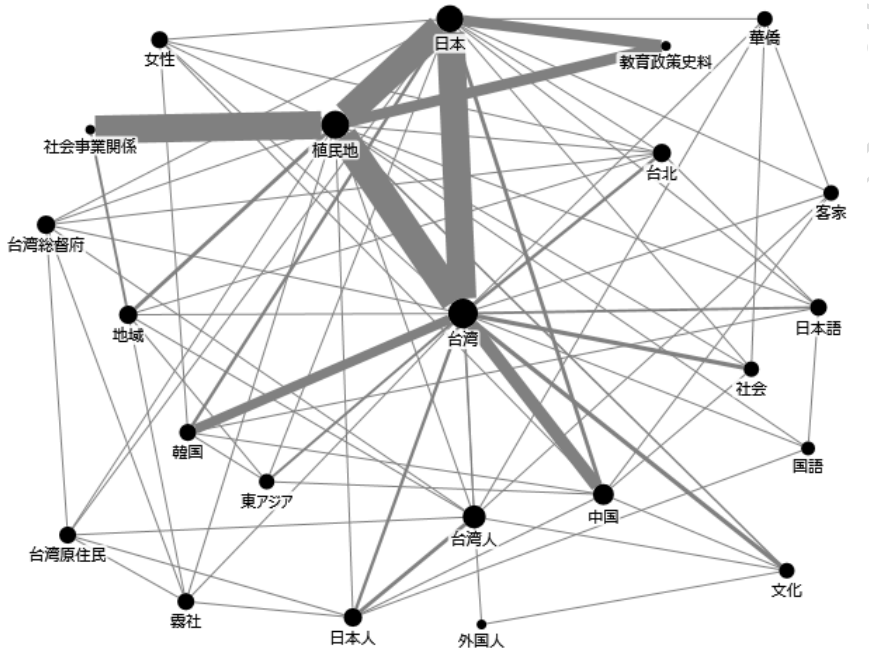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 附表 5-4：〔1990-2014 社会メディア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90-2014社会メディア
台湾	名詞	462
植民地	キーワード	290
日本	名詞	136
中国	名詞	103
韓国	名詞	95
台湾人	キーワード	68
台湾原住民	キーワード	42
文化	名詞	35
日本人	キーワード	34
台湾総督府	キーワード	33
日本語	キーワード	29
華僑	キーワード	25
客家	キーワード	23
霧社	キーワード	22
東アジア	名詞	21
女性	名詞	21
外国人	名詞	21
国語	名詞	20
社會	名詞	20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圖 5-4：〔1990-2014 社会メディア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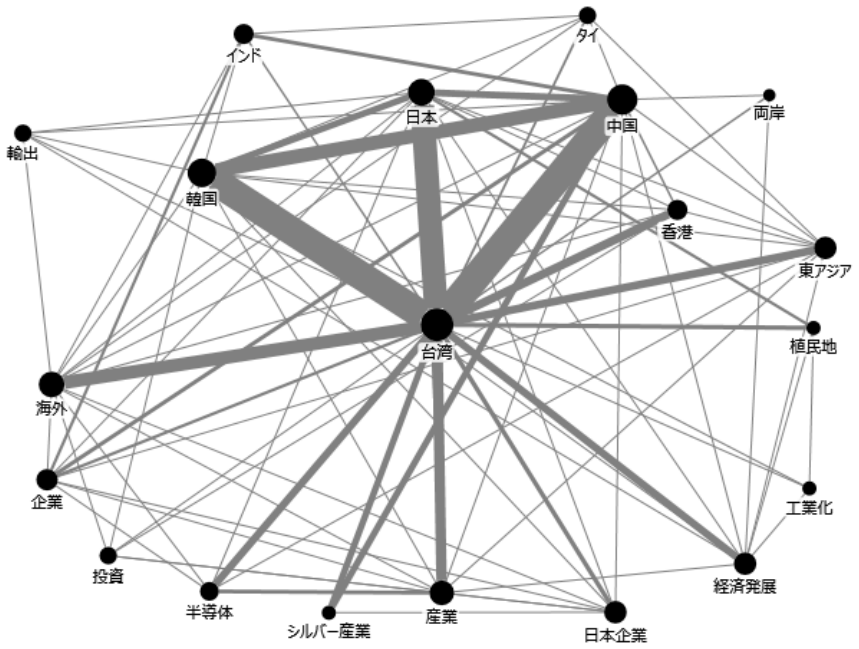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

➢ 附表 5-5：〔1990-2014 經済経営領域出現之關鍵字及次數統計〕。

語	品詞	1990-2014経済経営
台湾	名詞	721
中国	名詞	131
日本	名詞	88
韓国	名詞	84
産業	名詞	58
海外	キーワード	54
香港	キーワード	53
東アジア	名詞	48
経済発展	キーワード	46
日本企業	キーワード	45
半導体	キーワード	38
工業化	キーワード	37
殖民地	キーワード	37
兩岸	キーワード	33
タイ	名詞	33
インド	名詞	32
輸出	キーワード	31
投資	名詞	30
シルバー産業	キーワード	30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統計。

➢ 附圖 5-5：〔1990-2014 經済経営領域關鍵字網絡圖〕。



資料來源：「日本台灣學會」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本文自行繪製。